

陈述黄埔

48 黄埔四期生李逸民的传奇人生（上） / 陈宇

黄埔人生

55 黄埔名将李宗仁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 / 韩淑芳

58 军旅十二年 两立三等功 / 丁晔

我的黄埔前辈

61 我的父亲李继贤 / 李运生

历史

黄埔研究

65 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组织管理系统（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71 鲜为人知的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 / 杨灵统

黄埔收藏

78 我收藏的黄埔军校《操场野外笔记》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84 1926年4月21日，蒋介石为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及共产党人官长举行晚宴 / 贾晓明

军史撷英

87 斯大林格勒战役 / 王晓平

文化黄埔

91 郭沫若书法艺术 / 李务起

黄埔连载

95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八） / 熊子杰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2年 第4期 总第205期



48 黄埔四期生李逸民的传奇人生



58 军旅十二年 两立三等功



61 我的父亲李继贤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慷慨赴国难 血肉筑长城

——东北抗联中的黄埔师生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供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发表一系列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同时，派出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大量党员干部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建立，后来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6年起，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东北抗日联军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2、3路军，积极支援、配合全民族抗战。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艰苦斗争时期。1941年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小型游击战和苏联整训时期。1945年8月，东北抗联部队配合苏军出兵东北，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为民族独立而血洒疆场的东北抗联英雄中，有一批来自黄埔军校的中坚骨干，在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有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赵尚志、赵一曼、李秋岳、崔石泉，又有东北抗日联军的早期开拓者——朴奉、全光、杨林、宋国瑞、申春、李成林、潘庆由、李云健，还有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者——张适、曹基锡、陈公木等，为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中的黄埔师生，充分发挥军事专业优势，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与广大东北抗日联军将士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共同铸就了“勇赴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团结御侮”的东北抗日联军精神。斯人已逝，硝烟已散，让我们一起缅怀英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赓续红色血脉，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东北抗日联军发展综述

□ 张源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为全面进行战争准备，日方周密制订侵占东北的作战方针，选择“事变”时机和首战地区。1929年至1931年，对东北进行了四次大型现地侦查，并调兵遣将以演习为名掩护发动“事变”进行的战前准备。

1931年9月18日，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带领6名士兵，按事先预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东北军发起猛烈进攻，占领沈阳及辽南各地。11月，日军占领黑龙江，次年1月占领锦州。2月，哈尔滨沦陷。日军仅用4个月18天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控制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尽快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官员均为日本人，“国防”、治安也由日军负责，军警也附庸于日本。“伪满洲国”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占领下的殖民地。

民族危亡之际，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九一八事变后连发三次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坚决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0月12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及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和决议，从根本上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号召各界群众及士兵进行坚决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以武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及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部



/ 1931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图为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旧址。

分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拒绝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还有部分东北爱国官兵与各族各阶层人民、绿林武装相结合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投入抗日斗争,这些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编制,以自筹或募捐的方式获得军费,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日伪军。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最早兴起的是辽宁地区,如辽宁

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自卫队。1932年2月,哈尔滨保卫战失败后,吉林地区开始组建义勇军,如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江桥抗战后,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义勇军分布极广,他们四处伏击出扰之敌。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猛烈攻势严重威胁到了日伪当局的统治。1932年秋,日本关东军先后出动20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由于没有坚强统一

的领导,后勤补给困难,被各个击破,遭受重创。辽宁省义勇军大部溃散,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义勇军主要领导人率部撤退至苏联境内。此外,少数部队转入热河坚持斗争。

当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便逐渐成为东北敌后抗战的主体。一方面加紧组织民众,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陆续派出领



/ 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积极发展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的斗争。图为北满抗日救国总会颁发的救国会会员证。

导干部到各地指导工作。杨林、杨靖宇到南满，童长荣到东满，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等地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义勇军溃散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要力量。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

由于敌人的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零星散落在各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力量还较为弱小。1933年初，根据实际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此精神指示，中共满洲省委规



/ 东北反日游击队创建地示意图(1932—1935)。

定当前的任务是“在目前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满洲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1933年，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将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

师，第二年1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1934年，东满4县游击队合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935年5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1934年，珠河反日游击队与周边武装统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934年9月，密山游击队与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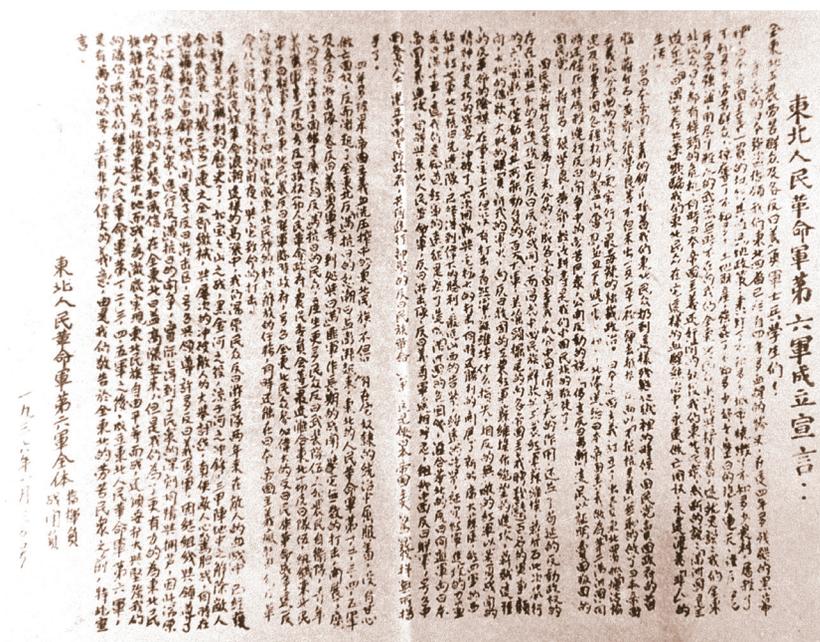
共产党的领导下，率先执行反日统一战线方针，使东北抗战局面有了很大改观。

三、东北抗日联军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出《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并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问题。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2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要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发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各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东南满地区

根据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要求，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王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宣言。



/ 东北抗联密营遗址。

合并组建为东北抗日同盟军，12月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1934年2月，宁安工农反日义务队、边区军和救国军等部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

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1934年秋，汤原反日游击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1936年1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

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为加强东南满地区的统一领导和第1、第2军的紧密配合，7月初，中共南满省委成立，第1、第2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总政治委员。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到1937年7月，战斗数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在东南满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游击区扩展到几十个县，部队发展到近万人。

七七事变后，7月25日，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人民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8月20日，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签署《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部布告》，号召南满地区人民“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

第二次老岭会议后，第1路军各部实行战略转移，在各自活动区域运用游击战术，迂回穿插迷惑敌人，积极开展反“讨伐”作战。1939年9月，日伪开始东南满大“讨伐”，对抗日军民实行“三光”政策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式的残酷围剿。面对极端困难的境地，抗联第1路军实行分散游击，进行艰苦的反“讨伐”作战，共计作战318次，毙伤、俘获日伪军3186人，挫败了日伪

消灭第1路军的计划。杨靖宇牺牲后，第1路军继续突围北上。

（二）北满地区

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7年1月，吉林自卫军混成旅第2支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936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方（正）依（兰）游击队（即明山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1937年10月改编为第11军。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部队均有较大发展，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

为加强和统一指挥，1939年5月，北满抗联的第3、第6、第9、第11军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在各自区域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三）吉东地区

1936年，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这些部队在吉东地区积极发动进攻。1937年9月，中共吉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将上述各抗日部

队组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

七七事变后，抗联第2路军主动打击日伪军，整顿部队，积极开展反“讨伐”作战，抵制与消耗了日伪大量军事力量。

1940年，东北抗日斗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召开会议，决定将抗联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但依旧未能扭转形势恶化的趋势。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东北地区党和抗联领导人在中苏边境地区再次召开会议，决定第3路军和第2路军部分支部在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坚持斗争，其他部队以保存力量为目的，向中苏边境集结，组成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1942年8月，南、北野营的抗联部队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该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艰苦奋斗、为民族解放而血洒疆场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他们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铸就的抗联精神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靖宇、赵一曼、李秋岳等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革命将领更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东北抗联中的黄埔师生

□ 马兴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战争、游击战争与兵变。”1932年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秋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东北地区抗日联军的作战，贯通整个抗日战争全程，这在中国军队各部的抗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不仅作战环境极为恶劣，而且坚持时间最长。

在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亲可敬的东北抗联队伍中，也不乏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东北抗日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骨干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诠释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还把黄埔精神的种子播散在了白山黑水之

间。他们发展壮大抗联队伍，为抗联精神的铸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影响最大的中共黄埔生。

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与侵华日军周旋在林海雪原，创造了东北抗战史上的奇迹，被东北的父老乡亲称为“北国雄狮”。



/ 赵尚志。

1926年，赵尚志离开黄埔军校，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10月，赵尚志参与创建领导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在他的带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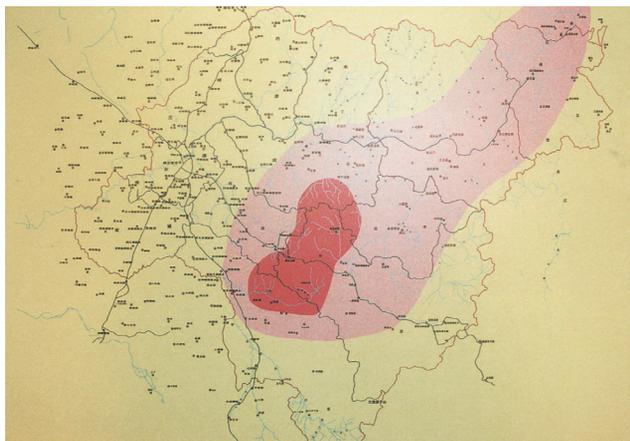
下，哈东支队不断发展壮大，战士们士气高昂，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讨伐”。

1935年1月28日，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半截河举行了隆重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升旗仪式，赵尚志任军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发展十分迅速，至1935年底，由3个团发展至7个团，近800人。对此，日伪当局感到异常恐惧。据珠河县伪政府县政概况记载：“县城城墙被风雨侵蚀颓坏多处，而抗日会匪赵尚志等盘踞亮珠河五区一带，时有攻城消息，纷至沓来。曾飭农商各界按段重修城墙、建筑炮台及卡子房各十数处，并于城壕铁丝网上全通电流，以资防御。”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与日伪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他们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用歌声抵御着饥饿和寒冷，战胜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



/ 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地遗址——尚志三股流。



/ 珠河游击根据地示意图。

1936年10月至1937年上半年，赵尚志带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从松花江下游沿岸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木兰、巴彦到小兴安岭山麓的铁力、庆城、绥棱、海伦、通北；从北黑铁路沿线的北安、龙门，到黑龙江沿岸的逊河，纵横数千里，作战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虏600多人，攻占城镇二三十座，缴获敌人的大量轻重武器及其他装备，进行了“攻打巴彦县”“木炮打宾州”“攻陷方正县”“智取五常堡”“袭击广宁舰”“肖田地突围”“鏖战三岔河”“横扫滨绥线”“东征牡丹江战役”“西征黑嫩平原战役”和一战毙伤300余日寇的“冰趟子大捷”等战役、战斗，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清剿。

此外，第3军还为抗联第6、8、9、10、11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大力帮助。

赵尚志的骁勇善战使日军及

伪满洲国当局闻风丧胆。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报告中，描述赵尚志是“最顽强”“匪势最为活跃的代表者”。肖田地突围后，敌军惊呼：“此中必有名将指挥。”龙门战斗、逊河战斗后，敌人在其报道中这样赞叹赵尚志指挥的部队：“稍加训练满可造成优秀无比之军队。”

1938年12月末，为寻求苏联军事援助，赵尚志被当时的北满省委派往苏联。1940年夏，赵尚志被当时的北满省委以反王明、康生为由错误地开除党籍，但他忍辱负重，仍率小分队坚持抗日斗争。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袭击梧桐河伪警察所的战斗中负重伤被俘，他痛斥敌人，拒绝医治，壮烈牺牲，时年34岁。

赵一曼是东北抗日巾帼英

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将领。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洁、李一超。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



/ 赵一曼。

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先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委。

1934年7月，赵一曼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她平易近人，工作勤奋，做事果断，给珠河人民



/ 赵一曼养伤时穿过的靰鞡鞋。

留下深刻印象。在游击区里，赵一曼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日伪的档案中记载，在珠河，她是把3万多群众团结起来的一个中心领导者，影响力非常大。

赵一曼到珠河开展群众工作时，脖子上长了一个疮，住到吕老妈妈家疗养。在疗养期间，她帮助老乡干活，教大家唱歌，还向当地妇女学习做针线活，老乡们都很喜欢她。两个月后，赵一曼要回珠河抗日解放区。从吕老妈妈的村子到珠河抗日解放区要经过敌占区，为了将赵一曼护送到珠河抗日解放区，吕老妈妈手提鸡蛋和赵一曼乔装成母女，最终成功到达安全区域。赵一曼在吕老妈妈家时一直穿一双靰鞡鞋，她离开后，这双鞋留在了吕老妈妈家。由于老乡们都怀念赵一曼，吕老妈妈及后人一直珍藏着这双鞋，以作纪念。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让战士们感觉亲切的赵一曼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在珠河游击区时，她亲自指挥农民

自卫队伏击日军小分队，打了不少胜仗。

有一次，第3军第3团在侯林乡被两个团的伪军包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的进攻多次被击退，但仍不断增援，并搬来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第3团寡不敌众，决定从敌人兵力薄弱的北部突围。清晨3时许，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枪声，原来是赵一曼率农民自卫军冲了上来。赵一曼还到处燃放鞭炮以迷惑敌人，敌人不知虚实，仓皇逃离。赵一曼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追击敌人，手持系有红丝带的驳壳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杀得逃敌胆战心惊。后来，日伪报纸《大北新报》刊登有关赵一曼抗日活动的报道，惊呼：“共匪女头领，骑上白马，穿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之女主。”

其实，赵一曼从外貌看是个消瘦且病弱的女子，她患有肺炎，体弱多病，组织内部的同志叫她“瘦李子”。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率队开展反“讨伐”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隐蔽养伤期间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她的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进行审讯。审讯时，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浸透了赵一曼的棉衣，但她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审问赵一曼的

日军毫无所得，便像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用鞭柄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面对酷刑，赵一曼昏迷过去好几次，但却始终没有吐露有关抗联的一个字，只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12月13日，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住院期间，赵一曼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手中。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从1935年11月受伤被捕，到1936年8月英勇牺牲，这短短9个月，是赵一曼人生中最悲壮英勇的9个月。日军对赵一曼的刑讯折磨不断升级，用尽了各种酷刑。但是，直到赵一曼牺牲，日军也没弄清她的真实情况，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渭州人”。而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

“走涓州了”。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玩笑回击了日军。

李秋岳是与赵一曼齐名的东北抗日巾帼英雄，中共哈东地区地方领导人，在哈东地区曾配合东北抗日联军第1、2、3团等主力牵制和打击敌人。

李秋岳(1901—1936)，女，朝鲜族，朝鲜平安南道中东部人。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玉明。1925年随丈夫杨林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秋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与赵一曼是同



李秋岳。

学。九一八事变后，李秋岳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委干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中共延(寿)方(正)特支书记等职。

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将珠河特别支部改组为珠河县委，分娩不久的李秋岳继续承担县委的妇女工作，历任妇女委员和妇女部部长。1933年9月21日，珠河中心县委在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总会和隶属于反日总会的妇女组织。李秋岳领导珠河妇女负责游击队的后勤、医疗和情报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且危险，她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儿子托付给一家农户。因为疏于照料，李秋

岳的儿子一岁左右就夭折了，而此时的李秋岳也积劳成疾，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但疾病和失子的悲痛没有打倒这名共产党员，她一如既往地奋斗在工作岗位上。

李秋岳和赵一曼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读，也都有留苏经历，她们都能说汉语和俄语，还喜欢教对方说自己的家乡话，再加上共同的革命经历，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在东北，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干将，在群众中声望极高，被称为“黑白二李”。“白李子”是赵一曼，“黑李子”便是李秋岳。

1935年春，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春季大讨伐”并施行“三光政策”，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时任珠河县委铁北区委书记的李秋岳奉命随赵尚志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即后来的抗联第3军)转战延寿、方正一带，担任延方特别支部书记。其铁北区委书记职务由赵一曼接任。

1936年2月，李秋岳被调到通河县。她受命在通河县东部的朝鲜族村落里建立反日会。在当地，她使用多个化名，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向朝鲜族同胞们宣传民族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把抗联成立的消息告诉村民，使村民们树立起坚决抗日的信心。在李秋岳的努力下，西北河南屯、西北河北屯都成立了反日分会，

全屯妇女都参与其中。

发动完朝鲜族群众后，李秋岳又和崔成日商量发动汉族群众。她打扮成走亲戚的村妇，在漂河、西北河、二道河子、北六方等几个汉族村落中活动，一边帮这些村落中的妇女干活，一边宣传抗日的道理。她还告诉当地青年他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很多村中老人都十分佩服她。此外，她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向通河群众宣传抗联，鼓舞抗日民众的斗志。

经过5个月的积极工作，李秋岳在这些汉族村落里建立了4个反日会，甚至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村民中有6人直接参加了东北抗联第3军。如此一来，通河县局势大好，日本侵略者大为头疼。当时，牡丹江地方警务统治委员长中村在给日本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东条英机的报告中说“通河已陷入不治之境”，“是一难治的癌症”。李秋岳成了日军和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6年8月27日黎明，李秋岳在组织妇女做军鞋时，不幸被伪满警察逮捕。

在通河县日本宪兵队，她经受住了敌人的政治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后，敌人多次劝她写“反满抗日悔过书”，她却借此机会表明心迹：

作为丧失了国家的朝鲜人、

满洲人都是一样地受日本军占领，使多少人无家可归，家破人亡。丧失国家的人，为恢复国家而斗争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要恢复满洲失地，再恢复祖国朝鲜。我们要克服困难，以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在运动中同志们奋不顾身为国家牺牲、尽力是极可贵的，我们作为运动中的一员，感到很光荣！……作为不是日本人的朝鲜人的我，认为反日实践活动一定成功，让我转变是没有考虑余地的！……反日无罪！

日军特务工作班判定她“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在肃整中不得不参考卫队长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于9月3日给以严重处分（枪决）”。

1936年9月3日，李秋岳在通河县城西门外刑场就义，年仅35岁。

崔石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代军长、抗联第2路军总参谋长。

崔石泉（1900—1976），朝鲜平安北道人，又名崔秋海、金治刚、金全玉等，后更名崔庸健。1919年，参加朝鲜三一独立运动。1921年到中国上海。1923至1925



/ 崔石泉。

年4月，在中国云南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任黄埔军校第5期第6区区长、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任黄埔军校特务营第2连连长，率该连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起投身东北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回朝鲜。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曾说：“崔石泉是中共最有长久斗争历史的干部同志，对革命是忠实的，有贡献的，在饶河游击队的创造上，在支持第7军的全部工作斗争，有其作用和工作的效益的。”

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饶河农工义勇军）由特务队（手枪队）发展而来，后来改编为救国军特务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1936年11月，因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扩编成第7军。崔石泉先后担任饶河游击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参谋长、第4军第2师参谋长，第7军党委书记和代理军长。这支队伍以饶河为中心，在虎林、宝清、富锦、抚远等县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新兴洞之战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次战斗。

1935年9月，饶河反日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李学福任团长，崔石泉任参谋长。9月20日，李学福、崔石泉在带领部队向抚远县境

开进过程中，攻袭小南河、小西山等驻地的大排队（东北的地主武装），缴获了几十支枪和一些粮食，部队把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后继续前进。9月25日，部队到达小北山村，在得知驻团山子日军一部将乘船经乌苏里江、松花江去哈尔滨的消息后，当即决定直趋乌苏里江畔新兴洞截击敌人船只。但是，行动被敌人察觉。9月26日上午10时，第4团到达新兴洞北屯西北小岗上休息，突然遭到日伪兵的袭击。接着，伪军第35团也加入战斗，使第4团腹背受敌。崔石泉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领队员阻击伪军的进攻。副团长朴振宇在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李斗文为争取伪军，不顾个人安危，到阵地前向伪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专打日本鬼子。”一些伪军听到宣传后便朝天放枪，4团乘机突围。此次战斗，日军指挥官高木多作中尉以下12人被击毙，17人负伤，伪军死伤10余人。而第4团在激烈的战斗中，副团长朴振宇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等16人壮烈牺牲，另有10人负伤。

新兴洞战斗中，第4团敢于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日军作战，并且给予日伪军以严重杀伤，这是饶河地区抗日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此次战斗，既鼓舞了第4团和其他抗日部队的斗志，



/ 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

增强了大家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又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的声威远震饶河、虎林。新兴洞战斗后不久，就有60余名爱国群众参加第4团，不少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也要求予以改编参加抗日同盟。

后来，崔石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一仗影响很大。在此之前，群众对他们不了解、不支持，这次战斗以后，群众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很多人参加部队，壮大了7军力量。他还说，他青年时期最宝贵的时光是在北满山沟里度过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崔石泉随抗联返回东北，从此正式使用崔庸健这个名字。11月，崔庸健回到祖国，参加了朝鲜建国建军的筹备工作。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崔庸健出任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



/ 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

人民共和国次帅称号，后来担任过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国家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79年9月19日，崔庸健在平壤病逝。

东北抗日联军的早期开拓者

还有一部分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黄埔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因牺牲较早，没能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任职。但是，他们所组建的抗日队伍，多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前身或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抗联第1军：朴奉、全光、杨林

磐石（南满）游击队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的前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磐石镇在吉（林）海（龙）铁路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

对这一地区非常重视，先后派朴奉、全光、杨林3位黄埔师生前往领导和指导磐石抗日武装。

朴奉（1902—1971），朝鲜咸境北道人。原名朴根秀，曾用名金正日、洪秀百。1926年入黄埔军校（期别待查），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中共满州省委为了开拓磐石一带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考虑到磐石多朝鲜族农民居住的特点，将朴奉及其二哥朴根万分配至磐石开展反日斗争。朴奉到磐石小城子杨树泊子（今明城镇七间房村）朝鲜族小学教学。

到杨树泊子后，朴奉按照满洲省委指示，到朝鲜族聚居的地方走村串户宣传马列主义，为后来组建中共磐石县委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接收朝鲜族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朴奉深

入朝鲜共产主义者经常活动的磐东、磐北地区，拜访了朝鲜共产党 ML 派总局在南满的负责人李仁洙、李东光等，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其思想政治情况。经过严格审查，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吸收朴允瑞、朴云波、朴翰宗、李东光、金昌根（又名王平山）、崔松波、李承雨（原名李成浩）、金光道、韩浩、韩武振等1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8月，中共在磐石烟筒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磐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县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朴奉当选为县委书记。磐石县委成立后，继续发展扩大党组织，到同年年底，已发展党员80多名。

1931年8月，磐石县委改组为磐石中心县委。中心县委设在磐石县小城子西玻璃河套，辖磐石县全境和双阳、伊通、西安、辉南、桦甸、吉林（今永吉）等县部分地区，共有党员92人。第一届磐石中心县委书记由全光担任，朴奉改任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后被派往汪清县（今图们市）工作，成为金日成部的军事顾问与军事教官。

全光（生卒年月不详），又名吴成伦。朝鲜族，生年、加入中共时间及黄埔军校期别不详，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第2军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总务处处长、中共

南满省委委员。后叛变，在杨靖宇牺牲后投降了日军。

杨林（1898—1936），朝鲜平安北道人，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州平、杨宁、毕士悌。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说法认为杨林1921年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林。

杨林早年因领导朝鲜学生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通缉，逃亡中国。后考取了云南讲武堂，并取得了学科和术科双第一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在东北抗联的战友周保中与他是同期同学。

1924年初，杨林进入黄埔军校任教，曾任叶挺独立团第3营营长（时名毕士悌），后来与妻子李秋岳到莫斯科学习。1930年夏，杨林和李秋岳回国，赴东北参加革命工作，杨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0月，东满特别委员会成立，杨林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为中共延和县委、汪清县委和琿春县委建立军事部，整顿和组建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加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1931年2月，杨林草拟并制定重要军事文献《东满游击队

工作大纲》，对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的建设和指挥系统及其战术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虽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制定的，其任务也主要是为了执行土地革命方针，但它对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建立反日武装、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游击根据地发挥了一定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需要，杨林重返省委任军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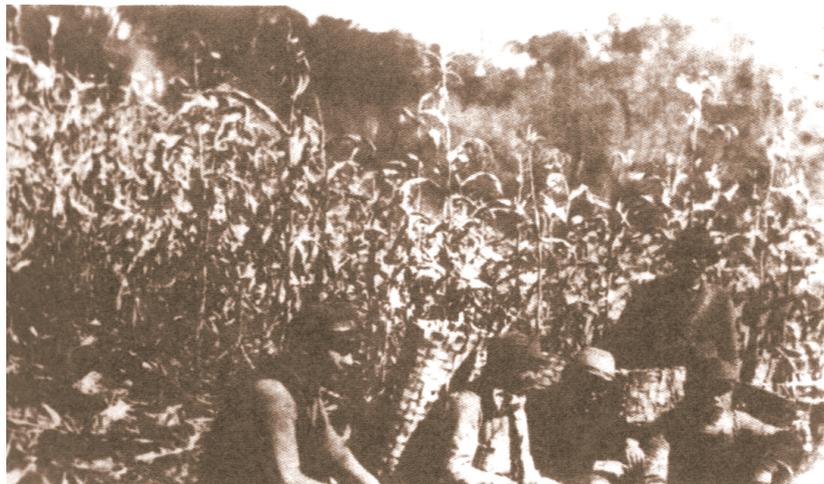
1932年1月15日，满洲省委在松花江一个无人沙洲上召开了沙洲会议，决定将此后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决定“派遣大批党员到农村去，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还要派人到各地义勇军队伍里做兵运工作，团结和动员他们一起抗日”。会后，杨林赶往磐石县。

1932年6月4日，在杨林的指导下，以“打狗队”为名的磐石工农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简称南满游击队或磐石游击队，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的骨干。

杨林后来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北上长征，担任中央军委干部团



/ 琿春游击队创建地遗址——琿春大荒沟。



/ 筹集粮食的东满游击队队员。

参谋长。1935年4月29日，在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和强占通安镇的决定性战斗中，杨林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组织能力。1936年2月，杨林担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22日，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8岁。

抗联第2军：宋国瑞、申春

东满地区是今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包括延吉、和龙、琿春、汪清、安图、敦化、额穆（今属敦化）等县。它东临俄罗斯，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长

白山脉贯穿全境，是中国东北连接朝鲜的重要通道。居民除汉族、满族外，还有大批从朝鲜迁徙过来的朝鲜族。鉴于东满工作的重要性，1930年9月，满洲总行动委员会（1930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改称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和推动东满及周边地区的反日斗争，东满特别委员会包括延吉、琿春、和龙、汪清、敦化、安图、抚松、桦甸、额穆、长白10个县。东满各县游击队是



/ 《盛京时报》1932年5月关于磐石游击队的报道。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的前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黄埔师生杨林、宋国瑞、申春对东满各县游击队的建立都做出了贡献。

宋国瑞（1905—1933），山东省高密市夏庄人，原名宋振邦，字祥斋，又名宋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

宋国瑞早年多在山东从事革命活动，是山东高密早期党组织领导人之一。1929年2月，因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调他到满洲省委工作。1930年4月，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宋国瑞与省委委员王永庆、杨一辰、郭隆真、徐克俊组成满洲临时省委坚持工作。同年夏，宋国瑞任中共延边区委书记兼东满特委军委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掀

起了民众抗日救国斗争的热潮。杨林应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重返省委任军委书记。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富有革命斗争经验却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到东满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2月，调派宋国瑞担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协助童长荣开展工作。

在担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期间，宋国瑞大力发展延边区的党组织，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1932年11月，琿春反日游击队成立，活动于大荒沟、烟筒砬子、梨树沟一带，随后，和龙、延吉、汪清、安图等地游击队相继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游击队同日伪战斗达60多次，游击区域扩大到东满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后来，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下，汪清、延吉、和龙等地的游击队合并改编，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是东满一带反日武装中的重要力量。

1933年6月，正当东满抗日武装力量茁壮成长时，宋国瑞调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在与日军作战时英勇牺牲。

申春(1907—1934)，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人，曾化名梁道益。1927年入黄埔军校第6期。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申

春组织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1930年10月任中共延和县委军事部长，后改任中共琿春县委军事部长。1934年6月牺牲。

申春是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创建人，并对延和县和琿春县的抗日游击队有过指导。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颁布了《全满农民斗争纲领》，号召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下旬，中共东满特别支部组织了“五月斗争行动委员会”，试图通过“红五月斗争”建立政权。和龙县药水洞位于头道沟西边约10公里处，群众基础好，革命性强。这里的朝鲜族进步青年大多数为龙井东兴中学的学生。他们通过开办夜校传播革命思想，先后成立了反帝同盟、农民协会、青年会、妇女会以及少年会等革命组织。来到药水洞后，申春白天利用和农民一同劳动的机会接近群众；夜晚走屯串户，发动群众。经过他的努力，药水洞人民很快行动起来。5月，在申春等人领导下，药水洞数百名群众举行了反日示威。5月下旬，斗争达到了高潮。申春率领农民抓亲日分子，斗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物分给贫苦农民。5月27日，药水洞及其邻近村庄的群众，聚集在药水洞上村一家大院里，成立了药水洞苏维埃政

权。在成立大会上，申春作了讲话，阐述了药水洞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意义及历史使命。大会选出了苏维埃政府委员，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是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东满五月斗争高潮的形成。

同年7月，申春任平岗区工农游击队和地方赤卫队军事总指挥。为掩敌人耳目，在他的领导指挥下，游击队员白天下田劳动，晚上集中到指定地点进行军事训练，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都有明显提高。此外，他还经常带领游击队进攻敌人据点，夺取敌人的武器，充实游击队的实力。

1930年10月初，中共东满特委建立，并将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改称中共延和县委。申春被任命为中共延和县委军事部部长。他不顾腿伤（在一次战斗中，申春左腿中弹负伤），终日奔波在各村，使游击队以平岗区为中心迅速扩展。过度的疲劳使他伤情日趋恶化，东满特委安排他到琿春县养伤。申春到琿春不久，中共琿春县委建立，申春被任命为琿春县委军事部部长。在琿春县，申春化名梁道益，深入到大荒沟一带领导农民运动，指挥清算恶霸地主和亲日走狗的斗争。

1931年2月，因亲日分子告密，申春在大荒沟不幸被捕，5

月被押到延吉监狱。1934年6月，申春被驻延吉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杀害，时年27岁。

抗联第4军：李成林、潘庆由

李成林
(1904—1936)，
原名金东轼，
又名金东植，
化名金大伦、
孙靖海，朝
鲜族，朝



/ 李成林。

咸镜南道咸州郡人，早年随父母来到中国。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成林受中共委派（当时化名金大伦）到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总部任宣传部长。李成林博识多闻，善于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抗日救国军中树立了威望。1932年8月，因抗日救国军总部内的反共情绪加剧，李成林被调往密山任县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发展密山县的党团组织和反日救国会。密山县党员很快由六七人发展到三四十人，建立了7个党支部。他创办的刊物《救国时报》月发行量2000余份。

李成林很重视争取救国军的工作。1933年年初，救国军26旅残部退到哈达河。李成林和密山县委妇女部长李根淑携带慰问品和宣传材料到救国军营部进行慰问，并借机进行抗日救国

宣传。借助在担任抗日救国军总部宣传部长时树立的威望，他组织救国军同密山抗日游击队配合作战，为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创造了条件。李成林整顿了密山游击队，把它改建成“密山赤色游击队”，又联合了部分抗日山林队，使游击队得到了巩固和扩充。1934年10月，这支游击队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2团，在后来攻打密山县城和张家大院等战斗中做出了贡献。

1934年夏，李成林调勃利县任勃利区委书记，在县城、大四站、二道河子等地开展工作。同年10月，勃利区委改组为勃利县委，李成林任县委书记。在担任中共勃利县委领导期间，李成林既要领导该地区党建工作，又要建立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同时还为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抗联第3、4、5军输送兵源和补充给养。根据中共关于某个武装到达某个地域活动必须接受该区域最高党组织的规定的规定，李成林还参与领导在该地区活动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的工作就是由他指导完成的。

1936年3月，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中共松江省委，并提名李成林为松江省委书记。同年6月，

李成林与抗联4军2团副官齐喜一起去依兰的黑背参加抗联4军军部会议，计划会后去松江省委赴任。但当李成林行至马粪包（今勃利县大四站镇福兴村）北沟时，不幸被土匪暗害，时年32岁。

潘庆由（1891—1933），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大荒沟朝鲜族家庭，原名李起东，化名潘向允、老潘。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待查。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局组织部长。1933年牺牲。

1931年9月，潘庆由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到宁安县视察工作，在于家屯召开县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指示。1932年1月，潘庆由出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宁安、穆稜、东宁、密山等县的抗日斗争。中心县委成立之初，下属宁安县委、穆稜县委、密山区委和东宁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80余名。为了更好地领导抗日救国斗争，潘庆由十分重视各地的党组织建设。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不懈努力下，到1933年，中心县委领导的区域内，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为更加广泛地开展艰苦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储备了干部和领导力量。潘庆由培养发展的很多党员干部，如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等，



/ 汤原游击队成立地半截河。



/ 汤原太平川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

日后都成为了著名的抗联将领。

除了党组织建设，潘庆由也
很重视抗日武装队伍的建设
和领导。九一八事变时，中
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
非常薄弱，为

了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潘庆由派出大批党、团员干
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
，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武装。
共产党员李光林、于洪仁等
根据潘庆由的指示，走

出城镇闹市，下到农村场院
讲述九一八事变真相，号召
群众武装起来迎击日寇对
宁安的进攻。正是在县委的
宣传鼓动下，在宁安大地上
先后成立李荆璞、于洪仁领
导的“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
队”，王汝起领导的马莲河
“红枪会”，“李大法师”
领导的“大刀会”，海浪领
导的“西北山八大队”，朱
守一为队长、金根为政委的
“北满工农义勇军”等抗日
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后来成
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第5
军的火种和前身。

1933年5月，共产国际和
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机构—
中共吉东局正式成立，孙广
英任书记，潘庆由任组织部
部长，领导绥宁中心县委、
饶河中心县委和东满特委。

6月，为了加强东满地区
的工作，潘庆由以省委代表
团成员身份，到汪清帮助中
共东满特委与汪清县委召开
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
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
精神。同年7月，潘庆由
协同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到
琿春大荒沟落实中央指示。
20日，他在琿春县委扩大
会议上，严厉批判了琿春抗
日游击队第1大队第2中队
政委朴斗南的“左”倾盲
动主义，并宣布开除其党籍
，撤销一切职务。会后，潘
庆由被朴斗南杀害。

抗联第6军：李云健

李云健（1895—1935），祖籍朝鲜，随父迁居黑龙江汤原。曾用名张世农、张秋，又名李仁根。1926年入黄埔军校（期别待考）。

1928年，受中共满洲省委的委派，李云健到东北三江地区朝鲜族村庄负责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城北半截河村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反日游击中队（简称汤原游击队），李福臣任中队长，李云健任参谋长，下辖3个小队，戴鸿宾、颜庆林和孙盘铁任小队长，共有队员50余人。

1934年2月8日，李云健和戴鸿宾在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配合下，巧妙地将萝北县鸭蛋河街自卫团长及前来开会的13名地主抓获，并缴获枪支若干，初步解决了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困难，鼓舞了队员的斗争信心。

对于这次行动，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曾在回忆录《风雨征程》里有过生动描述：

这次行动是智取……游击队40多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留在城外待命，另一拨化装成老百姓进城。区委书记李凤林和地下交通员宋殿双等人假装讨债打架，他们有意把衣服撕破，脸上涂点猪血，厮打叫骂着要找镇长去评理。他们的后面是装成看热闹劝架的戴鸿宾、王居选等男队员和裴成春、李在

德、朴英善、李恩淑等女队员。等这一大帮人连吵带闹地来到自卫团门前时，哨兵认识李凤林，所以哨兵没有阻拦这帮人。李凤林在当时有地产、有房屋、有骡马，受党组织安排已与伪自卫团团团长高奎一拜了把兄弟，平日常出入伪自卫团。人们一轰进院的同时，有人先缴了哨兵的枪。这时，伪自卫团团团长高奎一正领着一伙人打牌，李凤林和王居选迅速地用枪顶住了伪团长，另外的同志到屋内向自卫团团团员们支上了枪，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38条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这次缴械顺利成功了。当天晚上，李凤林和宋殿双抛弃了全部家产，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汤原县太平川。追击上来的敌人，也被游击队给击退了。

3天后，在李云健等人的带领下，汤原游击队先后在萝北七马架屯及汤原格节河葫芦脖子山沟与伪军“屠旅”步、骑兵两个连发生激战，歼敌30余人，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同时，为打开局面，汤原中心县委决定在位于汤原北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太平川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6月，李云健等人率汤原反日游击队袭击了太平川伪警察署，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7、8月间，游击队先后攻破黑金河、

西大岗、二道岗、长发屯等地自卫团，缴获100余支枪。由此，太平川地区抗日斗争局面得以胜利展开：开明地主黄有自愿献出全部家产充作抗日的经费，并自带枪支参加游击队；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部反正，参加抗日游击队；教育界知名人士刘铁石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游击队。一年的时间里，汤原反日游击队发展到五六百人。

1934年秋，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亮子河扩编成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治委员、李云健任参谋长。同年冬季，日伪军警500余人“讨伐”汤原游击根据地，并以伪地方武装封锁各山边沟口要道，企图断绝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给养来源。李云健等人带领游击总队避敌锋芒转移到萝北等地活动，待敌疲惫时，又返回汤原一带袭击敌人。游击队凭借深山密林为屏障，经过十几次大小战斗，最终打破了日伪军的冬季“讨伐”。

不幸的是，因遭受“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3月，李云健因“民生团”事件被误杀。1936年1月，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者

在东北抗日疆场坚持战斗的中共黄埔生中，有几位是东北

地区党组织的建设者，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军事领导和建设，但对东北地区党的建设有着重要影响，为东北抗日队伍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张适(1904—1946)，山东昌乐人，原名来顺，别字适斋，化名张弓、张有才。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开赴广州。后参加广州起义负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与中共北满特委接上关系，后任哈尔滨市委委员和满洲省委巡视员等职。1933年7月，任奉天特委书记。同年10月9日，因叛徒出卖在沈阳被捕。1942年出狱。1946年在哈尔滨被国民党杀害。

张适是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党组织的创建者。193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绥化县四方台站建立了特别支部，张适任书记，直属满洲省委领导。1932年春，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张适等人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后来，这支义勇军和巴彦起义的江北游击队合并，由赵尚志等同志领导。不久，满洲省委调张适到哈尔滨任满洲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化名张弓，两次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林地区指导工作。张适知识渊博，经常向百姓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因他身材高大，面

膛黝黑，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黑张”。“黑张”在北满党的组织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尊敬。1933年5月初，张适到吉林巡视工作时，组建了以李维民为书记的吉林市委。

1933年7月下旬，张适受满洲省委的委派，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用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毒刑，张适坚贞不屈，对自己的身份只字不露。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问，他都以十分坚决的口气回答两个字：“没有。”日本宪兵队也不得不在审讯记录中承认张适“坚守着所谓共产党铁板纪律的秘密”。出狱后，张适多方设法联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以私塾教员身份为掩护做抗日宣传。

1946年春，张适在取道哈尔滨去绥化的路上，找到了抗联将领李兆麟。在李兆麟的安排下，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开展群众工作。3月9日晚，被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42岁。

曹基锡(1904—1932)，朝鲜咸镜北道钟城郡人，又名曹永勋。幼年时随叔叔到吉林省延吉县谋生。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1932年牺牲。

1927年，随着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彻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悲愤不已的曹基锡离开部队，回到东北家乡。1929年春，曹基锡携全家搬到局子街北山村，在延吉县细鳞河学校任教，并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思想。

1930年5月，曹基锡加入东满“五月斗争行动委员会”，参加和组织了震惊全东满的轰轰烈烈的“红五月斗争”。1930年8月，由满洲省委派来的徐公一、马骏等人建立了中共延吉区委。翌年8月，曹基锡任延吉区委书记。他常常深入到农村，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反帝同盟，指导农民协会、妇女会、互济会、少先队、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工作。同年夏天，曹基锡接到中共东满特委关于营救被关押在延吉监狱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区委会议，详细制定了营救方案，并指派专人秘密与监狱内的党支部取得联系，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1年秋，根据中共东满特委指示，曹基锡组织成立了减租减息斗争委员会，领导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运动”。11月5日，他率领数百名农民涌向杨口城大地主宋宝星的庄园，提出“三七”减租要求。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局子街西沟公安分驻所巡警突然闯入，逮捕了5名农民谈判代表。6日晚，曹基

锡组织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和农民群众2000多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七’减租”的口号，包围伪延吉县政府。伪县知事被迫交出了农民代表，答应实行减租法令。减租减息斗争以胜利告终，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士气。

11月7日恰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为了组织纪念活动，曹基锡借“秋收斗争”胜利的东风，买回五色纸，秘密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标语，趁黑夜散发。有的标语贴在日本领事馆、伪警察署的墙上，极大地鼓舞了延吉人民。恼羞成怒的敌人为逮捕秋收斗争的组织者，纠集大批日本军警和自卫队，以局子街为中心展开大搜捕。11月8日，曹基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利用自己身份尚未暴露的有利条件，装扮成傻子，巧妙地瞒过了敌人的耳目，两个月后被释放。

1932年1月，曹基锡调任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和北山村支部书记。3月20日，曹基锡领导延吉地区一带的农民在磨盘山五岩洞召开公审大会，斗争汉奸李昌顺父子、金炳国等人。由于亲日分子李昌顺家属告密，曹基锡等11人被押进日本领事馆。4月1日，敌人得知曹基锡的身份后，对他



/ 汪清腰营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曹基锡守口如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4月27日，日本军警用两辆军车将曹基锡等30名革命志士押进一座破仓库，先用机枪扫射，后纵火焚尸。曹基锡牺牲时年仅28岁。

陈公木（1900—1935），朝鲜庆尚南道山清郡人，原名金相善，又名李炳熙，丁公木。黄埔6期毕业，曾任中共安图县委书记、延和县委书记等职。

陈公木18岁时从釜山商业学校毕业。1919年参加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被捕入狱。1923年3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4月，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3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ML派）。次年6月，任朝共满洲总局组织部部长。1930年，在磐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中共

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在北满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9月，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听取了廖如愿关于延边党的情况汇报，决定以延和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东满特委，并将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敦化、安图、抚松、桦甸、额穆、长白等县划为东满特委领导区域。10月，正式建立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先后设在延吉县局子街和朝阳川。1931年初，陈公木被中共满洲省委从磐石县派到安图大沙河一带，任安图县委书记。陈公木在安图县期间，发展了党员26名。但是，安图县委很快被破坏，陈公木转移到延吉，参加延和县委工作。3月，陈公木任中共延和县委书记一职。同年4月8日，陈公木在延吉县朝阳被捕，押至朝鲜汉城判处7年徒刑，后在囚禁中被折磨致死。■

新时代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的努力方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几点思考

□ 李宪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态势，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指明了方向。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对台工作应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做好新时代祖国统一工作，扎实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当前，两岸交流与合作仍面临各种挑战和

不确定因素，要一如既往地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对两岸关系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不懈努力。

一、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切实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使两岸同胞增强对共同家园、共同家国的认同，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可以趋近祖国大陆民众，是解决两岸政治认同问题的正确道路。

（一）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反复强调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大着眼点。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也是民心所向，“台独”分子不顾人民的现实诉求和根本利益，大肆鼓吹独立，这是在与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为

敌，必须坚决打击。当前，“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因其直接危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敌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对台海和平的现实威胁，必须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不能有任何妥协。”爱台湾，就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政党、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分裂国家活动，都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二）坚定维护两岸共同利益

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指出：“我们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利益。”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每一项发展成就，都值得两岸中国人自豪。”“只要两岸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考虑，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阻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强调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目光远大、善于进行宏观思考和战略谋划，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胸怀和气魄。“统则强、分则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祖国统一是两岸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和平统一则是两岸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强盛。要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明确振兴中华的共同奋斗目标。“我们应该登高望远，看到时代发展、民族振兴大趋势，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明确振兴中华的共同奋斗目标。”

（三）坚定维护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进两

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推进两岸政治关系，对于巩固和深化当前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共圆中国梦具有重要和关键作用。长期以来，祖国大陆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就是认同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其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坚持“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稳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是对台湾执政当局的底线要求，任何政党上台均概莫能外。同时，为防止“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故伎重演，再次掀起“台独”风浪、搞乱台海局势、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这一原则的反复重申，不啻是一剂强力预防针。海峡两岸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就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进行平等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些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二、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权，努力把握两岸关系发展大局

尽管台湾政局出现不确定性，但两岸关系仍保持着稳步推进的势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大趋势没有改变，两岸关系取得了不少新进展。的确，两岸关系中还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因此，祖国大陆既要保持自身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做好对台工作。

（一）准确分析和预测台湾问题的走向

和平统一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既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又要正确认识台湾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定心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既要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两岸关系的曲折性和反复性，又要看到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既要理性看待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艰巨性，又要看到人民和社会在推动和平统一中的决定性作用。两岸双方应登高望远，把握时代发展、民族复兴大趋势，拿出诚意和行动来，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路线图”，规划和实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体可行的政策措施。

（二）努力增强祖国大陆综合实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深

化，台湾问题能否最终解决，与祖国大陆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祖国大陆综合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法制等方面的软实力。只有祖国大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法治完善、军力强大、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才能对台湾民众产生吸引力，对“台独”分子产生遏制力，对企图染指台湾的国际势力产生威慑力，两岸统一才能最终实现。要科学研判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发展，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完善法治、提升文明、增强军力，早日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发挥好“一国两制”的窗口示范作用，让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感同身受。这样，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增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直至最终达成统一才会有更多认同和支持。

（三）不断完善“一国两制”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

制”本质上是政治制度的安排，其本身就已经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划出了底线，指明了方向。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要积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一步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虽然“一国两制”在港澳得到成功实践，但是随着台湾问题的复杂化，其理论容量、具体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扩充和不断丰富。未来，要在原有“一国两制”理论存量的基础上实行增量改革和完善，推进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交融，不断扩大两岸议题范围，形成“增量”与“存量”良性互动局面，进而营造出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国两制”理论氛围。同时，既要充分吸收港澳回归后的治理经验，又要充分合理吸收有关台湾问题处理方式的各种理论；既要充分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又要理性分析台湾社会现状，真正构建并不断完善适合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两岸同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同胞的亲情和福祉，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就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理论命题，又是基本方略；既是政治立场，又是根本要求。当前，从发展两岸关系的角度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始终把回应两岸同胞的现实关切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台湾同胞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来自祖国的真诚和善意。祖国大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带来强劲动力和有利条件。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让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惠及两岸人民。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只要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祖国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每一项发展成就，都值得两岸中国人自豪。两岸中国人都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一）深化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贸交流继续作为两岸交流合作之主轴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应当本着“两岸一家亲”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以经济领域为主战场的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已逐步展开，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将为两岸

经济合作带来强劲动力和有利条件。经济融合有利两岸互利双赢，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干扰。”要深入了解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同胞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中受益。同时，要不断培育两岸合作共赢平台。如两岸共同编撰教科书、共同编写抗日战争史；共办高等院校、培训基地；共办影视基地，共拍电影戏剧；共办台湾农民创业园、台湾青年创业园等。通过合作共创形式，培育两岸利益共同点，建构两岸共同价值观，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

（二）努力做好台湾青年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基在基层、希望在青年，要为两岸青年学习、就业、创业、交流提供更多机遇、创造更好条件，使两岸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要针对台湾青年

的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将其吸纳到共圆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之中。要鼓励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就学、就业，鼓励祖国大陆企业招聘更多台湾优秀青年，创造条件让他们融入祖国大陆社会之中，展示其聪明才干与人生价值；鼓励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办好台湾青年创业园，设立台湾青年创业基金，为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创业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祖国大陆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管理，感受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再通过他们影响岛内青年，增进其对祖国大陆的了解，把做台湾青年工作往前延伸。

（三）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两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同胞精神纽带，为民族未来培养优秀人才”要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到对台工作中，把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和深植于中华儿女价值观中的共同追求作为养育两岸共同体意识的最重要精

神武器。统一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维系两岸关系的纽带，将对两岸关系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要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华文化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深植于中华儿女价值观中的共同追求作为反对分裂最重要的精神武器，用文化的力量凝聚人心。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尽管当前台海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是要看到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巩固，祖国大陆已经掌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要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充满信心和决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定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努力为两岸同胞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将在海峡两岸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2年4—5月

□ 吴亚明

4月

海峡两岸清明共祭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5日，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延安黄陵县黄帝陵举行。典礼通过电视和多个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并与台湾遥祭视频连线点同步举行公祭典礼。

台湾3月对大陆出口同比增长13.4%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8日公布，台湾3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达180.3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占台湾当月总出口额的41.4%。累计1至3月对大陆出口额达494.8亿美元，同比增长17.8%。

国台办：两岸问题不是所谓“制度之争”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两岸问题不是所谓“制度之争”，不是所谓“民主自由”对抗“专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统一和反分裂的问题。

两岸人士共话“后奥运”志愿服务

13日，台盟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台湾会馆共同举办了“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云分享活动。两岸人士介绍、分享了参与盛会的感受，对加强两岸青年志愿服务进行了交流。

国防部：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行径“极其虚伪，毫无信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5日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发表谈话。他表示，美方这一行径向

“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是极其虚伪的，毫无信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厉兵秣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桂台棋手“云端”对弈

“中华一家亲——2022年‘桂花杯’广西（南宁）—台湾（花莲）围棋、象棋联谊赛”16日以线上对弈方式在广西南宁市、台湾花莲县同步开赛，24名棋手在“云端”切磋棋艺。

统一联盟党呼吁民进党当局回到“九二共识”

统一联盟党16日在台北举行第二届第二次党员大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尊重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回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墨潮新象——2022春季海峡青年艺术交流展”在台北市举办

来自海峡两岸40位艺术家的近百幅绘画、书法和篆刻作品16日亮相台北。与会的艺术家、社会知名人士在开幕式上纷纷表示，要以文化艺术为两岸交流注入新气象。

台湾3月销往大陆订单同比增长9.1%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台湾企业销往大陆（含香港）订单155.8亿美元，同比增长9.1%。其中电子产品增加16.8亿美元、增幅26.7%。

第十四届“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举行

以“激发两湖活力、共筑美好未来”为主题的第14届“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22日以线上联动方式在浙江杭州和台湾南投同时举行。

第九届“大江论坛”呼吁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第九

届“大江论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22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在两岸同时举行，与会人士围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主题交流探讨，建言献策。

台军拟延长太平岛基地跑道，国台办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企图勾结外部势力、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行径都是在玩火，必遭两岸人民唾弃和历史惩罚。

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涉台言论：背信弃义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有关涉台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7日表示，中方正告美方，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背信弃义不仅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国台办哀悼吴澍培先生：毕生致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伟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8日应询表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原会长吴澍培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4月24日逝世，中央台办、国台办谨致沉痛哀悼。

5月

国台办：美国杂志有关报道蓄意歪曲事实，居心邪恶

美国《外交家》杂志刊文称中共对台立场不连贯也不一致，中共关键草创时期的立场把台湾人视为独特的民族，曾表示支持台湾争取“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日应询表示，美国杂志有关报道蓄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企图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居心邪恶。

台湾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再创新高

台湾当局统计部门6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3.38%，远高于2%的通胀警戒线，涨幅再创新高。今年前4个月，台湾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5%，物价上涨压力攀升。

台湾抗原快筛试剂短缺，国台办：大陆愿协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7日应询表示，4月以来，台湾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近日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万例，广大台湾同胞急需的抗原检测快筛试剂严重短缺，我们对此十分关切。台湾同胞尽快获取抗原检测快筛试剂，对疫情防控、诊疗至关重要，台湾有关企业机构需要对接大陆相关生产企业洽商采购，大陆有关方面愿提供协助。

外交部：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必将引火烧身

针对美国国务院网站近日更新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表示，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举办，汪洋致信祝贺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1日在杭州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向论坛组委会发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

国台办：2000多名台湾青年学者在大陆各地高校任教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日应询介绍，大陆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台湾教师同等享受各种表彰、奖励和同等条件申请各级各类国家计划、科研课题、基金项目等。目前有2000多名台湾青

年学者在大陆高校任教。

大陆网站平台显示用户 IP 属地，国台办：有助辨识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行为

针对大陆有关网站平台在相关页面显示用户 IP 属地信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日表示，此举是为有效治理网上谣言、不实信息和网络暴力信息。台湾岛内别有用心者曾在有关网站平台蓄意制造事端、破坏两岸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这项措施有助两岸民众更精准辨识和反对离间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国台办批游锡堃“台独”谬论：数典忘祖，背叛中华民族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应询表示，游锡堃这个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狂妄鼓吹两岸“一边一国”，数典忘祖，背叛中华民族，处心积虑割裂台湾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联系，其“台独”谬论荒腔走板。这也再次表明，大陆将其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依法实施惩戒，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

台湾地区学生可依“统测”成绩申请福建19所高校

福建19所高校2022年首次试点依据台湾“统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统测”即台湾科技院校四年制及专科学校二年制联合统一测试。

外交部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13日签署“要求国务卿制定战略使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方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厦门“云创智谷·两岸台享”揭牌

17日，“云创智谷·两岸台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平台在福建省厦门市云创智谷园区举行揭牌仪式。平台旨在建设两岸产学研培训融合示范平台新高地，为台湾青年到厦门实习、就业、创业、生活等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外交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专家：民进党军演政治秀“以武谋独”卖台害台
台军举行“汉光38号”演习，进行“图上兵棋推演”，扬言以大陆“犯台”为“想定基础”“参酌俄乌战争启示”“精进可恃战力组建”。多位专家受访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贴靠、勾连美国反华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的政治秀。图谋“倚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和平和台湾安全的严重现实威胁，进一步暴露了“台独”势力卖台害台的真实面目。

台湾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破9万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9日公布，新增903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90331例本土病例及47例境外输入病例。

国台办：台湾无权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应询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美方对此心知肚明，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反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美方有关承诺应落到世界卫生组织涉台问题上。

台籍教师拥抱大陆产学研机遇

20日下午，在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组织

下，近40名在榕台籍教师及两岸产业项目代表汇聚一堂，对接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人才技术需求，研讨产学合作新模式和新经验。

世界卫生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做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陇台交流：两岸青年共享文化多元之美

25日，“两岸一家亲·花儿庆丰年”第一季陇台音乐人民族文化传承交流活动，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举办。两岸青年以歌舞会友，共享文化多元之美。

国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5日就东部战区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美方变本加厉打“台湾牌”势必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国台办：吴钊燮之流桩桩劣迹记录在案必遭严惩

吴钊燮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散布“台独”言论攻击大陆，鼓吹美台勾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应询指出，吴钊燮之流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牺牲台湾民众福祉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政治私利，是彻头彻尾的“台独”顽固分子。有关“台独”言行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谋“独”本质，其桩桩劣迹记录在案，必遭严惩。

两岸青年“云”聚第八届“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

第八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26日在武汉举行。活动分为大陆主会场和台湾台北分会场，两岸青年通过视频连线亲密互动、共话友谊。

国台办：美国国务卿演讲暴露美国“挺台遏华”本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散布涉台错误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就此应询指出，美国国务卿的有关演讲充满不实之词，渲染“中国威胁”，散布涉台错误言论，再次暴露美国“挺台遏华”、企图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性。

专家：大陆高度重视台胞健康福祉，民进党“以疫谋独”不得人心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涉台提案列入议程，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在世界卫生大会问题上滋事挑衅再遭挫败。有关专家受访指出，大陆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健康福祉，积极为台湾获取公共卫生信息提供帮助，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民进党当局屡屡炒作世界卫生大会与会问题，目的是“以疫谋独”，其所谓“国际防疫缺口”等说法完全是信口雌黄的政治谎言。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共述“家”印象
27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的两岸首场巡展在福建省美术馆开展，以“艺‘述’家”为主题，从两万多幅两岸暨港澳等地区的少儿画作中精选280幅优秀作品展出。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周年

29日，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周年的日子。40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充分发挥孙中山、宋庆龄联结海峡两岸暨港澳共同感情纽带作用，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暨港澳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促进港澳人心回归。■

世界上最袖珍的航母：“差克里·纳吕贝特”号

□ 石稼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是泰国海军装备的第一艘航母，也是世界上现役的最小吨位航母。该舰是西班牙巴赞造船公司根据“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轻型航母的设计方案和泰国海军的使用需求而量身定制的产品，以泰国曼谷王朝开国君主的名字命名，于1994年7月开始建造，1997年8月正式服役，舷号R911，当时造价约3.65亿美元，刷新了航母建造速度的世界纪录。“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母使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装备航母的国家，泰国海军整体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不仅战时具备了可以随时出动的前进基地，平时的海上救援行动中也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指挥、通讯中心，一定程度上有了掌控泰国湾等关键海域的初始作战能力。

一、研发背景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的成军，与泰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防战略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泰国国防战略重点是陆上边界，威胁主要来自东部的越南。上个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和



/ 泰国“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泰国在东部地区的防务压力大大减轻，一下子回到了久违的和平时代，其战略重点开始转向海上，由此加快了其海军建设步伐。泰国所拥有的海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泰国湾和缅甸海之间只有一座最窄处数十公里的陆桥相隔，这两个海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枢纽，泰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领海安全。和平时期，泰国海军除了肩负着保护国家安全、捍卫海洋权益的基本使命外，还承担着广泛的日常任务，包括海上救灾、处置海上犯罪事件、保护海洋环境，等等。

泰国是个台风灾害多发地

区，每年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而灾害一发生，就需要动用舰艇部队及时进行救助、疏散、医疗等。比如，1989年泰国发生过一场特大风灾，当时强台风席卷泰国南部，造成大量渔船沉没，沿岸民房倒塌，虽经海军全力援救，终因出动的舰艇吨位较小，活动距离有限，受海上条件制约较大，而力不从心，最终导致大量渔民和滨海灾民死亡或失踪。这场台风还对位于泰国湾西岸的春蓬、巴蜀等省的通信设备造成严重破坏。如果有一艘大型舰艇，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另外，泰国临近马六甲海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后视图。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右舷特写。

峡，近海为海盗猖獗之地，为了保护过往船只和海员的生命、财产免遭劫难，一有风吹草动，即要求海军能及时赶赴出事地点，出动舰载直升机快速解决问题。

综合以上考虑，泰国海军认为需要一个直升机海上机动平

台，用于完成其自身担负的使命和任务。最终，西班牙巴赞造船公司竭力推销的“轻型航母”方案，赢得了泰国海军的青睐。

二、舰船结构

(一) 整体结构设计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长182.6米，舰体宽22.5米，标准排水量7000吨，满载排水量11485吨，最高航速26节，自持力>15天，续航力7000海里/16节，编制员额600人(含航空人员)。该舰飞行甲板、动力系统、电力系统、损管系统及重要舱室等均按照欧洲军用标准建造，其余舰体结构、电缆管线、舱室隔断等均采用民用船舶标准建造，有效控制了建造成本。该舰舰载机采用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方式。舰岛位于飞行甲板右侧，由航海指挥舰桥、作战指挥舰桥、航空指挥舰桥和电子设备舱室等组成。烟囱及管线位于舰岛后部，作战指挥中心(CIC)和通信舱室位于舰岛的下层甲板，舰岛前侧设有1台起重机。全舰纵向设置了13道水密隔舱和3个独立消防区域，具备一定的抗沉性和损管控制能力。

动力舱在舰体底层甲板的前后2个舱室交错布置，各连接1套推进系统。该航母设有2个独立弹药库，能够装载约100吨航空弹药。由于该舰吨位很小，因此在舰底两侧设有展翼形防摇龙骨和2对自动化控制的稳定鳍，以提高船体稳定性，保障舰载机能够在4级海况下正常起降。

(二) 飞行甲板设计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采用轻型航母典型的“直

通甲板+滑跃甲板”设计，飞行甲板长174.6米，宽27.5米，滑跃甲板上翘12°，能够保证 AV-8S 舰载机以最大作战载荷滑跃起飞。该舰飞行甲板布置在船体偏左舷位置，起飞跑道的中线与舰体中线存在一个3°的夹角，主要是为了平衡舰岛一侧的重量，以保证重心落在船体中轴线上。飞行甲板设有5个直升机起降点，跑道右侧设有6个固定停机位，其余临时停机位需要进行甲板调度作业。该舰的典型配置为8架 AV-8S 舰载机和6架 S-70 直升机，由于2006年 AV-8S 舰载机已全部退役，泰国海军至今没有采购新型固定翼舰载机的计划，因此该舰目前仅作为直升机母舰使用。

（三）机库区域设计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的机库长100米，最宽处约18米，理论上可以存放14架各型直升机。机库中央设有防火帘和控制站，机库前部设有飞机维修间，机库内的舰载机调度由小型牵引车保障。该舰在舰岛前部和舰艏中部各设有1台舷内升降器，最大载重20吨，足以保证飞行甲板和机库之间的运输调度。该舰采用传统的弹药分段运输方式，机库内设有2部弹药升降机，主要保证甲板下层弹药库和机库之间的弹药运输，该升降机必要时也可以运输伤员。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飞行甲板。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机库内景。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在执行两栖作战任务时，还可以将机库改造为登陆兵舱，足以容纳600—7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

三、动力系统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

航空母舰采用柴燃联合动力（CODOG）和“双轴双桨双舵”设计，相比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的燃气轮机动力和“单轴单桨单舵”设计，更为经济实用和安全可靠。该舰装备了2台经典的通用动力 LM-2500 燃气轮机和2台 MTU-16V 型柴



/ 通用动力 LM-2500 燃气轮机。

油机，每个动力舱分别部署1台燃气轮机、1台柴油机和1套变速齿轮箱，共同驱动1根主轴尾端的可调距螺旋桨，总输出功率约4.4万马力，短时间最高航速可达26节，但巡航速度一般维持在16节左右。虽然该动力系统功率仅是3000吨级护卫舰的水平，但在建设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已能够满足泰国海军的需要。该舰还装备有2套独立的柴油发电机组和1台应急柴油发电机，总发电功率4800千瓦，主要为全舰提供电力供应。

四、船电装备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的作战指挥中心装备了西班牙“特里坦”(Tritan)战术情报指控系统，能够融合全舰各部位的作战数据和状态信息，具备泰国海军海上编队旗舰的能力。2012年，该舰由萨伯公司进一步升级了指挥控制系统(9LVMK4型)，使其具备与泰国空军“鹰狮”战斗机和萨伯-340“爱立眼”预警机进行



/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的航海指挥舰桥内景。



/ “萨德哈尔”导弹发射系统和 30 毫米舰炮。

数据链通信的能力。该舰安装了1部 AN/SPS-52C 三坐标对空警戒雷达、1部 AN/SPS-64对海搜索雷达、1部 STIR 火控雷达、1部 E/F 波段空中管制雷达、1套 URN-25“塔康”飞机战术导航系统、1套 MX-1105型“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1部舰壳声纳、1

套 AN/SLQ-32型综合电子战系统以及各类海上通信设备。该舰的自卫武器系统方面主要包括3座法国的6联装“萨德哈尔”导弹发射系统、2门30毫米舰炮、1套 AN/SLQ-25“水精”拖曳式鱼雷诱饵和4座 MK-137干扰火箭发射装置。

军语新解

□ 石评

刀光剑语(一百零二)

一张地毯足够两个苏菲派信徒栖身，这个世界却小得容不下两位国王。

——塞利姆一世

塞利姆一世(1467—1520)，奥斯曼帝国苏丹，著名的军事统帅，全名塞利姆·本·巴耶济德·本·穆罕默德·本·穆拉德，是奥斯曼帝国第9任苏丹，

奥斯曼帝国第8任苏丹巴耶济德二世的幼子，在位期间因手段严厉残酷被称为“冷酷者”。

塞利姆一世在他那个时代之所以威震四方，让对手不寒

而栗，在于他一生东征西讨、能征惯战，通过开疆拓土和武力征服，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一生发动过三次东征：第一次在1514年，目标波

(接前页)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使泰国海军能够筹组航母编队进行远海防御作战，以确保对周边国家的海上威慑，维护泰国湾至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通道安全。但是，泰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军费严重吃紧，无力维持航母的正常战备开支，因此，该舰大多数时候处于闲置状态，仅在2003年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反泰骚乱期间执行了一次海上威慑行动。尤其是该航母所使用的AV-8S舰载机是从西班牙购买的二手货，目前已全部退役，只剩下两架直升机能飞，因此这艘航母的出海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为节省训练经费，降低因长期停在港口带来的巨额开支，泰



/"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参加联合演习。

国军方决定将这艘航母改成一个爱国教育中心，在泰国的梭桃邑港口，只要花钱买票就可以登上这艘航母参观。目前，该航母每天都会接待大量游客，不仅赚取了该航母的维护经费，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同时，需要的时候，泰国军方会将其作为

海上救援和抢险救灾的海上平台使用，可谓是做到“物尽其用”。近年来，随着泰国经济逐步复苏，“差克里·纳吕贝特”号逐步开始换装新的雷达和指控系统，并重新维护和粉刷，以两栖攻击舰的新角色投入日常战备训练活动中。■

斯、阿塞拜疆地区的萨法维帝国，最终大败萨法维帝国的伊斯玛仪一世，把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拓展到安纳托利亚的最东端；第二次是1515年，东征吞并了周边两个小国杜尔戈地尔、库尔德斯坦，控制了从安纳托利亚进入波斯的路线，切断了西方到萨法维帝国的贸易；第三次是1516年，这次东征击败了马穆鲁克王朝，吞并了该王朝统辖的埃及、叙利亚、希贾兹、巴勒斯坦，之后，塞利姆一世又派海军入侵红海沿岸，占领了苏丹的萨瓦金、阿比西尼亚的马萨瓦和达赫拉克群岛。至此，塞利姆已成为“世界上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君主”，也令那时的周边国家惊恐不已，他们给了塞利姆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号——“征服者”。

塞利姆虽然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军事统帅和君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浪漫的诗人。他有用波斯语创作的诗集传世，其作品1904年曾在德国出版。“一张地毯足够两个苏菲派信徒栖身，这个世界却小得容不下两位国王”，就是塞利姆诗作中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这句看似很有诗意的话，却将人性的光辉与邪恶、人格的分裂与冲突，揭示得淋漓尽致。塞利姆身上就体现了这种矛盾性，作为一个诗人、作家，他可以出版厚厚的诗集，他可以和他赏识的哲学家、



塞利姆一世。

史学家和文人学士等栖身在一张地毯而毫不介意，甚至心有戚戚焉；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和帝国野心膨胀的国王，他又会毫不吝惜地砍下威胁他地位的人的头颅，不管这个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子女。塞利姆夺取王位后，随即杀死了他的两个哥哥，并把他们留在伊斯坦布尔的直系亲属全部杀掉。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保证他死后皇位能顺利传承，塞利姆在对20多位皇子进行考察并确定人选后，下令把除继承人外的其他儿子全部处死。

塞利姆说“这个世界却小得容不下两位国王”，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山不容二虎”。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记载的每个朝代几乎都以极为血腥的方式上演过塞利姆的“诗话”。秦二世胡亥逼

死了哥哥扶苏，并将他的兄弟姐妹集体处死；汉朝吕后把刘邦的8个儿子杀掉6个；唐朝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了做太子的哥哥和弟弟；明朝靖难之役朱棣夺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清朝康熙时期的九子夺嫡几乎没有人能安全地度过劫难，等等。这些人在面对君权诱惑时，多表现出或残忍、或疯狂、或孤注一掷的豪赌心态。

前些年，张艺谋拍过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很形象地揭露了皇权下的悲哀与丑陋人性。可以说，数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在争夺至高无上权力的斗争中，都将人性的温情摧残殆尽。其实，何止是皇权，但凡涉及到重大权力诱惑，又有几个人能置身事外呢？

一方面，权力具有腐蚀性，自由主义预言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也许是一个铁律。另一方面，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并非全由权力本身造成，也与人性的弱点有关，比如人多喜欢操纵别人、喜欢吸引别人的关注，再比如贪婪、自私、野心、权力欲等往往是人性的一部分。当权力与这些因素深度结合时，人性中的善良温厚等美德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难怪伯克说“权力会使人渐渐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真是一语中的。■

师生情 民族义

——记李济深先生对覃异之道路选择的影响

□ 覃珊

李济深先生是黄埔军校副校长，享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美誉。而我的父亲覃异之也在这两粤门生之中。

说到我父亲和李济深先生的情谊，可以从36年前父亲在梧州参加纪念李济深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写的一首诗说起：

纪念李任公老师诞辰一百周年

敬赋

春风黄埔岛，化雨桂林城。
为国求真理，革新结世英。
和平促统一，联共助中兴。
华夏今飞跃，高风启后人。

春风化雨是用来称颂师长教诲的，所以诗的前两句概括了李济深先生作为老师对父亲的影响和熏陶。父亲是1925年6月从桂军军官学校转到黄埔2期学习的学员，之后在黄埔军校还分别担任过第3期少尉副区队长、第4期入伍生连中队长；第6期少尉区队长、第7期少校副中队长等教职。之后即开始军旅生涯。在军校的日子，父亲跟随李济深



/ 李济深。



/ 黄埔军校时期的覃异之。

先生参加了东征，当时是宣传队队员。同为广西人，李济深先生对父亲除了有师长之情，更有一份对于家乡青年的嘱托。而父亲对于李济深先生倾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创办、筹备黄埔军校过程中，给予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尤为钦佩。黄埔军校的著名教官邓演达、陈诚、钱大钧等都是李济深先生推荐的教官。正是因为李济深先生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才使黄埔军校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于1924年6月顺利开学。当时，李济深先生被任命为军校教练部主任。1926年5月任副校长。

父亲1930年起即离开军校，正式开始军旅生涯。14年抗战中，父亲先后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在历次战役中，英勇顽强，将兵有方（关麟征将军语），拼死抵抗，取得了一些战功。特别是在长沙会战中“一战成名”，很多记者、作家都纷纷赴前线采访，包括剧作家田汉、导演史东山等，因此在社会上有了定声望。李济深先生和父亲都喜好以诗抒怀。父亲在长沙大战追击日军途中做了一首《夜行军》：

马首悬新月，三军气若虹。
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此诗经由记者们的报道而使李济深先生知晓。1943年春，父亲担任第52军副军长兼衡莱师管区司令，常驻湖南常宁县，因为家眷在桂林，所以回到桂林省亲的机会增加，而此时李济深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西南办公厅主任兼桂林行营主任。所以父亲每次到桂林，必定到李府拜见老师。在那里他碰到过柳亚子先生，当时李济深向柳亚子介绍父亲时说，我这位小同乡就是《夜行军》的作者。柳亚子先生马上说：“哦，就是‘星斗落杯中’将军，我知道！”所以他们在一起除了聊形势、政局，也常在一起交流诗词。父亲在李府经老师介绍认识的民主人士还有梁漱溟、千家驹等，父亲也在战场认识了田汉等人。大家在一起针对抗战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抗日民主运动，这对父亲日后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欲将共产党消灭。此时，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也在积极阻止内战。他凭着与国民党军队很深的关系和在政界的声望，积极劝说、策动老部下不要为内战卖命。1946年5月



长沙大战期间，覃异之(右)与田汉合影。

底，李济深与冯玉祥、谭平山、王葆真等一起乘坐“民联”号轮船由重庆前往南京时，特意到四川万县作短暂停留，就是为了说服当时驻守万县的父亲，当时，父亲担任青年军204师师长，是9个青年师长中唯一一个蒋介石钦点的。因为在抗战中，蒋介石不止一次接见过父亲，坊间都说他是蒋校长中意的所谓“天子

门生”。在李济深经过万县前，蒋介石也刚刚到万县视察了204师，对于父亲的将兵训练大为赞赏，离开第二天就发来贺电，予以表彰。所以此时的父亲还在头脑发热，沉浸在抗日胜利后建设国家的梦想中，鼓励青年军人们“接受时代的使命，抱定建国的决心，锻炼建国的技术，势将铁与血，写出中华民族光荣的

历史”（父亲作词的204师师歌），还没有意识到内战的危害。李济深先生下船以后，要求父亲带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有重要的话交代。于是父亲把老师带到万县公园的外宾接待室，老师说：“蒋介石对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任何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一心要发动战争。我们今天必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只有和平、民主，国家才能复兴，人民才能休养生息。目前看来，内战不可避免，你首先必须设法避免参加内战，其次，如果有机会也尽力劝说一下校长。”这次谈话使父亲触动很大，头脑冷静下来，开始考虑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及道路。后来，父亲升任52军军长、第8兵团副司令、首都卫戍副总司令等职，始终对内战抱着反对的态度，并在1949年8月在香港和黄绍竑等43名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起通电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起义后，父亲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赴香港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为解放台湾积极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才回到内地。父亲受邀参加了政协和民革的工作，而李济深先生则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从1925年到解放后，李济深先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始终深深感召、影响着父亲。李济深先生晚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事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李济深先生却重病在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以诗言志：

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老师的教诲和遗愿也一直是父亲后来工作的方向，父亲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七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其间，为祖国统一殚精竭虑。父亲亲历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向着他年轻时的理想突飞猛进，对此，他感念颇深，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充满信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我有幸随辛亥革命先贤后裔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习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



作者（右）与李济深之女李筱松参观党史馆时合影。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更坚定了我们祖国统一的信心！随后，我又随嘉宾团参访了广州和中山，寻光而行，寻找初心。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从李济深先生及父亲一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我们血脉相承的使命。在此仅以一首小诗表达我的感触：

一脉炎黄血，相承报国志。
求索复兴路，百花沐东风。
统一宏愿在，要见九州同。（注）
台海回归日，奉酒告任公。

注：李济深诗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江南塞北 兄弟情深

——黄埔学子张新与高宪岗的莫逆之交

□ 高燕茜

张新(1902—1985)，浙江省浦江县七里乡仙里村人，黄埔3期生，字作民，意为振作精神，奋发图强，立志做个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人。

高宪岗(1910—1990)，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高泉营村人，黄埔9期生，字雪樵，意为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如风雪中的砍柴人。

张新与高宪岗皆出身寒门，自小都天资聪明，忧国忧民，成年后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洪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张新曾经参加过东征讨陈及北伐战争。两人都曾参加抗日战争。张新在1938年台儿庄血战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92师552团团团长，英勇奋战而身负重伤，当时他37岁；高宪岗于1936年即为29军少校参谋，主管军队调动及教育计划并掌管部队驻地。1937年七七事变当天，日本人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时，正在值班的高宪岗立即报告29军军长宋哲元，当时他27岁。

他们两人虽然出生地一南一北，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们是1943年在四川泸州石洞镇相



/ 高宪岗黄埔9期毕业照。



/ 张新黄埔3期毕业照。

高
宪
岗
二
十
五
綏
遠
薩
拉
齊
縣
平
民
醫
院
雪
樵

遇的，当时他们共同服务于胡宗南部第76军，张新时任副师长，高宪岗任师参谋长。其实，高宪岗于两年前胡宗南在陕西王曲办的上校以上军官训练班学习时就目睹过张新的风采。当时，张新作为黄埔七分校学生总队长，正带着学生在野外演习，高宪岗作为参观者，对张新一手插腰，一手挥舞着慷慨激昂地为学生讲评的姿态印象颇深，但那时两人互不相识。后来，二人成为同壕战友，倍感亲切。尤其正值抗日时期，他们朝夕相处，同仇敌忾，英勇奋战，亲如兄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最令他们兴奋的是76军24师的湖北当阳受降经历，那是一个多么神圣、扬眉吐气的时刻！8月25日，他们奉命接收日寇120师团占领的当阳、宜昌、荆门、宜城、钟祥、江陵、枝江等地的战场阵地。由24师组成受降先遣队，高宪岗作为师参谋长担任了接收大员，率部接收日寇97旅团投降，与日军指挥官中森恒二协议投降事务。他们这支200人组成的队伍，人人身高体健、威风凛凛。洽降命令像紧箍咒一样震慑了日军，他们共遣送日军俘虏6000余人。受降完毕，张新副师长召集当地父老

乡亲商定，将无从查明、不能归还原主的家具，发给当地百姓每户一件，受到群众的好评。

张新与高宪岗志趣相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张新大哥喜欢宪岗小弟天真又带三分“痴”的性格，常说，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他们在四川驻防时都不喜欢“舵把子”的山珍海味，却常去街头吃牌坊面，去时开口总是“只可苗多（豌豆苗）不可肉少”。老板娘总是响亮地回答：“要的要的。”真是妙不可言！他们两家相邻而居，来往甚密。张新爱吃高宪岗太太李沂烧的北方特色菜羊肉炖胡萝卜，高宪岗也爱吃张新太太做的南方红烧肉。由于高宪岗常爱念叨自己家乡的大青山、土默川、萨拉齐，张新也深深记住了这些地名，以至于常称呼高宪岗为萨拉齐。他们俩的亲密关系国共两方皆知，就在张新加入解放军队伍时，一个解放军高官与他谈话时说，你的萨拉齐不久也会过来的。

两兄弟后来的命运也颇为相似。

1947年10月，张新于陕北清涧之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秋，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张新被周恩来、彭德怀和习仲勋选中去策反胡宗南。张新舍命闯敌营，以大义劝说胡宗南起义，但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被打入死牢，备受凌辱。他不忘使

命，要求必须见胡宗南一面。后胡宗南三次从监狱传见，张新劝其弃暗投明。胡宗南起初似有所动，后又不听，监禁更严。是冬，胡宗南部南逃，张新被押至四川金堂县途中逃离了虎口。问道潜入成都，利用各种关系策动胡部起义，迎接第一野战军贺龙部进城。西南解放后，张新被贺龙任命为高参，负责改造裴昌会兵团起义军官，因工作卓有成绩，屡受中共西北局表扬。1948年，张新在西北军区时，贺龙还送他一条从日本军官那里缴获的军用毛毯御寒。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任师长的张新因战绩突出，被毛泽东指名道姓写入作战方针指示中，那份亲笔电文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常年展出并收进《毛泽东选集》，在《彭德怀自述》中亦有评说。

高宪岗是1948年11月在陕北永丰之役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几个战役，曾受军管会委派，领导抢修兰州黄河铁桥及修复飞机场的工作，受到中共西北局的嘉奖，被西北军区司令部委以重任。彭德怀司令员对高宪岗的评价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红军使用了白军的军事力量。我们解放军参谋本部也培养和使用了高宪岗这样的典范，他勤

勤恳，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西北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将军说：“高宪岗是个爱国军人，纯军人，是军事科学家，他在瓦子街、咸阳、三关口、兰州等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到了兰州后一直参加经济建设。”在高宪岗去世后，范明发来唁电：“高宪岗同志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参加西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任职的国民党高级军官。40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积极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以此缅怀悼念。”

张新与高宪岗虽然任过国民党高官，但加入解放军后都是正式的革命军人，离队时受颁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证书。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都受到共产党的重用，被任命为部队企业的创业领导人。1950年2月，高宪岗奉命创办部队企业，担任甘肃省共和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和烟草公司经理。为建设部队企业做出成绩，受到司令部的嘉奖。后来，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高宪岗依然想为国家再做些事情。1983年，经彭德怀原一野的参谋长阎揆要及甘肃省党委书记王世泰介绍，安排高宪岗到甘肃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担任省政协终身委员。



/ 1981年,张新全家在浙江浦江县仙里村老屋前合影。



/ 1989年,高宪岗的子孙为他庆贺80大寿。

张新因为思念故乡,转业回到浦江老家。他先是献出全部安家粮谷支援国家,后又捐出很

多修屋木材,兴办学校。他在生产队当过饲养员、保管员、记工员等,自力更生养家糊口。他

还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自从1951年与高宪岗在兰州分别,二人再未见面,但两人的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后,形势越来越好,高宪岗便想到给曾在浙江日报社工作的张新长子张若莹写信,由此与张新取得了联系,两个老朋友喜出望外。得知张新生活困难,高宪岗便开始为老哥落实政策而奔走。此时的高宪岗已身患胃癌,但子女们对他隐瞒着病情。他拖着病体多次去兰州军区及有关部门询问关于张新落实政策的事。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们相隔两地,通信问候,乐此不疲。高宪岗不断写信鼓励张新

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使张新在烦难中得到不少安慰。

张新气管炎严重，高宪岗给他寄去皮背心，还托人买了贝母寄给他，告诉张新将贝母与梨煮在一起吃。张新给高宪岗寄了浙江名产金华火腿，让他在春节加一道菜。高宪岗还经常写信告诉张新改革开放后的喜讯，尤其令他激动的是去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见到许多老同学，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并合影留念。北京会议后，他又去西安参加关于《解放战争期间西北战场亲历记》的汇稿会议，答应书出版后立即寄给张新。他还寄给张新去各地开会时与老同学的合影。这些喜讯让张

新可高兴了一阵子。30多年历经沧桑，今天尚能通信往来，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能办到的。

据张新的后辈说，他在临终的那些日子，天天盼着高宪岗的来信，每逢给他读信，他都精神一振，眼睛为之一亮，似乎病也好多了。张新晚年写了许多回



高宪岗外孙女岳宁宁于2006年回乡扫墓时，特意带上国家给姥爷颁发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章，以告慰姥爷的在天之灵。

忆文章，登载在全国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及报刊杂志上，特别是写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接见他的文章以及关于策反胡宗南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1985年8月13日，张新离开了人世。高宪岗沉痛不已，从兰州发来挽联：“忆昔相处音容笑貌在眼际，惊悉噩耗兰山浦水共伤情。”按照张新生前的嘱咐，子孙们将他的骨灰撒在家乡仙华山下，浦阳江中，以肥沃浦江大地，报答人民养育之恩。

1990年元旦前夕，高宪岗离世，享年81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们将他安葬在背靠大青山、面向土默川的家乡热土。

（作者高燕茜为高宪岗之女）

“黄埔后代”栏目征文启事

长期以来，生活在海内外的黄埔后代，在传承黄埔精神、践行黄埔使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记录黄埔后代的故事，展示黄埔后代的风采，激励更多的黄埔后人继承黄埔先辈的伟大志业，赓续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本刊“黄埔后代”栏目向广大黄埔后代征文。

征文要求：1. 内容为黄埔后代在先辈“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感召下，传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做出

的贡献；2. 稿件请附本人简历、文章配图及图片说明；3. 稿件中注明作者电话、地址、邮编等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档，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后代”；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电子邮箱：hpz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

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曹燕

施复亮夫妇与黄埔军校

□ 陈予欢

施复亮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组织的成员之一，参与组建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和译作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有过突出贡献。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武汉分校学员组成的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夫人钟复光同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夫妇二人对于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和训练有过重要贡献。

参与创建中共早期党团组织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用名方国昌、光亮、子元、施伏量等，1899年11月12日生于浙江金华县金东乡叶村。9岁入本村私塾启蒙，习读四书五经。1914年9月考入本乡高等小学堂读书，后转入金华县长山高等小学续读。他学习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优秀，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1917年由舅父资助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陈望道、夏丏尊等。



/ 施复亮。

1919年，他45岁的母亲饱受丈夫的打骂虐待，贫病交加，不幸离世。母亲早逝对施复亮刺激很大。他不断苦苦思索：“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时，《浙江新潮》向他约稿，他随即发表《非孝》一文。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他名扬大江南北。同时，舆论哗然，认为他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复亮被迫

离开学校，引发轰动一时的“一师风潮”。

1920年1月，他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3月27日，赴上海入《星期评论》社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沈玄庐、戴季陶、沈仲九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来到中国上海。5月初，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复亮、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戴季陶起草了党纲，施复亮、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6月，陈独秀、施复亮、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陈独秀还邀约戴季陶、俞秀松、施复亮、沈玄庐、李汉俊、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渔阳里六号密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宜。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复亮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休养(得了肺病)。9月，他与日本社会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多次讨论社会主义如何实践问题。1921年4月，陈独秀、

李达介绍施复亮与周佛海联系，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旅日共产主义小组。4月下旬，陈独秀致信施复亮，指定施复亮为该小组的负责人。初夏，陈独秀写信要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施复亮比周佛海更具备代表资格，但由于周很久没有回家，最后由周佛海作为东京小组的代表出席会议。施复亮失去了参加这次伟大历史性会议而名留史册的机会。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十多个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

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派张太雷来到东京，施复亮介绍他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不幸的是，12月，施复亮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关了十多天。12月27日，施复亮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这一时期，施复亮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等深受读者喜爱。1922年1月9日，施复亮回国抵达上海，受陈独秀指派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并兼任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青年时期的施复亮。

的工作，筹备召开青年团一大。2月22日，他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会议，决议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并邀请少共国际派代表指导。同日，临时中央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名义，在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刊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即发出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3月下旬，少共国际代表林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局讨论召开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问题，陈独秀、施复亮、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参加座谈和讨论，同时成立筹备青年团一大的组织处。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现省港大罢工旧址）召开。5月10日，选举施复亮、俞

秀松、蔡和森、张太雷、高君宇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林育南、张秋人、冯菊坡为候补执行委员，施复亮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后因身体原因，施复亮辞去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

一文一武出人才：推进上海大学、黄埔军校政治教育

1923年8月下旬，邓中夏聘请施复亮和恽代英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施复亮负责主讲“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等课程。这所学校名义上系国民党举办，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革命熔炉和红色摇篮。1924年，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他担任的社会学系主任一职由施复亮继任。同时，施复亮还兼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

1926年1月，施复亮与当时就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共产党员钟复光结婚。他特地镌刻“复光复亮”图章送给钟复光，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施存统改为“复亮”，还作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表明他们亲爱无间共同奋斗的心声。同年10月，施复亮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并兼任政治训练委员，常到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从此与黄埔结缘。根据黄埔军校第5期全校政治教官任课分配表显示，

他以政治教官身份为学生授“现代社会剖析”等课程。12月初，应邀到广州国民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作《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演讲，后来随军参加北伐到武昌。1927年1月底，施复亮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教授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国际职工运动史”“中国农民问题”等。其间，他还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特别党部秘书长。4月，他因撰文《反蒋运动》被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缉。4月23日，施复亮又被委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于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国都，所以武汉分校改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后又任学校政治部主任和由学员编成的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他与陈毅、恽代英组成中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委，任党委委员，夫人钟复光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

复亮复光，黄埔之光

1919年，16岁的钟复光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并办起了平民夜校。1921年暑期，川东教育界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

“夏令讲学会”，聘请几个“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前来讲课，钟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并认识了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邓中夏、王德熙等。

钟复光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住在向警予家里。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向工人宣传革命、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处处走在前面。后来，她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肖楚女作邻居。邓中夏和恽代英每天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钟复光做些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交给钟复光一个任务，即牵头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向警予的领导下，她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活动，起草了相关文件和宣传资料，工作非常出色。这年，她经向警予、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钟复光与向警予、刘清扬等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向警予因工作脱不开身，钟复光和刘清扬先行抵达北京。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主要靠钟复光。钟复光首先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并遇上四川老乡赵世炎。三八妇女节这天，赵世炎把她带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她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北京党组织随即指示她参加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工作，与邓颖超等四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治丧活动结束后，向警予发来指示，要求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界联合会。经过20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钟复光被公推为临时主席。随后，钟复光返回上海，筹备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

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当天晚上，钟复光同工人们一起来到南京路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进行宣传。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同班的四川老乡何秉彝当场牺牲，大家义愤填膺，第二天仍进行示威游行。这天，钟复光和散发传单的4位女同学被巡捕抓进捕房，经过不断斗争后，她们当晚被释放。此后，钟复光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武汉、长沙、宜昌、重庆等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学生和妇女大会，并在会上作演讲。因频频演讲过于劳累，以致

痰中带血，她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这时，施复亮闯进了她的感情世界，两人也由相识到相恋，结为夫妻。

1926年1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决定招收女生队，这是黄埔军校史上最早的一期女生队，被列入黄埔军校第6期。钟复光与彭漪兰、唐惟淑（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陈启修夫人）3人被委任为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负责女生队的训练管理工作。黄埔军校开办女生队，招致各界阻挠。恽代英曾语重心长地对钟复光等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钟复光等人深感重任在肩，全身心地投入到女生队的工作中。他们带头换装，和学员一起参训、生活。开学典礼上，女生队同男生一样装束，着深灰色军装，紧束腰带，戴军帽，打绑腿，个个英姿飒爽。军校生活开始后，女生队和男生一起学习训练。她们从早上5点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半睡觉，忙得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钟复光与女生队在大革命浪潮中，真正体验到了战火硝烟与生死攸关考验。施复亮与钟复



1927年，施复亮、钟复光夫妇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合影。

光夫妇二人为黄埔军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二人投身革命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施复亮青年时代就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作，在当时就是颇有影响的活动家和理论传播者，受到陈独秀的赞许。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更是青年团最初

组织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他与中国共产党许多第一代领导人都有交集联络和书信往来，留下了许多那个时代的红色印记。他先后在上海大学、黄埔军校任教，为中国共产党培训了许多杰出的军政人才。施复亮夫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追忆和缅怀。■

黄埔四期生李逸民的传奇人生(上)

□ 陈宇

黄埔4期毕业的李逸民，在新中国开国将帅中的经历别样特殊，甚至可以说是另类的独一无二。他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身份考进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黄埔日刊》编辑，那时的黄埔师生谁人不晓他的大名？他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却把监狱变成“学校”，不但自学英文，读懂《密勒氏评论报》，手绘出红军长征路线图，还通读古今中外名著，苦读10年成为了文化大家，他的智慧、勇敢和坚韧精神令人感佩和尊敬。



/ 1925年，李逸民在黄埔军校。

以笔为枪的《黄埔日刊》编辑

李逸民，原名叶书，字有基，乳名怡菁。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泉县天平乡（又称东乡，今安仁镇）李登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相传，春秋战国时代的“龙泉宝剑”就诞生于此地，民间广泛流传着欧冶子铸剑的故事，舞剑习武风气甚浓。李逸民的父亲年轻时也习武术，且名气很大，24岁曾考中武秀才。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为了不让女儿过穷苦日子，资助李逸民的父亲做木材生意。李逸民的父亲从家乡买来大批木材，通过瓯江运到温州出卖，并开设了一个



/ 《黄埔日刊》。

地，他成为标准的富家子弟。但父亲以商为重，少年李逸民在该读书的时候却没有进学堂。

据李逸民回忆：“父亲性格特别粗暴、贪婪而且吝啬。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父亲的打骂中度过的。他脑子里装的只有‘发财’二字，一心只想积钱买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感到往后的日子很难熬，对父亲那样的人更没有任何指望。”为了摆脱家庭的桎梏，李逸民向母亲提出了读书的要求，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后来还是由二舅出钱，李逸民才开始进入求学时代。

少年李逸民聪明好学，有理想，有抱负，立志将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1919年李逸民15岁，在二舅的支持和资助下，李逸民和小他一岁的表弟季步高一同进入大舍小学读书，此时他们已算是大龄小学生。由于他们平时喜欢学习，识得一些字，老师把他们编在四年级。他们表兄弟二人仅用一年时间，就拿到了初小毕业文凭。

1920年考入高小后，李逸民因看不惯学校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而与教师发生激烈冲突，被学校

木器行，几年后发家致富。李逸民8岁时，家里买进了上百亩土

开除，转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附小就读，表弟季步高也随他一起进入该校。同年冬，李逸民和季步高都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录取，但李逸民性格中对恶势力的反抗意识常常显露在外，不久，他又因与校方发生激烈矛盾而退学。

1922年1月，李逸民和季步高通过关系冒用别人的名字，进入杭州法政学校就读。在这里，他们开始接触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思想，从此打开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其中有《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和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外，李逸民还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作品，由于他从小就想冲破家庭的束缚，觉得无政府主义解决问题更为痛快，因而思想上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法政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后，同年夏，李逸民和表弟季步高从杭州考入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中文系就读。不久，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将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也到上海大学任教，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到上海大学作过报告，学校的新思想十分活跃。

李逸民回忆：“记得李大钊、

陈独秀都到校作过报告。讲得最多的是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他们一来就是上大课，实际上是作大报告。只要是他们讲演，中文、英文等系都自动停课，让学生们去听。整个学校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恽代英，他一口的湖北音，很有口才，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既讲国内外大势，又讲国共合作，还讲工农联盟，内容广泛而又联系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富有鼓动性，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就是在恽代英和其他老师的循循善诱下，逐步增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开始对共产主义有所认识，从而坚决摈弃了曾经一度崇拜过的无政府主义。”（《李逸民回忆录》，第9—10页）

1925年初夏，在李逸民即将从上海大学毕业时，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这次运动的大本营。在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李逸民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也经历了五卅惨案。他亲眼目睹了外国资本家和军警的残暴，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思想认识上又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

作为一个爱国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李逸民深刻体会到和平游行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人家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们也必须用机关枪打过去”。

他深感学生的无力，意识到中国想要自强，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放弃大学学业，也放弃了即将领到的大学毕业文凭。同年9月，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推荐和帮助，李逸民（时仍用本名叶书）和表弟季步高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与谢晋元、彭士量等同在第3队，开始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熊雄主任还亲自介绍李逸民、季步高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李逸民和黄埔军校部分同学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在校期间，国共两党的矛盾日渐激化，李逸民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弟季步高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控制的黄埔军校感到失望，便离开军校到广州工会工作，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

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是军校内中共党组织的主要领导，饶来杰公开职务是政治部图书馆管理员，实际上领导中共在军校内的组织工作。黄埔军校政治部有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因此，政治部实际上成了军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1926年10月，4期毕业的李逸民因文采出众，在熊雄的指示下留校任政治部宣传干事，负责编辑校机关报《黄埔日刊》。这是一张对开报纸，由宣传科

长安体诚，宣传股长宋云彬、尹伯修和李逸民4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尹伯修任主编，兼编国际新闻版（第3版）；李逸民负责校闻版（第1版）和文艺版（第4版）。该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教育进步同学，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有不少黄埔生在该报影响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黄埔日刊》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组稿，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稿源比较充足，基本不需要本校本报撰写文章；第4版也比较好组稿，各部队来的散文、小说、新诗投稿比较多；李逸民负责的第1版“校内新闻稿”组稿编辑相对比较难，因为党政军活动、校领导讲话都要登，但又不能全登。如蒋介石的讲话不登不行，全登也不行，因为他的许多言论有问题，需要经过整理和编写，稍有疏忽，就会出岔子。

李逸民刚开始编稿时感到有些吃力，稿子编完后送宋云彬、安体诚审查，重要内容特别是蒋介石等校领导的讲话，政治部主任熊雄还要亲自审校，所以往往比其他版发稿迟，常常改到深夜12时才齐稿。安体诚对工作非常负责，晚上陪着几位编辑看过大样后才离开，这时候天已快亮了。宋云彬能写会唱，特别喜欢唱越剧、昆曲。工作休息

时，他会独自唱上几段《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使紧张的工作带几分轻松感。他诗韵和新旧文学很有功底，常写生动活泼的散文。有时第4版缺稿，急需“救”版，李逸民就找宋云彬赶稿。一段时间以后，在大家同心协力下，李逸民编稿觉得不怎么吃力了。《黄埔日刊》最多时发行200多万份，在部队和群众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编辑工作中，李逸民多次向政治教官肖楚女请教，得到了他很多帮助。肖楚女经常提醒李逸民，对蒋介石的言论要特别注意，好的可以登一些，坏的绝不能登，千万不要上当，否则政治上会犯错误。肖楚女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写文章也很有功夫，给李逸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两人为此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此外，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也给了李逸民极大帮助。李逸民在上海大学时就听过恽代英的课，两人很熟悉。恽代英总是笔不离手，一有空就写文章，《向导》《中国青年》以及广州的左派刊物常常登载他的文章。恽代英有一个单人办公室，李逸民每次去，总看到他伏在桌上写作。他不用稿纸，拿起毛笔就在信纸上写，速度非常快。李逸民负责的《黄埔日刊》第4版缺文章找恽代英时，恽代英从不推辞，总说：“好，你出题目。”李

逸民出完题目，恽代英马上就动笔写，他写好一页，李逸民就送一页去排字，等恽代英写完了，铅字也排得差不多了。恽代英答应李逸民写的文章很少用真名，每篇都随便起个名字。但由于文章具有独特风格，很幽默，所以同学们一看便知道是恽代英的文风。

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前方逐渐暴露，广州的空气也开始紧张起来。右翼分子特别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相当嚣张，他们公开要求《黄埔日刊》登戴季陶的演讲稿。熊雄、安体诚等共产党人坚持不登，那帮人就闹事、造谣、攻击，甚至扬言要砸编辑部。1927年3月，《黄埔日刊》被迫停办。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也在“清共”，形势异常紧张。4月16日凌晨3时，李逸民焚毁《黄埔日刊》的底稿后，用背包带套住窗外的梧桐树，顺树干溜下去，逃出了虎口。在广州城内，他约见了表弟季步高。见面后，这两位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的表兄弟从此分别。

季步高在本年底参加广州起义，次年香港做中共地下党工作时被捕，英勇就义。李逸民与表弟季步高从童年到小学、中学，再到上海大学、广州黄埔军校，20多年来形影相随，感

情很深。季步高的牺牲，带给李逸民的伤痛是巨大的。

李逸民到汉口后找到恽代英，恽代英把他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师长叶挺）教导大队第3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第24师教导大队是新成立的，战士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刚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青年团员占多数。大队长孙树成（黄埔1期），副大队长申朝宗（黄埔3期），教导员李明珂（黄埔4期）。大队共有400多人，团编制，下辖3个队（营），以下是排、班建制，没有连的编制。因对外是大队称谓，营又称队（有称中队），营长即队长，与李逸民搭档的是队长向虎（浒）。第3队辖3个排，3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第3队驻在南昌百花洲职业中学内，粟裕当时是一名班长。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李逸民立即动员本队官兵参加起义。但是，其他队有一队长顽固不化，无论如何开导都不同意，并暗中把枪运走了。李逸民得到报告，枪刚刚被那个顽固不化的队长运往户井巷的仓库，准备天亮后再转移。从驻地百花洲到这个仓库约有5公里，李逸民立即带着3名战士狂奔到仓库。这时，那个队长也刚刚到仓库，李逸民举枪就打，将那个队长击毙，拿到了枪，

带领本队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此时，蒋汪宁汉合流，公开勾结，联手反共，形势十分险恶。起义军主动放弃南昌，教导大队随主力部队迅速南下，在会昌城附近经数小时激战击溃敌军。

李逸民回忆会昌战斗时说：“战斗基本结束后，叶师长命令我们教导大队去搜查敌人的司令部、师部、团部机关。我和向队长带着战士……追上了敌人，枪一响，敌人如惊弓之鸟，有的被打死，大多数吓得跑散了，枪支弹药丢满一地，战士们只顾捡枪和子弹，耽误了追击敌人的时间，让敌人跑掉了。回到会昌城，我们又挨了叶师长的批评：‘你们拣那些破枪干什么？主要是消灭敌人，你们打死了多少敌人？’我们说：‘打死不少，但没有数。’叶师长笑了笑说：‘派几个人去数一数，究竟打死了多少？好向司令部汇报。’又问：‘你们俘虏了多少？’向虎同志回答：‘抓了两名排长。’叶师长说：‘太少了！’”（《李逸民回忆录》，第52—53页）这段对话，饶有风味地记述了叶挺将军在前线指挥的风采。会昌一战，缴获了5000多支枪，由粟裕带的一个班装上船，运往东江。

南昌起义部队继续南下广东，在汤坑战役中伤亡严重。李逸民率领一个100余人的连队守一个山头，激烈战斗后仅剩40

多人。李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在天后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排善后工作。我这个不足两个班的连负责警卫。天亮时，司令部通知说：首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撤退了。于是，我们向海陆丰方向走去。”

战斗在狱中的“无期徒刑”军事犯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李逸民的部队在向海陆丰撤退的路上被打散，李逸民转移到上海继续开展工作。他找到党组织，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他被派去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主要是做广西军阀白崇禧部的工作。

1928年春，李逸民突遭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看守所，曾与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等关在同一个牢房。在审讯中，李逸民自称是上海同德医科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将原名叶书改为“李逸民”，从此即以这个名字为正式姓名。也正因为改名，隐蔽了真实身份，国民党审讯人员到处“查无此人”，又很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从李逸民这里得到口供。狱方虽然想尽办法逼供，但始终一无

所获。最后只好草率结案，以军事重犯判处李逸民“无期徒刑”，把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1930年，押送到苏州军人监狱。1932年，又押送到南京的中央军人监狱。其间，李逸民在上海、苏州单人监狱里关了5年多，几乎丧失了讲话的能力。

李逸民认为：“共产党员只要有办法，就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主张。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是无罪的。”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战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他在狱中始终坚持这么做，为此争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为他送信、买东西。

李逸民先后被关押在上海、苏州和南京三地。国民党的监狱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一间约8平方米的牢房要关10多个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臭虫、跳蚤、虱子到处都有，臭气冲天。每天吃的是拌有沙子、老鼠屎且发了霉的臭饭和没有一点油腥的烂菜，而且还不给吃饱。除了恶劣的生存环境，殴打和谩骂更是经常有之。李逸民每次活动时，还要戴上一副15斤重的大脚镣。监狱中还充斥着党内的叛徒和敌人的密探，每次说话都要小心。非人的生活待遇，夺去了一些狱友的生命。

为了改善这种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狱中的中共党支部成员一起，曾经多次

组织罢饭斗争。1930年春节前，李逸民等人在漕河泾监狱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罢饭斗争。监狱当局怕饿死人，在答应一些条件的同时，又调来宪兵队残酷镇压。李逸民被吊在柱子上毒打，但他没哼一声。他被放下来后已是遍体鳞伤，但他仍然坚持斗争。

在狱中的最困难时期，李逸民仍对狱友关怀备至。他的表哥季步峰在上海行医，每月给他寄20多块钱。他除了买几本书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外，把钱全部交给党支部使用。有时候，他托人买来一点萝卜干或香肠，切成小片分给狱友，他自己从来不吃一片。他还买来肥皂、牙粉送给没有经济来源的狱友。有一年，由于营养不良，苏州军人监狱中许多难友得了脚气病，有的甚至被夺去了生命。李逸民千方百计从表哥那里要来了维生素B针剂，另外还用钱买了一些，但他自己一剂也没有用，全部交给了党支部，集中用在病情最严重的同志身上，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1932年，李逸民、张维桢等100多名政治犯被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按常规，“犯人”只能坐运牲口的铁皮车。李逸民等人坚决反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并向监狱当局提出坐客车的要求。经过斗争，监狱当局不

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上车前，李逸民向押送的国民党士兵晓以大义，告诉士兵这些“犯人”是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士兵不要虐待这些政治犯。许多士兵听过他的宣传后，在车上没有对政治犯进行迫害。

在漕河泾监狱和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期间，李逸民都是狱中党支部委员。当时，狱中的囚犯成份非常复杂，政治犯除多数是共产党人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托洛茨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少数叛徒。对于非党员的政治犯，李逸民除了团结他们同监狱当局斗争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一次，国家主义派买通监狱当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监加以“优待”，李逸民也在其中。这样一来，虽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但是会脱离狱友群众。李逸民等人坚决拒绝了这种“优待”，又回到阴暗的普通牢房。

李逸民在监狱中遭受各种刑讯迫害，他的右手臂被打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但李逸民始终坚贞不屈，组织被捕人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风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李逸民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坚信不疑，坚定而顽强

给了二科，结果被罚打了五个手心。”（《李逸民回忆录》，第89页）李逸民的地图册不幸被狱警发现，给自己招来了一顿毒打。那张“红军长征路线图”也被没收，不知所踪，太令人惋惜了。后来有学者根据《密勒氏评论报》的相关报道，曾又重新绘制了“红军长征路线图”，但与李逸民在狱中的手绘图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出版物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1936年8月5日开始组织编撰、1937年2月22日编成的《二万五千里》，1942年11月20日改名为《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公开出版，国内出版的“长征史”主要来自于此。另一个是《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斯诺写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出中文版《西行漫记》。斯诺的这本著作，内容多来自于《二万五千里》，只是在公开出版时间上早于国内。延安版本和斯诺版本都附有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但在印行出版时间上这并不是最早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目前见到最早印行出版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是1937年3月在北平秘密出版5000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出版）所附“红军



《逸经》。

长征路线图”，有资料说是由斯诺从陕北带回交给本书主编王福时，其实不然。据王福时回忆，是他请东北流亡学生康德一帮助绘制，拿到虎坊桥附近一家小印刷所制版，最后交《外交月报》社的东方印刷厂印制。《外交月报》社长王卓然是王福时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开印行的一张“红军长征路线图”。

此外还有1937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署名“幽谷”（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的化名，董健吾曾护送斯诺到陕北）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原文分为两部分，正文登载于7月5日出版的第33期《逸经》杂志（夏季特大号）“今代史料”栏目，共有9760余字，记录了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附表登载在7月20

日出版的第34期，即“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正文随文附有3张图片：“毛泽东像”“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之一（自在借用）”，还有一张即是“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由江西瑞金县始至陕西吴起镇终）”，本图虽然画得“潦草”且简单，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和终点及经过的重要地点标注得都很清楚，这张图比《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的附图清晰，更加一目了然。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历尽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密勒氏评论》周刊的新闻时效性很强，对中央红军的行踪有简要报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11月进行直罗镇战役，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1936年2月至5月投入东征山西的作战中，根本没有闲暇时间总结刚完成的长征，直到8月5日才开始组织编撰“长征亲历记”。李逸民那幅狱中自绘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应完成于1935年10月底的红军长征结束之时，在时间上可能是第一幅手绘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并且是由上海监狱中共党员“囚徒”完成，体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埔名将李宗仁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

□ 韩淑芳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广西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代总统，抗战时期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李宗仁在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中，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来正面战场的伟大胜利，

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65年，漂泊海外16年的李宗仁毅然回归祖国，希望尽余生之力促成祖国统一大业。

建勋台儿庄

周密部署。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乘势进犯津浦线南段。12月下旬，津浦线北段日军进攻山东，其第10师团渡过黄河占领济南后沿津浦线南下，



/ 坐镇前线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



/ 蒋介石(中)、李宗仁(左)、白崇禧视察台儿庄。

呈南北夹击之势的两路日军兵锋直指津浦线上的战略重镇徐州。日军一旦占领徐州，势必西进郑州、南攻武汉。台儿庄地处山东南大门，是徐州东北之门户，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境，自古就是南北漕运枢纽，同时又是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线，设有南北两个火车站。台儿庄因水路、铁路交通便利，素有“水旱码头”之称，也是南下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中日双方势必在此浴血争夺。李宗仁根据台儿庄城的地形特点制定战略计划，以善于防守著称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驻守台儿庄。其中，黄樵松第

27师、张金照第30师分别布防在运河一线以及台儿庄西部；池峰城第31师主力坚守台儿庄城内，并以部分兵力分置台儿庄东西两侧，用以支援城内作战。当城内的巷战打到胶着状态时，再由装备精良的汤恩伯第20军团在枣庄以北的抱犊崮山区拊敌之背，对日军进行南北两面夹击。

感化宿敌泯宿怨。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所以，从一般民众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谁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然而，当板垣征四郎亲自挂帅进攻临沂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中日全面开战之初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会迸发出巨大的战斗力。当时驻守临沂的是庞炳勋第40军，此人在内战中善于保存实力，但是在民族危亡时刻，庞炳勋率军苦战临沂，面对日军的精锐部队毫不畏惧。几天的搏杀消耗，庞军渐感不支，情势十分危急。李宗仁命令张自忠第59军赶往增援。由于内战中庞炳勋曾偷袭过张自忠的军营，致使张自忠险些丧命，因此，张自忠虽然表示愿为抗战牺牲一切，但是唯独不愿意支援庞炳勋。

李宗仁从抗战的民族利益出发，晓之以大义，使张自忠毅然摒弃前嫌，支援宿仇庞炳勋，二人携手并肩作战，使临沂战局得以扭转，将板垣师团阻击在临沂一线，最终使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为最终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重要条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大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接纳川军，共同御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川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抗战烽火燃起的时候，川军毅然出川抗战，但是因为其装备落后等原因，各个战区（一战区程潜，二战区阎锡山）都不想让其加入，而李宗仁坚信“无不可用之兵，只有不可为之将”，毅然将川军收入第五战区。3月的鲁南春寒料峭，当川军身着单衣、脚踏草鞋来到台儿庄前线，李宗仁没有急于分配任务，而是先为这支部队补充枪支，让千里迢迢赶来的川军有了归属感。在滕县保卫战中，装备极其落后的“杂牌军”川军在师长王铭章的带领下，以土造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大刀片重创了日军有“钢军”之称的两个精锐师团，阻挡日军三天三夜，为台儿庄中国军队的布防争取了

宝贵的时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可见滕县保卫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亲赴前线，坐镇指挥。台儿庄战役期间，李宗仁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同时便于指挥，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徐州。由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弃济南、泰安、兖州，致使津浦线门户洞开，日军第10师团长驱直入，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暴露在敌人面前。蒋介石提出把司令长官部迁到河南商丘和安徽亳州，但李宗仁认为徐州交通发达，通讯便利，距离台儿庄前线较近于作战有利，如果司令长官部迁到商丘或亳州，一切情报和命令全凭无线电通信，很容易被敌人截获，于指挥不利，同时也容易动摇民心和军心，为此坚守在徐州。战役期间，李宗仁坐镇司令长官部调兵遣将，并多次到台儿庄前线视察，与将士们商讨作战计划，鼓舞士气。1938年4月7日，李宗仁亲自下令，我军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守城官兵与援军内外夹击，日军不支，仓皇溃逃。4月8日，台儿庄战役终于取得胜利。当天，李宗仁亲赴战场慰问伤员并查看战利品，在台儿庄火车站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如今，台儿庄火车站已经



1 毛泽东(右)与李宗仁亲切握手。

建成李宗仁史料馆，由原李宗仁的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题写馆名，1999年对外开放。

叶落归根，回归祖国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李宗仁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在美国漂泊16年，日夜思念养育他的热土，午夜常梦见抗战中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

声明让李宗仁兴奋不已，他看到了回国的希望。他立即写信给程思远，表达对周总理声明的共鸣。随后，程思远五次赴京面见周恩来总理，为李宗仁回国做准备。

1965年7月29日，李宗仁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多个国家，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在首都机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原国民党将领以及1949年南京和谈代

表等1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走下飞机舷梯的一瞬间，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机场大厅内，李宗仁庄严宣读回国声明，表示自己将尽力于祖国的统一事业。回国后的李宗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极大的礼遇。同年国庆节，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庆典活动。毛泽东主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对他亲切地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你。”1968年8月初，李宗仁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留下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弥留之际的肺腑之言，足见其诚挚的爱国情怀。

李宗仁先生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几十年，一生几经坎坷起落，青春戎马，晚节黄花。抗战是他一生中最闪耀的部分，爱国是他的立身之本，晚年毅然回归祖国，赤心爱国，名留青史，叶落归根，晚节可风。

■

军旅十二年 两立三等功

□ 丁冕

杨伟英，1925年7月出生于湖北监利，7岁入读私塾，194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在入伍生团1大队2中队受训。抗战期间，随军校师生开赴老河口，在汉江沿线的三官殿至青山港一带布防月余，后转入西安第七分校第20期步兵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5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46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司令部作训科军事教员。曾在第二次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四道沟战备训练中被师直党委记三等功两次。



佩戴两枚志愿军三等功奖章的杨伟英。

抗日布防 分校师生临危受命

1945年4月，日军侵占老河口，企图侵犯襄河西岸。三官殿至青山港一带没有部队防守，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的第19期全体师生和入伍生团官兵奉命前往布防，持续月余，终使日寇企图未能得逞。

杨伟英回忆：“当时，我们正在野外进行常规的军训演练，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大家知道是去打日本鬼子，顿时士气高涨。我们带上窝窝头、玉米等干粮，背着枪支子弹，就奔向战场了。部队的驻扎

地距离战场大约30公里，我们要在两个小时内赶到。”

说起布防时的情形，他说：“当时，日本鬼子派出了骑兵旅，驻在河的对岸。四五月份，汉江水涨得不高，鬼子会骑战马进攻。”面对日寇的攻势，“我们筑起堤坝防御，可以从孔洞里看见日本鬼子的进攻”。

讲到与日军的战斗，杨伟英提高了声调：“我们打日本鬼子有方法，要看见（发现），再清楚（看清楚），进了射程再打。”他还回忆，当时四五月的草料不好，日军的战马吃了咽不下去，再加上雨雾天气，让日本鬼子吃

了亏。

在青山港阻击日军大约一个月后，部队换防，八分校的师生退出战场返回学校继续学习。没多久，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杨伟英说：“当时我们没有收音机，是从学校的大字条幅看见的，大家都很激动。”后来，第八分校裁撤，全部师生被并入西安王曲的第七分校。杨伟英经过考试，由入伍生升入军士教育阶段，成为第20期步科学生。“我记得，一开始我们从湖北到西安是坐汽车的，叫烧炭车，连30度的小斜坡都上不去，后来我们干脆把行李放在车上，自己下车走路。”徒步行军大约一个月后到达王曲。杨伟英在第七分校继续了一年多的学习，1947年6月（提前）毕业，被分配到部队，在第1师第1旅第3团迫击炮连任排长。

抗美援朝 军事教员战备立功

1949年12月，杨伟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46师，先后在贵州省铜仁军分区政治部教2队、司令部训练股工作。1951年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离黔北上。他们先是在华北地区集结待命，9



/ 杨伟英(右一)和战友在雪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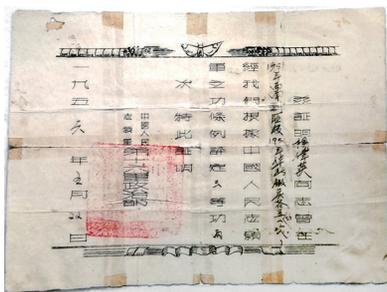
月中旬开赴东北。16军第47师先行入朝担任咸兴地区的海防，46师则在东北通化地区整训待命。杨伟英被调入作训科任军事教

员。当时志愿军正在准备第六次战役，46师作为二线部队，主要任务是做好战备训练，提升部队的作战水平。由于在黄埔军

校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军事训练，又曾在迫击炮连服役，杨伟英对迫击炮、重机枪、火箭筒等多种兵器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术都较为熟悉，能制定教案、基准表及一般的教学计划，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多次得到上级肯定。1952年12月，根据轮换作战制度安排，第16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部署在安州、价川、球场地区，担任西海岸第二线的防御，主要任务是反空降、反登陆等。入朝前，杨伟英在四道沟战备训练中表现优异，被46师直党委记三等功一次。

此时，志愿军已经基本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联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已经无可奈何。由于停战谈判被美方搁浅，为防备美国进行最后的军事冒险，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志愿军以打好“过关仗”的姿态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西海岸是志愿军司令部确定的反登陆筑城第一重点方向。杨伟英回忆，部队入朝后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几乎是全员参与，从前方到后方，从部队到机关，从战士到干部，甚至连特种兵都参加了构筑防御工事作业。施工期间正是朝鲜最寒冷的一二月份，气温很低，一般都在零下20至30摄氏度，冻土有1米多厚。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在敌



/ 杨伟英立功的证明。



/ 杨伟英被授予志愿军三等功后留影。

人登陆前，筑好筑牢防线。施工炸药不够用，他们就自己动手拆除敌军投下和发射的未爆炸炸弹代替，施工工具不足，他们就用的废钢铁自己打造。当时，文工团和宣传队有时也会深入工地给大家宣传鼓劲，活跃部队生活。在广大指战员的昼夜突击下，仅4个月时间，东西海岸线和正面战线，共挖坑道720余公里，堑道、交通壕3100公里，完全改变了东西海岸阵地工事脆弱的局面，形成了绵亘1130公里的以坑



/ 荣获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的杨伟英。

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完整防御体系。

入朝后，第16军仍是二线部队。上级指示各部队要在构筑工事的间隙，以训练干部为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训练。于是，担任海岸防御的各部队，重点进行了反登陆、反空降、反坦克的基本战术和步、炮、坦克协同战术训练。杨伟英主要负责轮训班以下干部，并组织火器使用训练。1953年4月，杨伟英调至第16军46师军士教导营担任军事教员、参谋。在教导营期间，杨伟英按时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得到了营长王占魁的好评。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

愿军开始分批撤回国内。留守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维护停战协定严防侵略战争再起的同时，抽调力量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杨伟英回忆，刚开始，主要是连队官兵协助当地老百姓清理废墟、修建房屋、填平弹坑，帮助他们尽快安居、恢复生产。后来，还组成施工队，参加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和农事劳动。第二年，志愿军司令部下令，规定连队和机关的大部分人员都要参加劳动。1955年，杨伟英被授予中尉军衔。

1956年6月，杨伟英从朝鲜回国，9月复员到江门。1958年3月，第16军全部撤回国内。 

我的父亲李继贤

□ 李运生

我的父亲李继贤是抗战老兵中的一员。父亲去世整整8年了，但他老人家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

22岁违背爷爷意愿，投笔从戎

父亲生于1915年，山东莒县人，家境殷实，17岁时就读于山东临沂五中（高中），因日军侵华，山东局势紧张，被迫肄业。为避战祸，爷爷托人把父亲带到南京继续求学，准备让他出国留学。但日军在中国国土上的暴行让父亲愤然投笔从戎，于1936年报考了南京丁家桥陆军交辎学校。爷爷闻讯后气得大病一场。家人也来信责问，父亲答复：“家国都没有了还读什么书？”同时向军校考官表达了坚定的抗日愿望：“参军抗战就是为了打回山东老家。”最后，父亲通过层层筛选成为首批进入军校的学生。

在军校学习一年后，由于南京战事吃紧，陆军交辎学校搬迁到湖南长沙石家冲，后改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由于父亲学业优秀，1938年由学校推荐，进入广西六分校（黄埔15期，教育长吕竞存）学习。父亲在其自传中提及当时生活之艰难，“每天

都有日机轰炸，但所有的步兵训练、野外生存训练等从未因此间断，轰炸一过大家又从头开始训练，要学很多科目，管教很严。就这样，我的绘图科目、驾驶科目学习还得到过嘉奖。除训练，当时我们还要负责日夜的站岗执勤，有一天，校后门负责站岗的两名同学就被日机炸死了……水电也无法保障，基本没有可换洗的衣服，身上都长虱子。这样的情况持续约有半学期。白崇禧来视察后，情况才有所改善。每人发了3套衣服，周日放假1天，每月还发5元零用钱，加上家里每月汇来的10元，生活好多了。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家里的联系就断了”。原来，山东老家出事了，家里来了土匪，爷爷被打伤生命垂危。父亲向军校请假，化装成商人辗转返乡，冒险赶回被日军占领的山东老家。可父亲刚进村还未进家门，就被村里的汉奸认出，并向日军告密。一位亲戚得知消息赶紧拉住父亲：“日本人派兵抓你来了，快跑。”父亲不得不连夜逃离，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留下了终身遗憾。

24岁血战昆仑关，夺得日本军旗

1939年12月，爆发了昆仑关战役。“我们被选出来的学员随新11军行动，军长是徐庭瑶。”父亲告诉我，当时他还在广西柳州军校，与很多同学一样还未毕业。按规定学员是不能上前线的，但战况惨烈急需援兵，军校紧急挑选了部分优秀学员配合军队行动。他们主要负责开车将弹药送往200师戴安澜部，再将伤员拉到医院。

那是父亲第一次真正走上战场。“开始还有点害怕，后来看到随时都有炮弹炸响，随时都有人倒下，就无所谓了！”父亲回忆道，“开车返回时，路边有些伤兵无法得到及时医治，疼痛难忍，看见我们驾驶的汽车经过，就艰难地挪到道路中间，向我们比手势，希望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结束他们的痛苦”。遇到这种情况，父亲都停下车，坚持把伤兵往柳州陆军医院拉。“后来在医院的伤兵不管认不认识，只要看到我们的车队都会敬礼。”

“我们有时还要负责打扫战场，要把自己人从阵地上抬下来，把敌人堆在一起，等他们的人来拉回去。”父亲淡淡地说道。有一次，他打扫战场时，发现有

一个日本伤兵手中紧紧攥着一面日本军旗。父亲冲上去一把从他手中夺过军旗，并带回了学校，受到嘉奖，父亲将所得的银元全用来与同学分享。关于这事，我问过他有没有干掉那个日本兵，他淡然地说道：“他只是将死之人，老天自会收他，黄埔军人从不杀俘杀降。”

25岁带领南侨机工，战斗在滇缅运输线上

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成立于广州。1938年9月，因抗战局势的急剧恶化，西南运输处内迁昆明，奉命统辖滇缅公路所有物资运输，确保这条“抗战大动脉”的通畅。1940年先后以军车为主成立了21个汽车运输大队，另外还专门成立了全部由爱国归侨为司机，驾驶由华侨同胞自带或捐赠车辆的华侨先锋1、2大队。

父亲军校毕业后，就分到西南运输处下关华侨运输1大队3中队任少尉分队长，负责车队的培训和管理。父亲回忆道：“华侨对人很好，学习热情也高，有时行车路上吃饭都不要我们出钱，但南方（云南）的吃食总是不对我（北方人）的肠胃，我经常是饿着肚子跑车。南方边境湿热得很，头发很容易生虱子，有时候没有条件，我们就只能用



/ 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



/ 南侨机工在滇缅边境。

汽油来洗头……我们从越南（河内）、缅甸（仰光）、腊戍把燃油、弹药枪炮、药品、机械等好多军用物资拼命往昆明、成都、汉中拉……然后又从国内把桐油、猪鬃、生丝、锡等运到国外去交换。”滇缅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蜿蜒于滇西崇山峻岭之间，既要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

还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道路艰险环境恶劣，加上云南多雨，修好的道路时常被山洪冲毁。很多路段只能由美军临时用推土机开出一条一车宽的路面，路基松软需要在上面铺上树枝和钢材才能通行。但弯急路陡行车还是非常不安全，经常有车辆坠落山谷造成人员伤亡。

父亲虽然车技熟练，也曾翻车滚落山涧，所幸被救，住院治疗3个月才痊愈，留下头痛和手挫伤的后遗症。父亲对我讲：“最危险的是还要躲日军的空袭和沿途特务、土匪的抢劫。”为此，每个驾驶员都配了枪支弹药，随时准备战斗。

就这样，父亲他们把各类战略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稳定了军心民心，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直到1942年5月日军占领仰光，切断滇缅运输线，中美盟军被迫开辟了“驼峰航线”后，父亲才调回贵阳机场，任少校后勤连长。内战开始后，父亲抱病告假回到母亲的老家荣昌。

抗战胜利后告假回乡，暗中保护中共地下党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回到重庆，在大坪安家。1948年，母亲多年未曾见面的亲戚肖先生（公开身份为荣昌女子中学教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重庆荣昌，任务是发展党员和协助地下组织迎接重庆解放，曾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据父亲回忆，那段时间，肖先生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出去，早上回来，时常错过饭点，父亲就把给我们买的点心拿给他充饥。解放前夕的重庆弥漫着白色



／ 李继贤夫妇。

恐怖，母亲在那段时间整日担惊受怕，曾问父亲肖先生晚上都去干嘛了。父亲回复道：“我也是当学生过来的，咋会看不出……我只是军人，不会管学生们的事情。”后来，父亲为了安全起见，白天派人在我家大门前站岗，从而把肖先生暗中保护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肖先生曾在重庆市政府组织部门担任负责人。那时，我外婆及肖母都还健在，外婆还带我去肖家玩过。但父亲是个明理的人，再困难都未向生活低头，也未向肖先生寻求过帮助。直到60年代末，我将赴外地工作，临行前和肖先生告别时，第一次听他亲口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住在我家时的一些往事，在这之前，我父母从未向我们提起过。肖先生送

我出门的路上，对我说：“你父亲为人很仗义、正直。”

晚年参与黄埔活动，给曾孙留下家书一封

父亲自从参加九龙坡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从未缺席过一次学习，每次出发前都要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把鞋刷得干干净净，像过节一样，然后让我们送他去学习。有一次我问他：“爸，你这么爱黄埔，咋个当时没有去台湾？”他沉思片刻，慢慢回答我：“不想走了，我的老家在山东。”隔了一会儿，可能想到台湾的战友和亲人，又说道：“唉，统一就好了。”

2005年，父亲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 李继贤给曾孙的信。



/ 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郭相彦（右）看望李继贤（前中）。



/ 晚年李继贤。

章。

2014年5月，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为父亲举办100岁纪念活动。在接受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和四川省巴蜀抗战史研究院录像采访时，父亲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最后说：“我对国家是有功的，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

2013年，和父亲相伴70多年的母亲走了，父亲经常一个人闭目沉思。2014年的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我们去四公里（母亲安息处）去看看你妈妈。”在母亲墓前，他沉思后问我：“这里面朝北方的吗？”回忆起父亲曾

经和我提及他希望走后能面北望见山东老家，我默默地点头。父亲慢慢转身伫立眺望，喃喃自语道：“向北方，向北方……”我这才发现曾经1.78米的父亲在山风中已经驻足不稳了，赶紧快步上前扶住他。几天后临近中秋，父亲叫给我找来纸笔，他给他的曾孙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

……

咚咚，祖爷爷可能看不到您成年之时了。作为李家后人，希望您在今后漫长的人生路上，一定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时时刻刻都要远离毒品，生活要有规律。人活在世上是很艰难的，但您一定要坚强，对世上万物都要

有一颗爱心：爱父母、爱爷爷、爱奶奶、爱外公、爱外婆、爱自然、爱这个世界……

祖爷爷颠簸了一生，没有什么物质留给您，留给您的只是祖婆婆和我对您的爱和想念。您一定要相信智（实为知）识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希望您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知识、身心健康的人。

民族要复兴，国家还没有统一，中山先生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您一定要争取做一个有为的人，有社会责任的人。但愿那一天，您能替我回老家山东莒县看看，家祭无忘告老翁。我和祖婆婆会在天上保佑您，我的乖曾孙李咚阳。👍

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组织管理系统(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三、中央伤兵管理处隶属伤兵检查所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伤兵检查所(伤兵纠察所),对伤残官兵的伤残等级进行评定,借此给予相应的治疗、照顾、补助和抚恤(表3)。我们查到第一到十四伤兵检查所,但尚缺第三、六、八伤兵检查所;还有5个由城市命名的伤兵检查所:苏州、

樊城、洛阳、商南、武昌伤兵检查所。伤兵检查所在1941年5月改称伤兵纠察所。

伤兵检查所的编制都不大,一般都是官佐12名,士兵8名。能查到的记录,仅第十伤兵检查所1943年2月被缩编,官佐由12名减为10名。各伤兵检查所都有大体固定的驻地,但他们的工作是根据需要不时到各医院、

残废军人教养院、临时残废院等有伤残官兵地点,去进行伤残等级评定。

四、休养院、教养院、临时教养院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休养院(表4)收住轻伤病官兵,以及各种医院治疗后,伤情基本治愈但仍需一段时间休养的官兵,同时负责休养员的编练事宜,以利于归队。1937年10月,蒋介石命令限期成立十所伤兵休养院,分设于南京、杭州、安庆、武昌、九江、南昌、开封、信阳、长沙、西安。1937年12月,中央伤兵管理处指示各地伤兵休养院、伤兵检查所均改用数字番号。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一到第十休养院。也许还有更多的休养院,作者目前尚未发现。

休养院一般都比较大,如第二休养院1942年8月由吉安移驻永兴,但其第一、八两队依然留驻吉安,证明这所休养院至少有8个队的建制。1938年3月颁布的《中央伤兵管理处休养院编制表》显示:休养院总部在编官佐22员,士兵45名,每中队队部官佐9员,士兵82名,可见其编制是不小的,至于每队收住的

表3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伤兵检查所

伤兵检查所 (伤兵纠察所)	成立时间	所在地	编制	
			官佐	士兵
苏州伤兵检查所	1937年10月	苏州	12	8
樊城伤兵检查所	1937年11月	樊城	同上	
洛阳伤兵检查所	1937年11月	洛阳	同上	
商南伤兵检查所	1937年11月	商南	同上	
武昌伤兵检查所	1937年12月	武昌	同上	
第一伤兵检查所	1938年5月	衡阳	同上	
第二伤兵检查所	1938年2月	巴东	同上	
第四伤兵检查所	1938年2月	长沙	同上	
第五伤兵检查所	1938年2月	金华江山	同上	
第七伤兵检查所	1940年2月	曲江	同上	
第九伤兵检查所	1938年3月	万县	同上	
第十伤兵检查所	1938年4月	吉安	同上	
缩编	1943年2月		12-10	10-8
第十一荣誉军人纠察所	1943年6月	常德桃源	12	8
第十二伤兵检查所	1939年1月	桂林	同上	
第十三荣誉军人纠察所	1941年9月	宜川	同上	
第十四荣誉军人纠察所	1942年3月	下关	同上	

休养员就更多了，一般150余人。

教养院的原名是残废军人教养院，顾名思义，教养院是为残废军人设立的修养机构。但有的休养院内会将其中的一个队，改为临时教养队，就是在轻伤的休养院里，也会出现一些留下残疾的官兵，因此将他们单独编为一队，作为残废军人来照顾。如第一、二休养院下设一个建制队，改名为临时教养队，专门收治二、三等残废官兵（一等残废是重残）；第一休养院有两队、第六休养院有一队专供收住湖南各院残障官兵；第七休养院下设的临时教养队主要收治广东的轻伤残官兵。第八休养院1943年10月从樊城移驻云南省，收容远征军管区的修养官兵；第十休养院第四队移驻蜀河，收容第五战区各院的修养官兵。

教养院有教养院和临时教养院之分，教养院原名残废军人教养院，临时教养院原名临时残废军人教养院，总之不管是不是临时的，只要是教养院就是收容残废军人的机构。有临时二字只是因战场和战役变化纷繁，伤残官兵会随时随地大批出现，就临时建起一个残废军人教养院（临时残废院）。但事实上，一个临时残废院建起来比较容易，撤销却比较复杂，收治的残废官兵不是战役结束了就可以完全救治好的，会延续很长时间，所以

表4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休养院

伤兵休养院 (荣誉军人休养院)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备注
南京伤兵休养院	1937年10月	南京	蒋介石命令限期成立
杭州伤兵休养院	同上	杭州	同上
安庆伤兵休养院	同上	安庆	同上
武昌伤兵休养院	同上	武昌	同上
九江伤兵休养院	同上	九江	同上
南昌伤兵休养院	同上	南昌	同上
开封伤兵休养院	同上	开封	同上
信阳伤兵休养院	同上	信阳	同上
长沙伤兵休养院	同上	长沙	同上
西安伤兵休养院	同上	西安	同上
第一休养院	1938年8月	莱阳	
以两队	1938年10月		专收湖南各院残障官兵
下设建制一队改为临时教养队	1941年3月		收治二、三等残废官兵
	1938年11月	兴安	
第二休养院	1938年8月	吉安	
	1942年8月	永兴	一、八两队仍驻吉安
下设建制一队改为临时教养队	1941年3月		收治二、三等残废官兵
第三休养院	1938年3月	屯溪江山	
	1942年9月	浦城	
第四休养院	1938年8月	万县	
第五休养院	1938年4月	长沙	制发纪念章，院长徐孝安
第六休养院	1938年8月	邵阳马鞍山	在职官兵400余，休养员6中队，每中队150余人
以一队	1938年10月		专收湖南各院残障官兵
	1940年9月		南北伤兵内斗死近百人
	1942年秋	湘西芷江	
第七休养院	1938年2月	方城	
	1938年10月	祁阳	
	1939年5月	武冈	
下设建制一队改为临时教养队	1940年12月		收治粤省伤残官兵
	1942年冬	湖南武冈	院长少将刘蕉元，黄埔1期
第八休养院	1938年2月	樊城	
	1943年10月	滇省	收容远征军管区休养官兵
第九休养院	1940年		制发休养院休养纪念章
第十休养院			制发还我河山军官纪念章
第四队		蜀河	收第五战区各院休养官兵

许多临时残废院几乎就一直延续下去。我们收集到的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的资料比较完善（表5），可以由此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收集到的临时残废院

（所）有21所，排序从第一到第二十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另有大别山荣誉军人临时教养所（1940年10月成立）。它们绝大多数都成立于1938—1940年间，只

表5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

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编制	
			官佐	士兵
第一临时残废院	1938年2月	宜都	49	129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二临时残废院	1938年2月	湘潭	49	129
	1939年7月	嘉定		
改称第二临时教养院	1940年7月	宜宾		
第三临时残废院*	1938年3月	宝鸡-湘西	49	129
第四临时残废院	1938年6月	洪江	49	129
	1938年11月	镇远		
下设工艺股	1941年7月		19	3
第五临时残废院	1938年8月	零陵	49	129
改称第五临时教养院	1940年7月	郴县		
	1943年4月	永兴-长宁		
收战前残废军人新淦残废院,改为第六临时残废院	1938年8月	江西新淦	49	129
下设工艺股	1939年4月		19	3
	1938年10月	兴国		
第七临时残废院	1938年8月	全县	49	129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八临时残废院	1939年5月	宝鸡	67	192
改称第八临时教养院	1940年5月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九临时残废院	1939年2月	长寿	49	129
改称第九临时教养院	1940年5月			
编制调整	1942年11月		42	9
	1943年6月	陕西兴平		
下设工艺股	1940年8月		19	3
第十临时残废院	1939年3月	浦城	49	129
	1942年10月	连城		
第十一临时残废院	1939年7月	芷江	67	129
改称第十一临时教养院	1940年12月	景靖屯垦		
第十二临时残废院	1939年11月	中渡	67	192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十三临时残废院	1939年11月	天水	67	192
改称第十三临时教养院	1940年5月			
下设工艺股	1940年8月		19	3
第十四临时残废院	1940年1月	郴县	67	192
改称第十四临时教养院	1940年5月			

(表格未完,转下页)

有第十九和二十两个临时残废院分别成立于1941年和1942年。它们的编制都比较大,建立比较早的从第一到第十临时残废院(1938年到1939年3月)编制官佐49名,士兵129人,第八临时残废院和第十一到二十临时残废院成立晚于1939年5月,编制更大:官佐67名,士兵192人。临时残废院几乎未见缩编,只有第九临时残废院1942年11月编制调整为官佐42名,士兵9人。

实际上,中央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总管理处)1940年11月修正的教养院编制,分甲乙丙三种:甲种编制官佐78员,士兵177名;乙种编制官佐58员,士兵128名;丙种编制官佐42员,士兵89名。这是很大的编制,一个教养院的编制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的编制。但实际执行时可“按实际需要予以调整”,调整后往往比规定的编制要扩编很多。如1940年12月成立第十八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时,按丙种编制定员,依规定应该是官佐42员,士兵89人,但最后确定的在编官佐67员,士兵192名。官佐超编25员,超编60%;士兵超编103人,超编116%。军政部允许这样大幅度超编,说明大量伤残官兵对院方形成的压力之大。

休养院、教养院和临时教养院不仅编制比较大,而且任官

(接上页表格)

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编制	
			官佐	士兵
下设工艺股	1940年8月		19	3
第十五临时残废院	1940年1月	洪江	67	192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改称第十六临时教养院	1940年5月			
	1942年6月	长汀		
第十七临时残废院	1940年2月	祁阳	67	192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十八荣军临时教养院	1940年12月	富平	67	192
下设工艺股	1941年7月		19	3
第十九荣军临时教养院	1941年12月	洪江	67	192
第二十荣军临时教养院	1942年6月		67	192
	1942年9月	云南平彝		
大别山荣军临时教养所	1940年10月	大别山		
盲残教养院改名盲残院	1942年10月			
定名荣誉军人第一盲残院	1943年7月	四川嘉定		
荣誉军人第二盲残院	1943年7月	陕西褒城		

注释：设在陕西褒城的第二盲残院收容西北各教养院盲残官兵；

* 感谢西安蒲元先生提供该院在宝鸡印发同院录的信息。

级别也比较高，一般这些院的院长都相当于各省或战区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的级别。如先后担任第三和十三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少将副处长的刘蕉元，黄埔1期，后来就被调任荣誉军人第七休养院院长；陕西荣誉军人管理处上校副处长张超，调充第九教养院院长。副处长刘蕉元，由于战伤截去右腿，虽装上假肢，但行动仍很不方便，整天坐在办公室批阅公文。他小孩多，均在读书时期，仅他一人薪俸抚养一家五六口人，生活颇为艰苦。

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名称没有数字排序的，只有大别山荣誉军人临时教养所。另外有两个盲残教养院，后改称盲残院（1942年10月）：荣誉军人第一盲残院，驻四川嘉定；荣誉军人第二盲残院，驻陕西褒城。后者收容西北各教养院的盲残官兵。

关于工艺股的设置值得注意。该股应该是组织伤残官兵进行工艺活动，包括各工种技艺和手工艺，这既可以令伤残官兵学习体能可以承担的技能，以便出院后自食其力，又可以培养安静平和的心态，非常有利于伤残

官兵的身心健康。由表5可以看出，第一、四、六至九、十二至十五、十七和十八临时残废院均下设了工艺股，而且编制都是官佐19名，士兵3人。

1942年1月，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修正了《荣誉军人教养院、临时教养院工艺股编制》，指出过去各院工艺股编制不一，为统一编制及加强工作效能而进行修改。当时在编官佐1226名，士兵8名。这个数字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示：每一所荣誉军人教养院、临时教养院都设有工艺股。因为总的在编编制官佐1226名，而临时教养院每一工艺股官佐19人，为加强工作效能按25人算，现收集到的临时教养院（所）共23所（包括盲残院2所），按25所计，临时教养院占用编制 $25 \times 25 = 625$ 名。余下的 $1226 - 625 = 601$ 名为教养院所用，如果也按每院25人计，应有24所荣誉军人教养院，但目前我们只知道有第三、五、六、七、八、九6所教养院和第一、二两个校官教养队（表6），这有待我们去挖掘档案资料来完善。

据我们前文《再造百万抗日雄师》（《黄埔》杂志2022年第2期）所引李文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43年1月24日，全国设有教养院8所，临时教养院20所，临时教养所2处，校官教养所1处，盲残院1所。这与本文中给出的

临时教养院（临时残废院）20所一致；教养院8所也与我们发现的大体一致（表6）；临时教养所这里只有一处，较上文所引少一处；校官教养所（队）较上文所引多一处；盲残院多一所，因第二盲残院成立于1943年7月，晚于上文统计时间（1943年1月）。

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2015年征集到一册位于宝鸡的《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同院录》。该同院录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3月，伤残荣誉军人即将复原之际，为激励战友“永保既得之荣光”而编印的。其中共收录8个队2448名伤残军人和35名行政管理人员姓名、年龄、住址及军衔，包含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于休养员的组成为我们提供了确实的信息。现仅据同院录第一队的303人的组成开列如下：

少校荣员4人，上尉荣员13人，中尉荣员17人，少尉荣员13人，准尉荣员6人

上尉荣士9人

荣誉中士27人，荣誉下士21人

上等荣兵53人，一等荣兵53人，二等荣兵27人

病残上尉2人，病残中尉1人，病残少尉2人

病残上士3人，病残中士3人，病残下士3人

上等病兵29人，一等病兵16人，二等病兵1人

上述组成可见休养员总体可分两大类：因抗战而致伤残的荣誉军人和抗战期间因病致残的官兵。这再次证明临时教养院不仅收住因抗战而致伤残的荣誉军人，而且同时收住抗战期间因病致残的官兵。前者具有荣誉名衔：具有准尉以上军衔者称“荣员”或“荣士”；士官前冠以“荣誉”二字；各等级兵伤残者称荣兵。因病致残的尉官和士官在军衔前冠以“病残”二字，各等级兵病残者称病兵。从第一队两类休养员的数据看，因抗战而致伤残的荣誉军人243人，抗战期间因病致残的官兵60人，总体休养员303人，因病致残的官兵占总体休养员的比例是19.8%，大约1/5。

宝鸡《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同院录》标注的荣誉名衔，是该院自行议定的，亦或是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中央伤兵管理处）决定的，尚无档案资料判定。

此外，该《同院录》还提供了该院35名行政管理人员由两部分人员组成，即28名院部行政管理人员和7名院政治指导室的政工人员。后者虽然只有7人，但级别却比较高，政治部指导员军衔为上校，与院长同级。其实在院部的组织结构中，已经设有中

校训育股主任，训育股本身就负有休养员教育指导的政治工作责任。在院部之外另设政治指导室，而且政治指导室的指导员明确是政治部指导员，显然是上级政治部派遣下来的，可见有关当局对休养员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

根据有限的关于教养院的资料（表6），可以知道教养队（包括盲残队）的编制大致在官佐10—11名，士兵20—22人，共计30—33人之间。第七教养院内仅第四队（盲残队）就有35人的编制，收容桂贛盲残官兵。我们没有发现教养院的编制人数，但从第七教养院4个队的编制总计应不少于 $35 \times 4 = 140$ 人，虽然略少于临时教养院的 $49 + 129 = 178$ 人，但大体上在同一水平上。如果一个教养院有5个队，那么其编制就是 $140 + 35 = 175$ 人，就和临时教养院的178人很接近了。另外从表6所列教养院中，亦有第五、六教养院下设工艺股，而且其编制与临时教养院工艺股相同，都是官佐19名，士兵3人。其实应该存在20多所教养院，而且每院都设有工艺股，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发现。

五、中央伤兵管理处其他下属机构

荣誉军人感化所

1940年6月，中央伤兵管理

表6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教养院

教养院(队)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编制		备注
			官佐	士兵	
第三教养院	1938年中	万县			
第五教养院					
下设工艺股	1941年6月		19	3	
第六教养院					
下设工艺股	1941年7月		19	3	
第七教养院	1941年3月	祁阳			
下设第四队改为盲残队			35		收容桂赣盲残
第八教养院	1942年3月	浦城—江山			
	1942年6月	连城			
第九教养院		霁川			
荣誉军人第一官校教养队	1941年12月		10	22	
增编	1942年5月		10+1		
荣誉军人第二官校教养队	1942年11月	湖南芷江	11	20	收容192名校官
	1943年3月	黔阳			

处成立了两所荣誉军人感化所。收容不守纪律之伤残官兵，施以感化教育。每所编制官佐8名，士兵40人。第一荣誉军人感化所由第二临时教养院拨一队干部组建；第二荣誉军人感化所由第十七临时教养院拨一队干部组建。中央伤兵管理处为此专门制定了《荣誉军人感化所简章》，并于1942年1月对其进行了修正。同时成立了第三荣誉军人感化所，核准定编为官佐12名，士兵22名。

荣誉团

1937年12月，中央伤兵管理处指示：各省和各战区伤兵管理处成立荣誉团，并指定担编单位，划定地区，给养直接拨

领。荣誉团是收编伤愈官兵加以训练，以便以更强的战斗力重上前线。1938年2月，河南、江西、安徽、湖南等省伤兵管理处成立荣誉团，规定团部编制为官佐20名，士兵26人；团编3个大队，每大队编制官佐8名，士兵11人；大队编4连，每连官佐5名，士兵142人。每个荣誉团总编制官佐104名，士兵1763人。1938年8月，皖西、豫东、鄂西、鄂北已愈伤兵划归第五战区伤兵管理处，编组为荣誉大队，以利归编。1938年，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朱费隐为湖南伤兵管理处处长，就曾兼湖南荣誉团团长。在此期间，时任18集团军驻湘代表的中共元老徐特立，曾对当时处理伤

兵的政策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1943年6月，中央伤兵管理处颁布了《荣誉团队调整办法》，其中规定：为加强对荣誉团的管理，强调荣誉团军官任用以负伤者及有正式军校出身者为原则，现有军官中非负伤及无正式军校出身确成绩欠佳者，应报请资遣；裁减之士兵，拨补附近各部队缺额。

以上罗列并分析了中央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及其下属各省各战区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管理处）、伤兵检查所（荣誉军人纠察所）、休养院（荣誉军人休养院）、残废军人教养院（荣誉军人教养院）、临时残废院（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以及荣誉军人感化所、荣誉团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直属机构。这里还没有开列为安置伤残官兵而开办的农场、工厂和不胜枚举的各种生产性质的合作社，还有许多直属医院和与军医署办事处、战区兵站总监共管的各种战时医院。由此可见，中央伤兵管理处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非不如此，不能承担不断涌来的数以万计伤兵的救治与安置任务。他们代表国家和民族去救治和安置为我们民族存亡而战的伤残官兵，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鲜为人知的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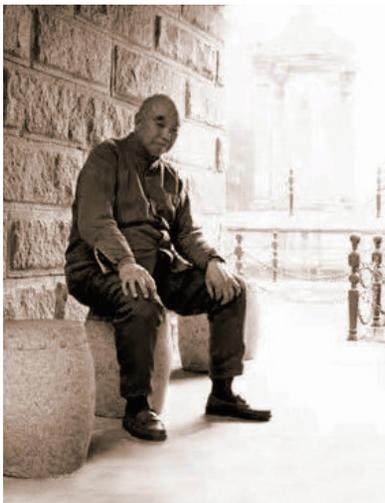
□ 杨灵统

有宪兵教练所学习经历的人中，最有名者当属共和国上将萧克了。

1925年冬，萧克完成了嘉禾甲种简易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意味着有了报考黄埔军校的资格，故而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为早日成行，他决心不等毕业考试结束就去广东。这时，东征军打下惠州，攻下潮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黄埔军校招生在即。萧克紧赶慢赶，1926年2月赶到广州，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4期招生已经结束。这时，宪兵教练所第2期正在招生，他看了招生简章，说毕业后可以当士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萧克上将的经历是当时热血青年投奔黄埔军校的一个缩影，他的这段回忆让我们知晓了宪兵教练所的存在。不过有关于宪兵教练所，以及更早的宪兵科，却是记载极少，鲜为人知。

黄埔军校专设宪兵科教育的只有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为东征北伐需要，军校先设宪兵科，后又在宪兵教练所培养军校生，当时称为宪兵科第1期，宪兵教练所第2期（即宪兵科第2期）。宪兵科毕业之际，宪兵教



/ 萧克在广州。

练所入学，两期连续举办。

有人说宪兵科同学是黄埔3期生，宪兵教练所同学是黄埔4期生，但是正期同学录均未收录，其有无正期出身是个疑问。

宪兵科

1924年8月，黄埔军校2期开班，当时分步、炮、工、辎四队（科），考取学生共449人。同年11月27日，军校应东征需要，在2期增设宪兵科。军校史稿记载“派管理部主任顾祝同组织宪兵队”，由顾祝同草订宪兵队组织表。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记载：

军校招第二期学生。第五队、

第六队、第七队（合编第二总队）以及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宪兵队，概属第二期。

从第2期开始，因为学生多了，黄埔岛上校舍已不敷用，于是军校分地训练，其中在广州省城北校场陆军讲武堂旧址设“陆军军官学校”即所谓省分校，工兵科、炮兵科、辎重队和第6队等军校学生以及校政治部于1925年1月初迁移至此，宪兵科亦设于此。黄埔本校则专驻教导团。

1925年4月宪兵科开学，训练期限11个月，1926年2月毕业。宪兵科的开学和毕业时间都非常晚，远远晚于2期其他队科，反而跟黄埔3期接近。3期的人伍生队第2营曾于1925年4月15日至30日间移驻北校场省分校，之后开回本校训练。宪兵科学生与3期生相互熟识，互称同学。

宪兵科学生易安华的自述可印证这段历史：

适值军阀割据，北政府专横祸国，总理为救国救民起见，奔走革命，宣传主义。本人即决志献身革命，于民国十四年春远赴革命发祥地广东，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十五年春

毕业，即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少尉队附。适革命军出师北伐，调任总部学兵团中尉排长，攻克湘鄂一带，身经数十战。

宪兵科所授学科教育有宪兵学、射击教范、一般之军事学、陆军现行惩罚令、陆军警察学、军制大要、马学马术教范、捕绳学、侦探学、陆军礼节等；术科教育则有步兵教练、乘马教练、手枪射击术、劈刺术、捕绳实习、实弹实习、器械体操等。

黄埔同学总名册登记宪兵科同学共34名，另有一名同学迟日未入该总名册，如若计上则有35人。

宪兵教练所

1926年2月宪兵科毕业时，宪兵教练所在广州城内成立。据军校史稿记载：

十五年二月本校在广州附设宪兵教练所，受训练者二百余人，至八月毕业时计二百四十一员。

宪兵教练所原属于广州卫戍司令部，由广州卫戍司令部宪兵营改组扩充而成。当1926年初国民政府决计将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际，2月1日，广州卫戍司令部宪兵教练所布告招考学兵：

照得本部为养成宪兵专门技术起见，开办宪兵教练所，以原有各连宪兵入所肄业，以四个月为限，毕业成绩优良者选充班长，其次即充宪兵中下士，惟各连尚有缺额，亟待补充，特在省城招考学兵一百五十名入所肄业。

学兵要求年龄在20岁以上25岁以下，需高小毕业或文理通顺程度与高小相当，考取后与入伍生同样待遇，每月给予津贴12元（伙食在内），服装用具书籍纸张笔墨均由教练所供给，入所训练4个月毕业，毕业后服务2年，成绩优良者得依其志愿保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或升充下级干部。

而在此之前的1月11日，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的第8次考试已在广东大学结束。故而正如萧克上将回忆所述，他当时只好投考宪兵教练所。

2月10日，宪兵教练所在报纸上刊登考试布告：定于2月14日午前10时在广东大学考试。2月14日，宪兵教练所经考试录取了150名学兵。

有意思的是，本应考前第二次第三次在报纸上刊登考试布告，因为那几天报纸停刊以致布告未周，而在考试结束后的2月15日、17日两日里，报纸却还继续刊登布告，要求考生于14日赴广东大学考试。因此未考者纷

報 月 曆 會

(三) 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登記數量統計表
民國二十五年
十一月十八日製

校 別	期 (班) 別	字 別	畢業生登記數量	臨時登記數量	登 記 總 數	備 註
廣州高毅班	第一期	廣字	一五五	七一	二二六	
憲兵科班	第一期	憲字	二一六	三	二一九	
訓練班	第一期	訓字	二二	五	二二七	
下級幹部班	第一期	下字	二〇七		二〇七	
長沙分校	第一期	長字	一八九	二八	二一七	
南昌分校	第一期	南字	三八八	八	三九六	
湖洲分校	第一期	湖字	三六六	三	三八九	
黃埔分校	第一期	埔字	九三二	二五五	一一七七	
武漢分校	第一期	漢字	七一	二四	九五	
第一期	第一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二期	第二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三期	第三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四期	第四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五期	第五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六期	第六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七期	第七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八期	第八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九期	第九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第十期	第十期	黃字	一一一	四四六	五五五	

/ 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毕业生登记数量统计。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憲兵教練所招考學兵佈告

照得本所第一期學兵行將畢業茲奉
令繼續招考學兵五百名入所肄業凡有志
願者請於本月二十日起至三十日止至
東較場憲兵教練所報名
一、年齡：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
二、體格：端正無嗜好身體強壯而無暗疾者
三、學歷：高小畢業或與高小相等之程度文理通順者由本
黨黨員二人介紹
四、學期：考入所訓練四個月畢業後充任憲兵二年成績
優良者升充下級幹部或依其志願轉送黃埔軍校肄業
五、投考：先向報部或領取志願書填具並由介紹人填
寫保證書(或店舖担保)粘同四寸半身相片兩張交由報名
處掛號方准與考否則作廢
六、待遇：考取後與入伍生同樣待遇每月給予津貼十
元(伙食在內)服裝用具書籍紙張文具均由所發給

/ 宪兵教练所第2期学兵招考布告。

纷要求考试。宪兵教练所只好于2月22日在北横街测量局重行试验已报名未考各生，补招学兵。

3月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廣州衛戍司令部憲兵教練所招考學兵佈告

一、有缺額者，由本所酌量增招。二、有志投考者，須先向本所領取報名表。三、報名日期：自三月十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四、報名地點：廣州衛戍司令部憲兵教練所。五、報名手續：繳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二張，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二張，並繳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二張。六、待遇：由本所供給膳宿，並發給津貼。



/ 廣州衛戍司令部憲兵教練所招考學兵佈告。

/ 憲兵教練所同學參加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典禮。

组织成立，其时广州卫戍司令部办理结束，蒋介石辞去卫戍司令兼职，地方治安责成公安局管理。宪兵教练所此时已附设于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附设之时，宪兵科第1期毕业，于是军校将宪兵科教育移于宪兵教练所继续，招收宪兵科第2期学生。

3月2日当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令将投考军校入伍生未取各生选入宪兵教练所肄业。故此，宪兵教练所于3月5日在北横街本所对投考军校入伍生未取各生进行考试选拔。

宪兵教练所还选取了一批4期入伍生入学。3月7日，在北横街本所对入伍生投考教练所各生试验体格，要求填具志愿书。

宪兵教练所选取入伍生与军校4期入伍生升学考试时间相差不多，应是同步进行。在3月3日至5日的3天里，4期入伍生队

第2、第3、第1团先后举行了入校升学考试，考试及格者转为4期正式学生。

以上即为军校史稿所称“受训者二百余人”之来历。

宪兵教练所编学兵三队，宪兵一连，共300余人。据说入伍生有53人，编入其中一队，俗称军官队，其余两队俗称军士队。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及各队长，对于士兵学术科之训练，以及风纪军纪之整顿，特别认真。队党代表钟斌对于政治训练尤为热心。当时易安华正从宪兵科毕业，即入宪兵教练所任少尉队附。应怀宗由宪兵营上尉连长任教练所上尉教官。

萧克上将回忆：

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开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2大队，队

长刘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广州飞来庙。这里设了个小造弹厂，每天能造65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些房子，全队百十人住在里面。1队和3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见面。

3月8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黄埔举行开学礼，所有录取的新生要求在3月31日前进校。宪兵教练所于28日上午在北校场举行开学典礼，这天下雨，而来宾人数众多，场中各军政要人均有训词，尤以邓演达教育长的演说最令人印象深刻，听者为之感动，直至下午五时，始行散会。

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上午九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在东校场举行，由军校

训练部主任吴思豫率领步一、二团学生各一营，炮、工、经理科学生各一队，入伍生各一营，宪兵教练所学生三队，全体武装参加典礼，授旗典礼由李济深军长任总指挥、钱大钧师长任警卫司令、张治中处长司礼，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授团旗。

6月18日，宪兵教练所布告招考学兵，“照得本所第一期学兵行将毕业，兹奉令继招考学兵五百名入所肄业”，招考条件和待遇与第1期学兵一样。第1期学兵指的是2月份教练所成立时入学的那批，训练期限4个月，行将毕业。教练所要求投考者在6月20日至30日至东校场本所报名。7月4日，学兵考试举行，此时教练所与宪兵团团部均驻在东校场。这期学兵训练4个月后分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宪兵团服务。

萧克回忆：

教练所学制四个月，实际学了五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也很正规，有六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军礼节、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的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大部分时间是实际操作，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7月10日，北伐在即，宪兵教练所举行毕业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训话，毕业生含入伍生、第1期学兵在内应为241人。

萧克上将曾回忆其刚毕业时情形，当时他所在的宪兵团留守广州。留在广州的他，心早已飞到硝烟弥漫的北伐战场：

前线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民革命军第4军和第7军与第8军会合，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于7月11日胜利进入了长沙，紧接着强渡汨罗，力克平江，攻克岳州，整个湖南几乎都在北伐军的麾下了。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离家从军，就是为了征战沙场，报效祖国。前方战事正酣，好男儿岂能安居于后？于是我就以请假回家为名，实际是想到湖南追赶北伐部队。那时，从宪兵教练所新毕业三百多学员，军士多，可以自谋职业，我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9月23日，宪兵教练所第1期毕业同学录已印成并分发各部暨升学诸同学。10月27日，校长蒋介石电复曾扩情：“教练所学兵，可入同学会。”故此，宪兵教练所学兵皆入了黄埔同学会。

1928年，黄埔同学会进行

会员审核，规定在本校1、2、3、4、5期，潮州分校1、2期，宪兵教练所1、2期，学兵团在南京毕业的，各该期同学录有名者，得有被审核之资格，意即有加入同学会之资格。此处宪兵教练所1、2期应指宪兵教练所第1期、第2期两期学兵。

出身之疑

宪兵科第1期，简称“宪兵一”，该期同学于1925年4月入学，1926年2月毕业；宪兵教练所第2期即宪兵科第2期，简称“宪兵二”，该期同学于1926年3月入学，同年7月毕业，两期连续举办。

1928年，黄埔同学会鉴于名称混杂，整理殊难，故经第卅七次会议议决，于6月30日通告一律废去期别，不得再称1期2期，直称为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后来黄埔同学总名册将其简称为“宪兵科”和“宪教所”。

上述史实有例可证：

1928年，黄埔同学会发布会员遗失文凭登记表中迟日的期别为“宪兵一”，遗失证章登记表中宪兵教练所三位同学曹裕卿、何良信、秦友庸期别为“宪兵二”。

1928年11月，浙省黄埔同学会会员情况统计中，期别按一二三四五期、军政训班、宪兵科、潮分区分，宪兵科包括了

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两期同学。而每个同学登记期别时，称谓则是五花八门，分别有宪兵科、宪、宪科一、宪一、宪兵一期、宪科一期、宪教所、宪教所二期、宪兵二、宪兵二期等等，不一而足。宪兵教练所同学如江泽尘、朱瑞卿、周家萼、夏瑞星等人，则直称为“宪兵科”。

1933年浙江省保安处登记上尉连长杨仲英出身“黄埔军校宪兵科毕业”，上尉连长赵平西出身“黄埔军校宪兵科一期毕业”，俩人系宪兵科同学；上尉连长朱瑞卿、上尉连长夏瑞星、中尉排长刘忠孔出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科第二期毕业”，他们皆为宪兵教练所同学。

宪兵科无疑属于黄埔2期，然而未被2期同学录收入，以致如宪兵科学生易安华的出身被错认为黄埔3期，上世纪40年代《宜春泽溪易氏族谱》记述易安华“奋然投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其实黄埔3期未分科目，无宪兵科，只设了9个队和1个骑兵团。宪兵科与3期生训练期限接近，曾一起同学，这或为错认之原因。易安华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宪兵教练所同学亦未被黄埔正期同学录收入。

1936年，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开始甄别登记学籍，授予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毕业

生登记证字别“宪教字”，有别于黄埔正期学生登记证字别“黄字”，同时明确宪兵科于1925年4月成立，举办一期，训练期限11个月，宪兵教练所于1926年2月成立，亦只举办一期，训练期限7个月。

如此看来，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一向被看成是独立的班科，未被正期同学录收入情有可原。

宪兵科同学34人，宪兵教练所同学241人，两期毕业生共计275人，然而向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宪教字”学籍的人数才129名，竟然缺失了146人。

缺失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籍登记规则限制之故，当时规定凡有重复学籍的，例如黄埔军校某期毕业，复在军校高等教育班毕业，或又在步兵专校毕业之类，只能选定其中一个学籍登记，不得重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同学归入了正期，除去宪兵科34名同学外，宪兵教练所部分同学亦有正期出身。

比如宪兵教练所同学秦友庸出身为黄埔4期，他在1925年暮春时节从老家出发奔赴广州投考军校，应为4期入伍生入所学习，毕业后留校服务于入伍生部。1926年12月，黄埔军校本部将秦友庸与其他留校服务的1至4期毕业生共计182名送赴北伐前

方，秦友庸在北伐期间跟随叶剑英任参谋。

又如宪兵教练所同学王寿山，在1946年中央训练团第12军官总队时登记出身“军校四宪”，意即黄埔军校4期宪兵科。

再如宪兵教练所同学郭履洲出身为黄埔6期，他于1926年1月自上海乘轮船赴广州投考军校，先入宪兵教练所，后入军校6期毕业。

如此看来，宪兵教练所241名同学的出身不尽相同，不可划一看待，或那53名入伍生才是黄埔4期生。

北伐之后，黄埔宪兵科未以再续，军校虽然先后举办了军官研究班、宪警班，有涉宪兵教育，但都是部分安排，均未专设班科。宪警班之后军校再无宪兵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宪兵部队举办的宪兵教练所、训练所等机构以及1936年设立的宪兵学校。

与后来者不同的是，宪兵科和宪兵教练所是在国共两党精诚合作之下，为应东征北伐之需而创，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在军校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同学名录

本名录含宪兵科、宪兵教练所两期同学共计275名，主要参照黄埔同学总名册（第三册）统计而成。

一、宪兵科同学

序号	姓名	籍贯
1	胡祖介	安徽
2	江泽尘	安徽
3	祖烈	安徽
4	苏兆熊	福建
5	吴汉桂	广东
6	邢昂	广东
7	陈棣春	广西
8	巫侠珍	广西
9	郑连义	河北
10	陈鸿儒	湖北
11	李春芳	湖南
12	李名熙	湖南
13	陈国泰	江苏
14	陈西平	江西
15	杨凌昌	江西
16	易安华	江西
17	戴旭	浙江
18	邓占	浙江
19	方乐书	浙江
20	傅焜	浙江
21	潘锦春	浙江
22	谢世道	浙江
23	杨仲英	浙江
24	张咸宜	浙江
25	赵勉	浙江
26	赵平西	浙江
27	郑产	浙江
28	朱夔	浙江
29	李伯温	
30	李树云	
31	刘本仁	
32	王安奎	
33	詹言	
34	张石济	

二、宪兵教练所同学

序号	姓名	籍贯
1	程佩	安徽
2	稽光	安徽
3	李铤迺	安徽
4	缪省三	安徽
5	孙芳胜	安徽
6	万宅仁	安徽
7	汪家福	安徽
8	姚应龙	安徽
9	张振华	安徽
10	朱瑞卿	安徽
11	朱世杰	安徽
12	孙家武	福建
13	巫杰臣	福建
14	吴振元	福建
15	谢秉权	福建
16	陈剑英	广东

序号	姓名	籍贯
17	陈慕尧	广东
18	陈廷华	广东
19	崔棠	广东
20	古咏鸿	广东
21	黄劲节	广东
22	江大光	广东
23	江肇基	广东
24	赖贵成	广东
25	李冠潮	广东
26	李家桐	广东
27	李玉良	广东
28	梁鹏	广东
29	梁新	广东
30	林紫芳	广东
31	凌进元	广东
32	刘自达	广东
33	卢斌	广东
34	聂伟雄	广东
35	容启洲	广东
36	容寿锦	广东
37	王一平	广东
38	王兆球	广东
39	吴愠山	广东
40	吴紫龙	广东
41	谢福元	广东
42	谢桂荣	广东
43	叶德	广东
44	湛士荃	广东
45	张嘉猷	广东
46	周汉光	广东
47	陈斌贤	广西
48	陈光宙	广西
49	甘秀梧	广西
50	谭超伯	广西
51	谢精雄	广西
52	张文镜	河南
53	陈汉华	湖北
54	陈南洲	湖北
55	胡镇随	湖北
56	黄振寰	湖北
57	刘培初	湖北
58	刘忠孔	湖北
59	马仁	湖北
60	闵云卿	湖北
61	潘秉彝	湖北
62	孙传辉	湖北
63	万逊	湖北
64	王彪	湖北
65	曹杰	湖南
66	曹裕卿	湖南
67	曹璋	湖南

序号	姓名	籍贯
68	曾焜	湖南
69	曾之斌	湖南
70	陈雄	湖南
71	陈仲怡	湖南
72	陈紫侯	湖南
73	戴河清	湖南
74	邓飞雄	湖南
75	傅长均	湖南
76	傅真林	湖南
77	傅宗化	湖南
78	何杰	湖南
79	何凌霄	湖南
80	何蓬仙	湖南
81	何廷汉	湖南
82	何协坤	湖南
83	何镇湘	湖南
84	胡昌基	湖南
85	胡海瑞	湖南
86	胡兆正	湖南
87	黄平	湖南
88	黄英	湖南
89	蒋向义	湖南
90	蒋绪德	湖南
91	蒋祝	湖南
92	邝龙虎	湖南
93	邝权	湖南
94	乐天培	湖南
95	雷声	湖南
96	李昌祉	湖南
97	李成章	湖南
98	李持正	湖南
99	李光耀	湖南
100	李鸿	湖南
101	李锴	湖南
102	李鹏	湖南
103	李日照	湖南
104	李瑞琼	湖南
105	李石安	湖南
106	李寿仁	湖南
107	李严炳	湖南
108	李应棋	湖南
109	廖基廉	湖南
110	刘国统	湖南
111	刘尽萃	湖南
112	刘绍汉	湖南
113	卢常安	湖南
114	陆雄	湖南
115	罗希贤	湖南
116	吕春	湖南
117	莫树钧	湖南
118	欧筠	湖南

序号	姓名	籍贯
119	彭杰	湖南
120	彭元龙	湖南
121	萧克	湖南
122	省武毅	湖南
123	宋祚胤	湖南
124	孙琦	湖南
125	谭超前	湖南
126	谭国栋	湖南
127	谭雅士	湖南
128	唐济	湖南
129	唐鸣皋	湖南
130	陶楷	湖南
131	万举之	湖南
132	王达	湖南
133	王鹏	湖南
134	王去非	湖南
135	吴剑平	湖南
136	吴梯云	湖南
137	吴雄飞	湖南
138	向魁	湖南
139	向自耀	湖南
140	萧鸿渚	湖南
141	萧孝纯	湖南
142	谢刘权	湖南
143	熊孟曾	湖南
144	许卓韦	湖南
145	杨岛	湖南
146	杨芳猷	湖南
147	杨宏业	湖南
148	杨新民	湖南
149	余仲垣	湖南
150	张豪	湖南
151	张焱孜	湖南
152	张盛基	湖南
153	张握鐔	湖南
154	张羽初	湖南
155	周从颂	湖南
156	周得位	湖南
157	周拱五	湖南
158	周家萼	湖南
159	周觉农	湖南
160	周烈	湖南
161	周绍钦	湖南
162	周绍颐	湖南
163	周时俊	湖南
164	周正祖	湖南
165	朱崇鉴	湖南
166	朱濂	湖南
167	祝汉文	湖南
168	亢文鹿	江苏
169	濮方平	江苏

序号	姓名	籍贯
170	沈鹏	江苏
171	汤广源	江苏
172	陶建芳	江苏
173	王寿山	江苏
174	崔景漠	江西
175	樊立杰	江西
176	范家炽	江西
177	何良信	江西
178	黄思平	江西
179	黄序宏	江西
180	郇斌	江西
181	郇巍	江西
182	廖德诚	江西
183	刘德森	江西
184	刘光	江西
185	刘振中	江西
186	聂子刚	江西
187	阮亮	江西
188	王正炜	江西
189	萧飞翹	江西
190	熊乐荣	江西
191	徐君若	江西
192	张运中	江西
193	张宗育	江西
194	赵建勋	陕西
195	陈金株	四川
196	陈伟震	四川
197	程清波	四川
198	黄冲霖	四川
199	王雨甘	四川
200	徐宏宣	四川
201	杨敬之	四川
202	李有光	云南
203	陈陶镛	浙江
204	陈屠范	浙江
205	陈维镛	浙江
206	陈希河	浙江
207	崔杰	浙江
208	郭履洲	浙江
209	何一清	浙江
210	侯正照	浙江
211	黄融	浙江
212	邾国选	浙江
213	金焕章	浙江
214	金舜齐	浙江
215	李义师	浙江
216	梁钰	浙江
217	林贵荣	浙江
218	卢超	浙江
219	吕诚汉	浙江
220	马江春	浙江

序号	姓名	籍贯
221	秦友庸	浙江
222	沈周	浙江
223	石玉书	浙江
224	王化龙	浙江
225	王巨卿	浙江
226	王映岳	浙江
227	夏瑞星	浙江
228	项方强	浙江
229	杨植材	浙江
230	叶纯训	浙江
231	叶载芳	浙江
232	张德峯	浙江
233	张景铨	浙江
234	张衍千	浙江
235	张子泉	浙江
236	张子臻	浙江
237	郑翔	浙江
238	周性善	浙江
239	周兆光	浙江
240	朱国伟	浙江
241	曾雄	直隶

参考资料：

1. 《萧克回忆录》，作者：萧克，解放出版社出版（1997年）。

2. 《中央各军校各期班毕业生登记证字别一览表》，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编，《会声月报》（1937年）。

3. 黄埔同学总名册（第三册），黄埔同学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高等教育班第四期纪念册》（1935年）。

4. 《黄埔军校年谱长编》，作者：陈宇，华文出版社（2014年）。

5. 《蒋介石年谱》，作者：毛思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

6. 《广州民国日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摄制（1986年）。

我收藏的黄埔军校《操场野外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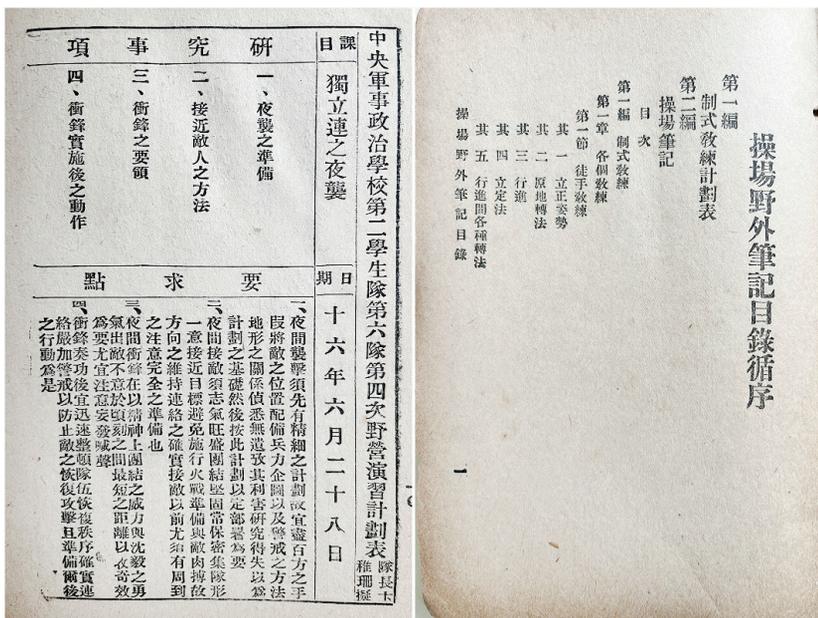
□ 单补生

笔记一词，意谓随笔记录之言，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笔记形式随便，又无确定格式，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笔记作为一种专门体裁的书籍，起始于魏晋，经过唐宋时期的充实发展，到了明清两代，更加风靡兴盛，继由民国延续至今。黄埔军校历期各科均有学生担任笔记生，负责记录本期学生接受军事政治训练之经过。关于校长训话、名人演讲及课堂教授、操场训练、野外演习等，要求笔记全面细致、文理通顺，再由编纂专员做成有系统之记述，先后印发有黄埔4期之《野外实施笔记》，黄埔5期之《操场野外笔记》，黄埔6期之《操场野外笔记续编》，黄埔8、9、10期之《最新德式操场野外详细实施笔记》等，以资编纂黄埔校史参证。

笔者收藏一册黄埔5期《操场野外笔记》，精装32开，排印992页，红色书衣，烫金封面，题签为：“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操场野外笔记，戴传贤题”，烫金书脊有“黄埔操场野外笔记，四五六期合编”字样，版权页显示为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再版，翻印者为中央军校，联名



/ 《操场野外笔记》书影。



/ 《操场野外笔记》目录。

4人为：黄埔3期刘芬荣，别号春台，江西万安人；黄埔4期朱

福田，别号畴如，江西万安人；黄埔5期游联廷，江西万安人；



/ 孙中山先生遗嘱。



/ 廖仲凯先生题词。

《操场野外笔记》印刷完竣，诸生持来征序，乃接而阅之，取材颇新，解说亦详，洵平时演练战时指挥之良好模范。读竟辄有所感，此编新则新矣，善则善矣，若欲即以胜敌，仍未足恃也！盖欧战所采用之新战具战法，各国莫不知之，莫不求之，而战胜之要在能出敌意表而将其压倒，若仅用其已熟知之战具，已熟知之方法，以求达此目的不戛戛其难乎？必也更运深思，尽我智慧挥进步的创意的精神，期能发见一种新战具新战法，以凌驾现有者而上之，一旦有事，庶乎有济；余深信列强正日夜不息，为此而钻研也，特事属国秘，末由窥见耳！本校乃军事学府，诸生乃有志青年，务合群策群力，以此编为起点而为迈进之研究，则最近之奇耻大辱，终有湔雪之一日；若以步人后尘为满志，则非所敢知矣！然今日中国军学之现状，岂惟未能步武列国后尘，且相离尚远，直望尘莫及耳；起而急追，吾人责无旁贷，愿共勉旃，是为序。

民国十七年孟夏

江都刘光

黄埔6期吴劲，别号东雄，江西万安人。内页有总理遗像、遗嘱，廖党代表遗像、题词，校长肖像、训话。作序者刘光(1881—1971)，字君实，江苏江都人，日本陆军大学第2期毕业。1927

年5月，在南京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其序曰：

余将离校之先一日，适《操

《操场野外笔记》目录，循序分列七编：一、制式教练计划表；二、操场笔记；三、杂俎；四、野外演习计划案；五、野外笔记；六、野营演习计划表；七、夜间演习计划表等项。



/ 黄埔5期制式教练。



/ 黄埔5期野外演习。

此专著为黄埔5期学生受训之真实记录，是弥足珍贵的黄埔军校原始史料，学者品读，受益良多。

黄埔5期教育述略

黄埔军校的早期军事教育，在于最短之期间养成革命战争之斗士，培植革命军队之基础，故对于学术两科取精用宏，加紧训练务收伟大之效果。

学科方面：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则教以四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以上学科由各教官以平日之心得，撮要钩玄，详为讲述。由学生各自笔记，以便诵习。此外，对于军制学、交通学、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军语、军队符号等，亦择要详讲，至于战术作业、实地测图，亦按步实施。总之，对于军事学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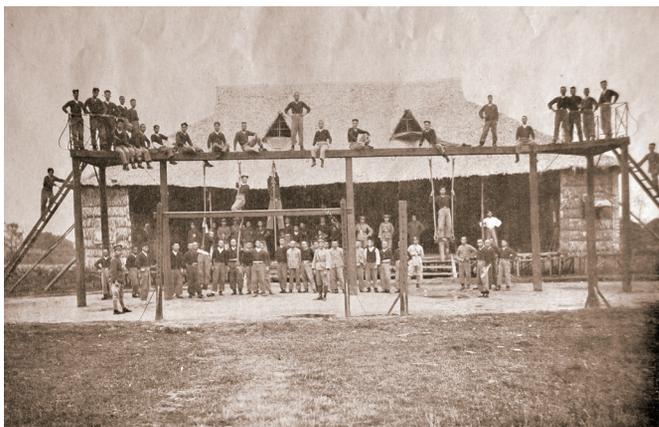
学科，俱教授无遗焉！

术科方面：学生入校以后，即施以制式教练，最初为单人徒手教练，教以各种步法及转法。俟个人操作娴熟后，即施以班教练及排连营教练，举凡方向与各种队形之变换，俱以依次循序实施。徒手操作熟练后，继即施以持枪教练，仍由单人以至班排连营，凡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各种射击与各种行进、密集、疏开、散开等队形，以及各种战斗教练，均按程序一一施行。除制式教练外，对于野外演习尤为着重，凡单人战斗各种动作，以及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联络勤务、土工作业等，均按照教育步骤依次实施。此外，对于夜间演习、实弹射击、阅兵分列各项检查，亦俱切实教练，当时术科方面对于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二项更为认真，整军经武，取用精宏，故能于短

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1926年3月，第4期学生开学时，入伍生部因第4期入伍生约三分之二升学，乃将其余均编为第5期入伍生，成立第1团，团长郭大荣。自3月至7月之间，陆续考取入伍生1000余名，编为第2团，团长陈复。

第5期入伍生教育学术两科与第4期大致相同，经编队入伍后即开始训练，初则授以士兵及下级干部之军事教育，此外，则授以普通学科。入伍期间定为6个月，其教育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完成新兵及候补上等兵教育，藉以领悟连以下团结精神之要素；第二期在求完成上等兵及候补军士教育，藉以领悟营以下团结精神之要素；第三期在求完成军士及勉充排长之教育，藉以巩固团以下团结精神之要素。所授之课目：关于学科者为典范令、精神教育；关于术科者为基本



/ 黄埔5期技术训练。



/ 单人教练。

教练、散兵教练、班排连教练、连之战斗教练、射击教育、野外演习、散兵壕构造法等。入伍生教育之目的，在使之具有升入本校学生队之程度，此军事教育训练之大概情形也。是年7月1日，在燕塘大操场举行第5期入伍生第一期教育校阅，盖第一期教育定为两个半月，至是期满，特组考试委员会，实施严密之考试及校阅。

1926年9月31日起，本期入伍生举行升学考试，假广东大学为试场。入伍生第1、2两团均陆续由防地开回广州应试。验毕自1926年11月1日起，本期学生陆续入校编队，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5科，共6个大队。第1学生队驻燕塘，为第1步兵大队；第2学生队驻校本部，为第2步兵大队；第3学生队驻曾家祠，为炮兵大队；第4学生队亦驻曾家祠，为工兵大队；

第5学生队驻蝴蝶冈，为政治大队；第6学生队亦驻蝴蝶冈，为经理大队。步兵大队分为4个中队，每中队再分为4个区队；炮兵及工兵大队各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为两个区队；政治大队分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为3个区队；经理大队分为两个中队，每中队再分为两个区队；总共为17个中队53个区队，学生2620人。

11月15日为第5期学生举行开学典礼之期，礼场本设于大操场，布置极为完备，嗣以本日因雨改下午1时在新俱乐部举行。由副校长李济深主席典礼，到会来宾有中央党部代表张静江、李烈钧、戴传贤，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高级军政长官，苏联顾问，以及各界代表约百余人。除本期全体学生首先齐集于俱乐部外，本校各部处官长及军士教导队一律参加，典礼隆重。12月

初，本期政治、炮兵、工兵大队学生先后开赴武汉分校。

第5期军官学生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完全初级军官，以为他日研究高等军事学之基础。在前10个月中，务须修得初级军官必要之知识及技能。其后期8个月，则就前期之学术，继续研究而充足之，至学术两科所授各课目与第4期大约相同。

1927年6月16日，本期学生举行毕业野营演习，演习结束继续进行毕业考试。7月20日，本期毕业生奉令开赴南京。8月15日上午12时，本期学生在南京小营大操场举行毕业典礼，由代理校长何应钦主持典礼，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代表李烈钧及各界代表百余人参加典礼。本校参加者共约5000余人。本期毕业生共分步、炮、工、政治、经理5科，计6个大队，共计2400余人。但第3、4、5三学生队均

在武汉，不能来南京。此次能够参与典礼者，仅第1、2、6三学生队，共计学生1488人获得毕业证书。

卞稚珊拟定演习计划

黄埔校史记载第4期教育时，均附有学术教育计划表，而记述第5期教育却无学术教育计划表，仅提与第4期大致相同一带而过。幸见《操场野外笔记》有教育计划表，所拟7次野营演习及8次夜间演习计划表皆出自一人之手，其名卞稚珊，四川江津人，保定军校8期步科毕业，时任黄埔5期步兵第2学生大队中校队长，后任黄埔6期步兵上校大队长。现举一则计划而知演习梗概。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第二学生大队第六队第四次 野营演习计划表》 (队长卞稚珊拟)

课目：独立连之夜袭。日期：1927年6月28日。

研究事项：一、夜袭之准备；二、接近敌人之方法；三、冲锋之要领；四、冲锋实施后之动作。

要求点：

(一) 夜间袭击，须先有精细之计划，故宜尽百方之手，段将敌之位置、配备、兵力、企图，以及警戒之方法、地形之关系侦



/ 黄埔5期中校队长卞稚珊。

悉无遗，考其利害，研究得失，以为计划之基础，然后按此计划以定部署。

(二) 夜间接敌，须志气旺盛，团结坚固，常保密集队形，一意接近目标，避免施行火战，准备与敌肉搏，故方向之维持，连络之确实，接敌以前尤须有周到之注意，完全之准备也。

(三) 夜间冲锋，在以精神上团结之威力，与沉毅之勇气，出敌不意于顷刻之间，最短之距离，以收奇效为要，尤宜注意妄发喊声。

(四) 冲锋奏功后，宜迅速整顿队伍，恢复秩序，确实连络，严加警戒，以防止敌之恢复攻击，且准备尔后之行动为是。

想定(指对作战双方基本态势、作战企图和作战发展情况的设想)：

北军——北军步兵第1连有握

守黄京塘，以待本队翌(29)日午前9时到达之任务，于28日午后4时30分到达黄京塘，得知之情况如左：较我优势之敌人，刻已到达黄花岗附近，有继续北进之势。

南军——由广州市北进之步兵第2连，于6月28日午后4时40分到达黄花岗时，接得营长之命令，要旨如左：(1)较我稍劣之敌人现扼守黄京塘，有阻我北进之意，其后援部队闻于明日午前9时可以达到。(2)该连须于明日拂晓以前将黄京塘确实占领。

实施方法：人员编组：①以21、22区队编为北军步兵第1连。②以23、24区队编为南军步兵第2连。③连依三三制编成。④南军演习连长黄定益，排长夏小鹏、杨傲霜、朱青天。⑤北军演习连长魏志超，排长唐一戎、薛冈梧、李金波(以上连排长均由5期学生担任)。⑥各区队官长指导各该管区队。

演习规定：

1. 白云寺、能仁寺一带不能通过。

2. 午后6时以前，北军须到黄京塘，南军须到将军行台。

3. 假定午后7时为翌日午前1时。

4. 50米达停止燃炮，30米达停止冲锋。

5. 枪支不上刺刀。

6. 南军帽缠白带，北军服装

照常。

7. 讲评地点在黄京塘南方高地。

携带器材：枪支每枪配纸炮10发，雨衣，龙眼洞、石牌地图，电棒，麻绳（每排一根），白旗（每排一面），指北针。

演习时间：午后7时开始，午后11时终结。演习地点：从将军行台开始，至黄京塘终结。

孙立人研习《操场野外笔记》

1928年，孙立人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国之初，其有十分翔实的叙述：

……及至我军事学完了回国，已经是民国十七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早已奠都南京，北方快要全部平定了。而我呢，却是一个十足的洋学生，中国军队里一天也没有做过，甚至口令也不会叫，不说做别的，就是去当一个班长，也自觉不行。所以我决心从下层做起，以期求得实际带兵经验。这样我才进了中央党务学校做事。那学校就是现在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当时离开课还有一个月的光景，我就利用了那段时间，向南京各书店搜购了各种军事学的小册子，如《操场野外笔记》等项，日夜研习，后来开课了，甚至晚上看到半夜，以备翌日拿到操场上去教别人，这样经过了七八个月，才自觉稍为具备

了一点教练能力的基础，可以勉强做一个班排长而无愧了。……

孙立人自任中央党务学校上尉队长始，无役不从，终成抗日名将。由此可见，虽“猛将必发于卒伍”，仍须必读《操场野外笔记》。

刘光督导国防工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要求收复失地。国民政府接受爱国人士的建议，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主持国防工事执行部，主任为唐生智，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任副主任。下设几个组，调军事方面各部的人员组织而成，主持作战计划的立案，以及预设阵地的选定和永久工事的构筑等。当时的作战方针是根据敌我国情决定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用空间换取时间对付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方针来拖垮敌人。因此，决定在华东方面沪宁铁路沿线构筑四道防御阵地，以淞沪至杭州湾为第一线，由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指挥淞沪保安总队负责就近构筑。苏州至福山为第二线，无锡至江阴为第三线，即所谓吴福线和锡澄线，指定第36师宋希濂部、第57师阮肇昌部、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等4个整编师分段负责，进行工事构



/ 本文作者单补生在民国时期淞沪国防工事堡垒前留影。

筑。南京附廓为第四线，由教导总队桂永清部负责。在立案之后，刘光副主任即组织军事参谋人员进行实地勘察，选择各个阵地，标定各种工事位置。其间经过相当时间的现地参谋旅行和图上研究讨论，才定下来构筑阵地强度的各种方案。然后，由执行部提请蒋介石批准后，才组织施工部队，准备施工材料和进行施工。构筑国防永久工事，从1934年到1936年花了两年半时间。

参考资料

- 1.《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版），龙文出版社1990年重印。
- 2.《黄埔日刊》资料汇编，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2000年发行。
- 3.《孙立人大传》，王丰著，现代出版社2017年出版。



1926年4月21日， 蒋介石为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党代表及共产党人官长举行晚宴

□ 贾晓明

1926年4月21日，蒋介石为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及共产党人官长200多人举行晚宴，席间发表演讲，谈及中山舰事件的情况。此事的原委还要从第二次东征时说起。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权利欲极强的他”，“不能安于现状”，不仅经常和苏俄顾问、汪精卫发生冲突，更对中共党组织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影响力感到不安。早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开会，表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不可分裂”，向周恩来等提出把军校和第1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以及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结果被周恩来以此事需要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婉拒。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天，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擅自调动部队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在广州宣布实行紧急戒严，将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中一些具有共

产党员身份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同时，蒋介石还派刘峙带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又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军械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更派兵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以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正在广州考察。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他们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3月20日下午5时，苏联驻广州顾问团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派副手鄂利金去见蒋介石，要求撤走对顾问团的包围。蒋介石表示发生的“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并“表示歉意”。当天晚上，布勃诺夫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询问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提出俄国顾问的“许多错误”，应允次日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

介石坚持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对此，苏联代表团和顾问团举行会议，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于顾问团“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为“巩固革命势力的统一”，决定采取让步措施，撤去和蒋介石有分歧的季山嘉、鄂利金以及罗加乔夫等人的职务。接着，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找到蒋介石，询问“此次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发动的”。蒋介石回答“是对人，而非对俄”。索洛维也夫“听得此意，此心大安”，于是告知蒋介石让季山嘉等人回国的决定。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得知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感到大为失望。由于蒋介石事先做了工作，其提出的关于“俄顾问及共产党各问题”得到除汪精卫外的与会人士的普遍支持，就连前一天还要发兵攻打蒋介石的谭延闿等人也改变原来

立场，站在蒋介石一边。会议决定“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2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此后，汪精卫称病不出，不久就悄悄地离开了广州。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引起各军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蒋介石做出解释。很多中共党员更是表示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违反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要对蒋介石坚决反击。20日当天，毛泽东等人曾到苏联顾问住处，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建议，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2、3、4、5、6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毛泽东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的拒绝。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部分领导人张太雷、周恩来、聂荣臻等都力主讨伐。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1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

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1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得出“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的结论，主张坚决用武力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一面积极集中广东力量，一面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请示行动方略。3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发表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旨在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分裂联合战线，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号召革命派与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败敌人此种阴谋。

3月24日，布勃诺夫偕季山嘉等人回国，蒋介石亲自送行，两人谈话两小时。几天后，布勃诺夫途经上海，向中共中央介绍了中山舰事件的情况，并要求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由于布勃诺夫使团和苏联顾问妥协退让方针的影响，加之“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陈独秀等“被迫妥协下来”，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执行这一政策。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

传达中央的政策，要求一致遵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迫使苏联顾问做出让步，同时将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赶走，为了进一步控制军权，又一手策划了把共产党员排挤出政权和军队的活动。蒋介石以军队中的“党代表多为幼稚的跨党人员，容易产生纠纷”为借口，要求军中“共产党员名单送交各高级长官，共产党在军队中完全公开”。4月3日，他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案，提出“应即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对于共产党之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本党之内不准组织其他小团体，须事事公开，不得有秘密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同时还提出所谓“军制之意见”，鼓吹“近日第1军因本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之裂痕，日深一日，几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如不从速解决，则北伐必无胜算之理。又军中党代表制，中正认为革命未成功以前，此制不能取消。唯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方有任党代表之资格……又军中官长，信仰不一，精神必难团结，思想冲突，

行动更易差误。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唯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于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4月11日，蒋介石又呈请国民党中央，委任其心腹、第1军军长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调邓演达为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以取代周恩来的职务。同时，蒋介石以“一律调回，加以训练”为借口，命令把第1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从政治部主任到连队指导员（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缪斌除外）“统统撤换”，另派“人员在军中实习政治相当工作，宣传三民主义”。很快，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

蒋介石虽然在中山舰事件中“获得甚多”，但自觉羽翼尚未丰满，“彻底反苏反共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又打起“总理信徒”“革命左派”的旗号，企图以此来“修复”因中山舰事件而严重受损的自己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苏联的关系。中山舰事件刚刚过去，蒋介石就写了一份“自请处分”的呈文，表示制造中山舰事件是“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错误在于“事前未及报告”，为此“自请严厉处分”。随后，他又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频频示好，说自己“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对于共

产分子……提携不遗余力”。又说“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故要革命成功，须联苏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他还花时间和接替季山嘉的斯切潘诺夫等苏联顾问搞好关系，经常和他们“密议”，“开诚谈从前季山嘉之非”、“工作程序之不当”和“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更就今后“应注意改正之点”进行请教，并在人事任免等重大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为安抚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找到陈公博，让他帮助组织一个“左派核心”。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首，包括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邓演达、陈果夫、邵力子、陈公博等人（这个组织只在何香凝家里开了一次会，以后便不了了之）。此后，蒋介石不仅命令将李之龙释放，还对帮助他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进行打击，罢免了王柏龄第20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欧阳格代理中山舰舰长、吴铁城新编第11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并对他们处以驱逐出境、逮捕监禁等惩罚，又下令取消了孙文主义学会。

蒋介石深知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共产党人都是优秀人才。为了笼络他们，蒋介石呈请国民党中央“共产分子退出各军以后，应由本党予其相当工

作，或授其高等军事学，以备军中之用”，并对来访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保证，即使军队和军校中的中共党员“犯有错误”，也是他的好学生，“一定要重用”。同时宣布以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的名义，特设一个高级政治干部训练班，集中从第1军被迫离开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学习，指定周恩来担任班主任并主持授课。

4月21日（一说为20日），蒋介石又在黄埔军校特设宴会招待退出第1军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及官长。宴会上，蒋介石称“凡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学生，无论他是否共产分子，我看他们差不多平素是最亲爱的、最有希望的同志”。又说“共产分子在第1军内虽然是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接着，他发表长篇演讲，向在场的共产党员解释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说他制造中山舰事件的本意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革命基础，不得不如此”。但其随后的言论大多词不达意，且漏洞百出，前后无法自圆其说。最后说，中山舰事件的真相要等他“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对自己的讲演非常满意，认为在场的共产党员听后“众疑释然”。

斯大林格勒战役

□ 王晓平

1942年初，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和德国军队经过莫斯科战役厮杀后，双方暂时都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东部的苏德战线相对稳定下来。德军虽然在莫斯科城下遭到失败，已无法发动全线进攻，但仍掌握战略主动权。希特勒认为，1942年，德军应放弃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将进攻的主要方向转向苏联的南部地区，占领南部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最终歼灭南部战线的苏军有生力量，夺取该地区的粮食、煤炭以及石油等战争资源。尔后德军挥师北上，再

次进攻莫斯科。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苏联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产区，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如果德军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苏联支撑战争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补给线将会被切断。同时，德军向北可攻莫斯科，向南可出波斯湾。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南线兵力进行了重组，撤销了原南方集团军群番

号，新组建了A、B两个集团军群。其中，B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下辖霍特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魏克斯上将的第2集团军和保卢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由空军顿河地区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其任务是攻占斯大林格勒，掩护A集团军群的北翼。

1942年6月28日，德军B集团军群发起进攻。6月30日，保卢斯第6集团军从哈尔科夫东北发起进攻，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向东南挺进，并突破了苏军第21和28集团军防御。同时，德军在其他方向上的进攻也取得进

(接前页)

此后，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籍政工人员前往大佛寺，进入了高级政治训练班学习。训练班开学时，蒋介石赶来训话。他告诉大家，参加训练班的每一个学员“各位自己绝不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在训练班里，共产党员要学习“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的道理，并号召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共产党也不会迟”。蒋介石此后又不断重复这些讲过

的话，以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实在讲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老太婆一样”。

开学后，周恩来对训练班实行军事管理，建立起分队、区队。每星期周恩来亲自讲授国内外的政治报告课一次，内容有《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此外，周恩来还邀请邓中夏、彭湃、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陈延年等人来训练班作报告，分述工运、

农运、青运的发展状况和理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训练班共产党员们的组织生活“一切如常”。

训练班结业后，周恩来“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一部分被分配到各军的政治部宣传部门工作，另有部分被分配各军担任政治指导员。临别前，周恩来告诫学员们，要在新的岗位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在革命军中的骨干作用。这批学员，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均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展，苏联军队在空旷的大草原上很难抵挡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被迫后撤达100—300公里。然而，第6集团军在战役初期取得的战果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无需那么多兵力，命令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转隶A集团军群。此时，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进攻部队就只剩下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辖有6个军，含2个装甲军，计14个师约27万人，近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由第4航空队1200架作战飞机进行支援）。由于交通等问题，第6集团军的前进步伐有所放慢，给了苏联红军一定的准备时间。

7月17日，苏德双方在斯大

林格勒接近地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战役正式开始。德军第6集团军分南北两路向苏军发起进攻。7月23日，德军突破苏军第62集团军右翼防线，前出到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顿河河岸，苏军被迫退过顿河。面对苏军的节节撤退，为了增强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战斗意志，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第227号命令，凡是不服从命令而离开战斗岗位或者撤退的军人都将被严惩，并严厉要求苏联红军部队“绝对不许后退一步”。并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前往斯大林格勒协助指挥战事。同时，苏军火速向斯大林格勒地域调集增援部队。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缺少装甲兵力

支援的第6集团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德军在行进间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被粉碎。

7月30日，希特勒决定将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归还给B集团军群。虽然霍特指挥德军连续突破苏军防线，但也遭到了苏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和反击，伤亡不断增加，只好放弃独立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想法转入守势。8月19日，保卢斯和霍特联合发起了进攻，先后突破苏军的多处防线，同时，德国空军出动2000架次飞机昼夜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狂轰滥炸。鉴于斯大林格勒异常严峻的形势，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率领增援部队赶赴战场，对德军先后发起几次反攻，但均遭到失败。9月

12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外围的防御阵地全部失手，被迫撤至市区，德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城防，从南面突进到伏尔加河，把守卫城市的苏军第62集团军同战场上的其他主力部队分隔开来。

9月13日，德军开始攻城。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军第62集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9月15日，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城中的制高点——马马耶夫高地实施重点突击。经过一天残酷的战斗，德军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但第二天，苏军突然向德军发起反冲击，又夺回了该高地。苏军方面调动了内务部队、军政学员、防空兵、海军陆战队等一切可以调动的武装力量来加强市区防线。双方逐街逐楼逐屋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斯大林格勒守军表现出“一步也不后退”的大无畏精神，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每一个地下室，每一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成为苏联红军同德国法西斯军队厮杀的战场。巷战的惨烈程度使得赶赴城中的苏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军官也只有约3天的平均存活时间，攻入城中的德军死伤人数也不断增加。面对苏联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

德军无可奈何地哀叹：“我们已经占领了厨房，但客厅仍然在敌人手中。”

经过3个月血腥的战斗，到11月初，德军终于缓慢地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并且占领了整座城市的80%地区，将留守的苏联军队分割成两个狭长的口袋状，但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且部队已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其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到11月中旬，德军第6集团军被迫停止了进攻，休整部队。苏联红军的浴血奋战给德军造成了大量伤亡，并将其主力部队紧紧地牵制在斯大林格勒，从而为最高统帅部调集部队准备大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根据苏联方面统计，从7月到11月的战斗中，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损失近70万人，1000余辆坦克，2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400架飞机。

早在9月底，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激战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已开始准备大反攻，朱可夫制订了代号“天王星行动”的反攻计划，主要内容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然后发起反攻，打击德军虚弱的外侧，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市区。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苏军开始秘密大规模集结兵力。至11月中旬，在斯大

林格勒地域城外的南北两侧的苏联军队共集结了143个师110.6万人，计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飞机。按照反攻计划规定：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由瓦杜丁中将指挥，其任务是从顿河西岸的谢拉莫菲维奇和克利茨卡亚地域桥头阵地实施主攻，突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御，直插顿河东岸的卡拉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叶廖缅科上将指挥，其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南面向西北突击，突破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防御，与西南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完成对德第6集团军的合围。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指挥，其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向东南实施辅助性突击，掩护西南方面军的主攻。

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率先发起反攻，由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且缺乏精良装备，负责防卫德军第6集团军侧翼安全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阵地在战斗发起一天之内就被苏联红军突破。与此同时，顿河方面军实施了两个辅助突击，以第65集团军从克列茨卡亚以东地区向东南突击，以第24集团军从卡恰林斯卡亚地区沿顿河左岸向韦尔佳奇方向向南突击，割裂顿河小弯曲部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德军的联系。11月20日，斯大

林格勒方面军在南部转入反攻，突破了防卫该地区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防线，主要由骑兵组成的罗马尼亚人迅速被歼灭。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至11月30日，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将德第6集团军的5个军22个师，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以及部分克罗地亚军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斯大林格勒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第6集团军只有约5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

当得知第6集团军被苏军合围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力劝希特勒下令保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但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却向希特勒保证说，他可以保证空军有能力通过“空中桥梁”为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事实证明，德国空军根本没有这种运输能力，其每天300吨的运输上限也无法满足每天700吨的需求。但希特勒仍然支持戈林的计划，命令保卢斯坚守阵地，并将第6集团军改称“斯大林堡垒”集团军。由于恶劣天气和苏联红军防空火力，空投计划很快失败。据统计，德军只得到10%左右的所需物资，第6集团军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同时，苏联红军也不断加强对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进攻，被包围的德军命运危

在旦夕。

面对如此困境，德军将领纷纷劝说希特勒下令第6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围，外围德军发起进攻，内外夹击是唯一成功的机会，但遭到拒绝。希特勒表示，决不会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被围困的部队决不能投降，并命令德国陆军元帅曼施坦因率领顿河集团军群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12月12日，曼施坦因指挥德军发起进攻。12月16日，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突破了苏联红军第51集团军在阿克赛河上的防线。至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所属的第57装甲军突进到离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30英里的地方。但此时，曼施坦因发现自己也有被数倍于己的苏军包围的危险。于是下令保卢斯立即向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然而，保卢斯在没有接到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之前，没有突围的意图，他以燃料不足为由拒绝了曼施坦因的命令。12月27日，苏联红军发动强大反击将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击退150—200公里，使其退回到了原来的阵地。至此，被包围的德军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1943年1月，苏联红军向被围的第6集团军发起了新的进攻，深陷重围的德军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郊区向城区收缩防守。

1月22日，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被围德军的空运补给运输和运送伤员撤退的唯一通道被完全切断。保卢斯向希特勒报告：“部队已不能支持了，继续抵抗已毫无意义，请准许我们投降。”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1月30日，希特勒将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尽管如此，2月2日，保卢斯还是率领德军第6集团军残部向苏军投降，9.3万名德军官兵被俘，斯大林格勒战役宣告结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一次重要的战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在会战最激烈的阶段，双方投入兵力超过200万，共计100万人死亡。战后的一份人口普查折射出了战役的惨烈——斯大林格勒的85万居民战后只剩下1500人。这场战役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历时6个半月。战役最后以苏联红军的胜利告终，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折点。从此，苏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并逐渐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辉煌成果，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国际威望，极大地振奋了苏联及同盟国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心和意志。

郭沫若书法艺术

□ 李务起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书法家，他曾作为教官在黄埔军校负责宣传工作，也曾经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历在其被称为“郭体”的书法中得到体现。

生平和文化成就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他1914年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后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作品影响而弃医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并发起组织反日爱国社团“夏社”。大革命风起云涌，他投笔从戎。1926年，郭沫若进入黄埔军校负责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周恩来推荐下，郭沫若担任国民



/ 郭沫若。

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1927年8月，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于1928年始流亡日本10年。

1937年，他归国参加抗战，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并创作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3至1978年，连

续当选第二、三、四届中国文联主席。

郭沫若以新诗创作闻名于世，并广泛涉猎戏剧、散文等文学形式。他曾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和诗集《女神》、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蔡文姬》《武则天》，出版《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论著。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产生广泛影响。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文件。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之余还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独辟“以字证史”的研究方法，其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契粹编》等，成为中国学术界甲骨卜辞研究的重要学术论著。郭沫若较早关注《殷契》，他认为这些古文既是书法又是图画，他还从书法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认为书画同

质而异体，说明了书画同源并一脉相承的关系。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历时70余年，其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后随其诗集《女神》问世，其书体得以更广泛地展露风采。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心灵和人格的再现。郭沫若作为一代文豪、学术奇才，其书法大气磅礴、飘逸潇洒的风格，也和其骨气、人格密切相关。

1923年，郭沫若刚从日本医科毕业，国内动荡、亟需人才，郭沫若放弃高薪安稳的医生职业，到武汉办学宣传革命，随后参加北伐，到前线参加战斗。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在全国屠杀共产党员，此时郭沫若已是国军中将。在国民党追杀共产党的时候，他冒着危险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被国民党追杀，才流亡到日本。抗战爆发时，郭沫若已在日本流亡10年并娶日人为妻，完全可以留在日本躲避战祸，但国难当头，他还是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在国家危难时刻，他总是抛弃安逸、投身到最危险的地方，反映了其“爱国革命”的精神和铁骨铮铮的勇气。

郭沫若的精神和勇气在其书法艺术中得以体现。他1937年归国抗战后，常和傅抱石、李可染、关良等艺术家相聚一处，以



/ 郭沫若戎装照。

文会友、作画题诗、点评戏剧人物，用诗书画砥砺民众奋战到底的决心。他在此期间创作的诗词与书法交相辉映，翰墨间饱含深厚的时代气息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学书历程和学养成就

郭沫若幼年就开始修习书法。他曾在自传中描述自己的书法启蒙是跟大哥学起、跟苏字结缘：“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大哥年轻时也很浪漫的，他喜欢作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

郭沫若早年受时风影响，也曾学习过欧、颜体书法。其1931年所作《舀壶铭》，正文为篆书，释文为小楷，小楷用笔横

平竖直，结字取势左低右高，风格险劲凌厉，即有非常明显的欧体特征。对于颜体，他在《洪波曲》中说：“我以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据其自叙可知，他早年师法颜真卿的用功和刻苦。其后来之作品，线条朴茂敦厚、结体宽博，也依稀可见颜真卿的精神。对颜体的学习成果，可从《卜辞通纂》首页所题写的四字书名“卜辞通纂”中窥出端倪。

就其师承，“乙未翰林”潘林皋在清末到民国时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书法家，郭沫若曾学习过他的书法；有传“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晚清第一词人”赵熙，既以诗名重天下，实又复以书名重天下，郭沫若也曾学其书且学有成效。除了苏、欧、颜字外，郭沫若于“二王”、孙过庭《书谱》以及黄庭坚、米芾等都有涉猎。他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多次著文阐述观点，可见其对魏晋书法的研究非常深入，心得也较多。其对宋代书家苏轼与黄庭坚等人尚意的艺术思想非常赞赏，这些都影响了他自我风格的形成。他曾提到：“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郭沫若临王羲之《兰亭序》即属意临，

点画及神采与原帖相距甚远。郭沫若在1937年所书“沧海遗粟”四字，风格近似褚遂良《伊阙佛龕》碑沿袭陈隋旧格的特点，说明其曾涉猎北碑。他对魏晋以至唐宋以来的书法不仅喜欢，而且多去实践和揣摩。草书学习着重在孙过庭《书谱》，其1940年所书“寺字韵七首”即从此出。

上世纪20年代末，旅居日本期间，郭沫若由金文、甲骨文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依循中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当时其书风还尚未形成，但这一时期的尺牍信札洒脱自然、真情洋溢，颇具晋唐风致。郭沫若后期的作品，融入深厚的文学、文字学以及考古学功底，博采众长、大胆创新，融篆书、隶书于一炉，追求任性和自然，写出潇洒飘逸而又不失古拙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大胆的创新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

书法特点和时代精神

和古代书法名家一样，郭沫若文化涉猎广泛，学问建树丰厚，笔墨同其创作和学术生涯如影相随。郭沫若驾驭笔墨的能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修养，在外出视察、写作条件较差时，随便什么样的纸笔，均能笔下生花、力透纸背。昔日常见郭沫若写字的工作人员回忆，郭沫若写字不

用叠格子，常是铺开宣纸，提笔蘸墨，从起笔到收尾一气呵成。

郭沫若早年的尺牍小楷、石鼓文集联和一些甲骨文研究手迹，显现出质朴冲淡、蕴藉沉稳的气息。郭沫若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在行草书中既有楷书笔法，也有草书笔法，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落笔结字不拘一格。

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韵”，其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中“意”的挥洒与“韵”的和谐天成。刘海粟曾以“食古而化、超迈着迷”归纳郭沫若书法艺术的精髓。学界向来主张书法首重品质，郭沫若通过书法转达给人们的是通达的文化积淀，是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浪漫而现实的审美格调。

1961年，郭沫若在70岁时曾以行草书写过一幅扇面：“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自叙其书法意旨。20世纪60年代，是郭沫若书法成熟之际，这个时期他的书风神气饱满，章法布白均匀，形式与内容都有新的创拓，有深厚凝重、平中寓奇的特征。他消化吸收历代书体优点和长处，总结运笔之法在于“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并将此作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展现了大胆的

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形成了独具匠心、人所共知的“郭沫若体”，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是全才型知识分子，在文学、历史、文字与考古等领域都有着很高的造诣。其笔墨更多地出于自身的才情与天赋，在激昂中挥洒才情与心性。作为文人书者，他不沉迷于繁琐的技法，而是追求自然与率性表达的艺术境界。正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通书理、可不学。”使书法由单纯的技法，变为融各种文化学识为一体的字外功的展示，成为书家多方面文化素养与审美观点的集中体现。

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处处透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并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出来。他深厚的历史涵养和古文字学的底蕴，使得他的书法气势开张、笔走龙蛇，有一副不拘绳墨的狂放架势。郭沫若通过书法传递给人们的是通达的文化积淀，是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浪漫而现实的审美格调。

因郭沫若的字纵横捭阖、洒脱豪宕，遒劲生动，气势恢宏，适合作为名称、匾额、榜书题字，故其题词题字之处较多，



/ 郭沫若所题“故宫博物院”。



/ 郭沫若所题“中国书店”。

遍及大江南北，获“匾额王”之誉。如“故宫博物院”为1971年所题写，既端庄灵动又厚重大气，显示出极为深厚的书法功力，堪为现代书法史上的典范之作。此外，还有“黄帝陵”“中国银行”“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等题字，不胜枚举。

“兰亭论辩”及疑古精神

郭沫若在书法研究方面还具有疑古、革命的精神，这在1965年发起，绵延至今的“兰亭论辩”中得以体现。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不仅被后世帝王钦定为真迹，也被后之学书

者奉若神明。但郭沫若却对其持怀疑态度，他在《文物》1965年第6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序》为唐人伪作”，引起轩然大波。1965年，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通过对比这些出土文物的书风，推断《兰亭序》应为伪作，并进一步认为“《兰亭序》不仅在书法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指出“文章根本就是伪造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文刊出后，震动一时，引起文史学界乃至日本、韩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著文《“兰

亭序”帖的真伪驳议》反对郭文。高二适此文于1965年6月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史哲”版，引起文史学界乃至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关注。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撰文《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论证楷书近代未成正体。高二适则写出《“兰亭序”帖真伪之再驳议》欲继续争鸣，但未能发表；后又著成11万字的《“兰亭序”帖论辩》，当时也未出版，使得这场论争不了了之。“兰亭论辩”不仅震动了中外书坛，推动了书学研究的发展，也被称为“现代书法史区别于古代书法史的非常事件”。

实际上，早在郭高“兰亭论辩”前，即已有对《兰亭序》的种种质疑。唐人何延之、刘乡对《兰亭序》流传途径的不同记载，引出南宋姜夔对《兰亭序》的疑问。清光绪年间，李文田在题跋《定武兰亭》之时，以《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作为参照物，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所书，还从《兰亭序》文本角度来说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伪托于王羲之名下。历史上虽早有对《兰亭序》的质疑，但学术界公认郭沫若是发起“兰亭论辩”的第一人。郭高等人之《兰亭序》真伪论辩，极大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体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革命精神。■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八)

□ 熊子杰

第八章 闻名世界的“左宗棠鸡”

2016年3月9日，为解开“左宗棠鸡”的谜团，笔者特地亲自去台湾新北市新店区彭园会馆，找笔者的老友小彭（彭铁成），向他询问“左宗棠鸡”的由来，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笔者，是他父亲彭长贵亲自研发创造的。

他说，1976年马英九与夫人周美青在纽约彭园餐厅举行结婚宴，喜宴菜色中就有一道闻名美国的湘菜“左宗棠鸡”。“左宗棠鸡”大名鼎鼎，是因为它是基辛格、老布什，以及早期台湾留学生必点必吃的中餐馆名菜，这道菜也让这位湘军名将左宗棠在20世纪声名远播。

2003年，英国BBC电视台主持人扶霞·邓洛普前往湖南考察，收集各餐馆菜单，她意外地发现，当地并没有这道菜。《纽约时报》记者李竞也曾前往湖南追寻这道菜的源流，同样发现当地没人听说过“左宗棠鸡”，这道闻名海外的中国佳肴是从哪来的呢？“左宗棠鸡”到底是谁发明的，众说纷纭。为



/ 左宗棠鸡。

解此谜题，美国纪录片导演伊恩·钱尼历时3年走遍全美餐厅，寻访中餐名厨，甚至远渡太平洋到上海、湖南等地探访，皆无法解开“左宗棠鸡”之谜，最后才发现，这道菜原来是出自台湾名厨彭长贵之手，为此还特别制作纪录片《寻找左宗棠》，并于2015年6月15日在台首映。

这道菜的发明者彭长贵是湖南人，擅长湘菜，又仰慕清

朝湘军名将左宗棠将军，就将这道自创的特色菜取名为“左宗棠鸡”，也可说是对湘籍先贤表达尊敬之意。

台湾菜、台湾小吃独具风格。台湾人结合清代老福建菜（清朝闽菜）、客家菜（广东客家）、日据时的日本菜、外省菜（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官厨）、欧美和东南亚美食等元素，运用台湾丰富的海洋资源，

融合中西文化，自创出独特的台湾菜系及各式特色台湾小吃。“左宗棠鸡”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经典名菜，辣中带酸，咸中带甜，吃下去有种说不出的奇特感受，有传统湘菜的霸气及闽南菜的细致，笔墨无法形容，你亲自尝过才能体会这奇妙的感觉，而且一定要到台湾彭园亲自尝尝彭厨神的手艺。

台湾名厨彭长贵，湖南长沙县沙坪人，是谭家菜的传承人，是台湾彭园餐厅创始人。彭师傅师承谭厨名家曹荃臣，所烹饪的料理名为湘菜，但有深厚淮扬菜及岭南菜的底子，加上自己的天分及创新，独创出特色的新派湘菜，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湘菜名厨，被誉为“台湾湘菜之神”“台湾湘菜祖师爷”“国宴御厨”“一代厨神”“湘菜泰斗”。“左宗棠鸡”就是彭长贵老板自创的一道名菜。

为何彭常贵会创作这道“左宗棠鸡”呢？

小老板小彭说，父亲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初期在台湾开了华新、华湘、彭园等餐厅。1952年，台湾招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雷德福，有关人员找到彭长贵研究宴请菜单，并要求三天菜色皆须不同。第三天他灵机一动，将鸡肉切成不同大小的块状，加入特制

配料制作上桌，结果宾主异口同声称赞，并问他此菜叫什么。彭长贵先生素仰慕湘贤左文襄公的人品，认为清末湘军名臣左宗棠之名最能衬托出此道佳肴中蕴含的湖南人的高雅特质，所以将其命名为“左宗棠鸡”。

在1970年某日，蒋经国下班时已过用餐时间，轻车简从与随行秘书到了彭园餐厅，蒋经国幕僚紧急叮嘱彭长贵的餐厅准备几道简单料理即可，彭长贵特别准备“左宗棠鸡”“彭家豆腐”，没想到蒋经国啖后，口齿留香，甚感美味，非常喜欢。日后经国先生便常向朋友推荐此道菜，故而“左宗棠鸡”一时名满台北城，慕名而来的老饕络绎不绝。于是，此道“左宗棠鸡”不但成为彭园餐厅的招牌菜，更是当时台湾家喻户晓的佳肴，每一家只要宴请贵宾，不管做得像不像，必端上这道佳肴才是够档次的款待。

为何美国名记者要跨海至大陆及台湾遍寻“左宗棠鸡”这道佳肴呢？

1973年，彭长贵前往美国发展，在纽约曼哈顿区开设彭园餐厅分店，这也是马英九与周美青举行婚宴的地方。同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受邀到彭园用餐，基辛格尝过“左宗棠鸡”后甚为喜爱，此后每次参加联合国会议时都会光顾

彭园。由于基辛格为国务卿，每每赴彭园用餐时，全美记者都随行采访。维安人员基于安全考量将整家餐厅包下，此举等同基辛格为彭园做免费宣传广告。基辛格所点的每一道佳肴，媒体必疯狂报道，更不用说这道基辛格每次必点的“左宗棠鸡”，因此一夕间“左宗棠鸡”名扬全美，ABC电视台还为此道菜制作特别节目报道，使此菜在美国名声更是响亮。全美各地中菜馆于是纷纷模仿，推出许多“左宗棠鸡”（但都是山寨版，并不正宗），此菜成为美国人认知中最著名的中国菜之一，也成为许多美国人想学的第一道中国菜。早年台湾学生留学前必学此道佳肴，以便未来在外国社交时可运用此佳肴结交些朋友。这些台湾学子将“左宗棠鸡”带到世界各地，使其更加闻名，也让许多外国人经由这道“左宗棠鸡”佳肴认识了我清末名臣、湘军名将左宗棠。左宗棠若在天有灵，万万无法料到让他享誉全世界的，不是他的军事成就，而是台湾这道佳肴。虽然有点令人失望，但也算是另类行销吧！

各位读者眼尖的话，可在台湾名导演李安的电影《推手》《喜宴》中看到此道“左宗棠鸡”，如今在台湾彭园餐厅还可享用到此佳肴。 